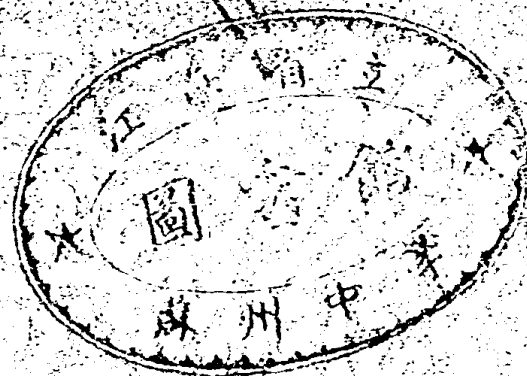


# 到中日全圖和平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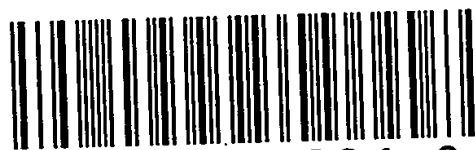
譯叢叢書之一



譯叢編委負責編印

到中日全和平之路

譯叢叢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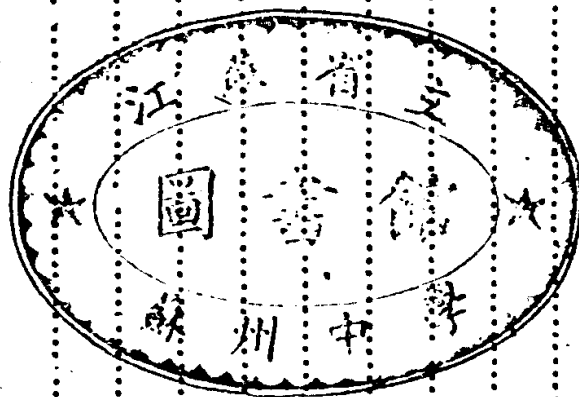


3 0662 4896 8

譯叢編譯委員會編印

#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目錄

|                    |          |
|--------------------|----------|
| 國府之新任務……………        | 今中次膺(一)  |
| 國府之強化與基礎之關係……………   | 松本鎗吉(一一) |
| 強化國民黨……………         | 松本鎗吉(二一) |
| 中國民生問題解決之要諦……………   | 松本鎗吉(二六) |
| 汪主席來日和事變處理……………    | 神尾茂(三九)  |
| 中日經濟合作與中國民族性……………  | 桑島主計(四三) |
| 中日經濟提攜之道……………      | 馬淵逸雄(四九) |
| 處理事變對策中幾個經濟問題…………… | 梨本祐平(五四) |
| 事變處理與國民之覺悟……………    | 阿部信行(六五) |
|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     | 長田實(七二)  |
| 真的親日家和假的親日家……………   | 馬淵逸雄(七九) |
| 真正的中日和平……………       | 阿部信行(八二) |
| 從東洋史上看到的中日關係……………  | 和田清(八五)  |
| 國父和頭山滿翁……………       | 藤本尙則(九七) |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目錄

二

|              |            |
|--------------|------------|
| 東亞聯盟的意義和目的   | 石井文雄(一〇九)  |
| 東亞聯盟釋疑       | 田中直吉(一一七)  |
| 大東亞聯盟和中日新約   | 鹿島守之助(一二五) |
| 日本與亞運動團體統合問題 | 木下半治(一三五)  |

# 國府之新任務

緒言

蘆溝橋事件發生的一年以前，我曾經遊歷滿洲和華北；直到現在，再沒有重遊的機會。於今機緣湊巧，又作了半個月的旅行；目下完畢了預定的目的，已經乘船東渡，來到黃海的正中了。

前年秋季以後，常常到華中去，以華中爲中心的事變期間的中國現狀，我想大概得到了相當的認識。而這次旅行，又從華北和滿洲國的觀察中，發現了幾多不同之點，欣幸其不無所獲；同時，對於在旅行期間從各方面賜予援助的人們，更不能不深致謝意。這一次旅行後，我所得到的結論，可以歸納爲以下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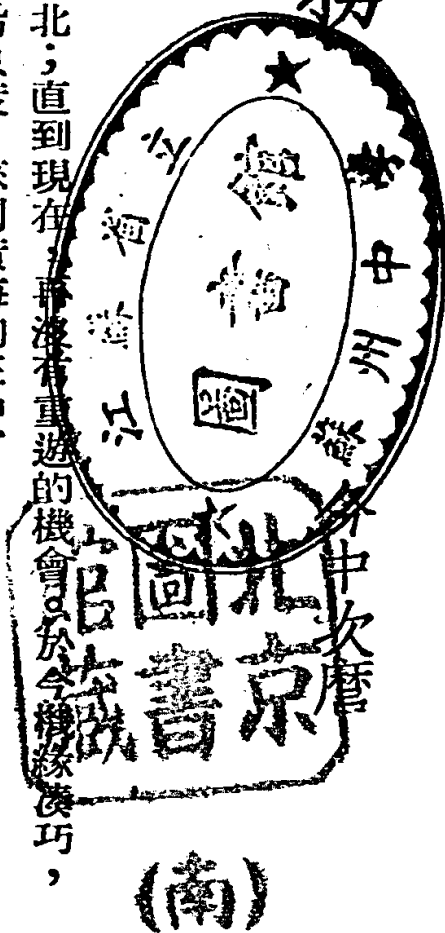
- 一、滿洲國和華北華中，是建樹在一個基礎上，而不能劃分畛域的。
- 二、事變處理方針，在中日條約的締結後，就應當以國民政府爲中心。不過，現在的政策和將來的觀察，似乎和這種方針，還不能夠完全一致。

所以我的希望不妨在這裏列舉出來。就是要使人們相信處理事變，除去以國民政府爲中心外，別無善策。這樣，華北華中滿洲日本才能够有一個基本的原理下綜合起來，接受同一的指導；不然，將來的問題，決不能得到合理的發展。

本來滿洲國尤其在華北的日本人，對於中國的現狀，當然要比日本國內的人們認識得清楚；但是，把這

國府之新任務

一



643.1  
605  
3

種認識確定或綜合起來的理論基礎，還不能說是怎樣的充分。

當然，日本國內的人們，也不能說就有充分的理論。我的意思，僅祇以爲具有這樣現實認識的人們，如果能夠再有一種正確的綜合的理論；那末，中日事變的真正的合理的解決才屬可能罷了。

二十六日晚間離開了雨雪載途的滿洲，天明時到了山海關，已是楊柳青青，一片春色；及至來到北京，故宮和中山公園的桃花，更是笑臉迎人燦爛滿樹了。

三十日星期，正式的還都週年紀念在第二天三十一日才舉行慶祝的。北京的市街上，花車往返，絡繹不絕；舊的牌樓外，另搭了許多松坊。回想到去年四月南京慶祝還都的情形，不禁爲國民政府再作第二年的祝福！

## 一、滿洲國當前的問題

以下先從擔當解決事變完成全面和平一部份重要任務的滿洲國的當前問題，開始說明。

滿洲國在中日事變中的任務，不用說在於對日物資的援助。本來滿洲國有滿洲國本身的建國方策，這建國方策和對日援助，雖然某一方面不一定有原則上的矛盾，然而其他方面當然也不免了有些衝突。不過現在不能把這種矛盾當做重要問題，只有遵循着建國的路綫和怎樣增進對日援助的方針，向前邁進。

滿洲國的建設原則，當然是怎樣能夠自給自足從速完成一個經濟的獨立國家。不過，從處理事變的原則說，則爲了強化日本的戰鬥力，和增進中國和平區域的建設，應在可能範圍內，輸出物資，並減少其對日對華的依賴性。

這兩個原理，從表面上看來，不一定完全矛盾；然而滿洲，還沒有充分脫離殖民地的束縛，所以對日對

華的依賴性，依然很大。這樣，與其犧牲建設，還不如加以強化，在強化中間，反而可以找出一個順應時局的原理呢。

但是隨着時局的緊張，建設的強化和促進，也更有必要；於是乎種種政策上的缺陷，也顯露出來了。例如農產蒐集機構，金融統制機構中，關於滿洲社會的特性的考慮劃策，很有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就最近兩三年來所實行的政策講，似乎把先進國日本的東西圖圖搬到後進國滿洲去，這種「削足適履」的譏評，終是不可免的吧。

從滿洲國本身就需要改革的農產品蒐集·收買·販賣等類的機構說，更不能不作如是觀。原來大豆·豆油等，是由「滿洲物產專管公社」辦理，米·麥·高粱·包米·粟等雜糧，是由「滿洲國糧穀會社」辦理，麵粉是由「滿洲穀粉管理會社」辦理。因為這樣劃分起來，很不切合實際；所以有人提倡設立一個綜合機關——「農本公社」使之統一辦理農產品的蒐集收買以及販賣等事項。

不過，據我看起來，這新的蒐集機構要行之有效，恐怕也有點困難吧。因為農業統制政策中已經包含着許多原理上根本上的問題了。

從前，農業生產品，是經過久已發達的「糧棧」或其他中間商人之手，而實行蒐集與收買。這種「糧棧」，不但從事蒐集與收買，還為農村盡其日用必需品配給的任務。然而新設立的統制機構，僅祇辦理蒐集收買的事情；由於沒有推銷農村必需品的販賣機構，所以因收買而用於農村的資金，沒有方法把它收回來了。

所謂「糧棧」，是把收買和販賣一手包辦的。為此，因收買農產品而用於農村的資金，還可以由販賣雜貨再把它收回來。這樣資本還流，從「糧棧」再集中到都市行商的手裏，商業資本就由此蓄集起來了。

但是新統制機構成立後，這種極盡巧妙的資金還流關係，就被破壞，結果發生了現在滿洲日趨嚴重的通

貨膨脹問題。

如今在滿洲國成爲問題的通貨膨脹，和日本不同，另外還有它民族性的特徵。

「專管公社」或其他統制機關，因收買農產品而用於農村的，當然是需要物資的日系產業資本；不過，這日系產業資本經過農村必需品販賣而變爲滿洲固有的商業資本，因爲日本物資匱乏，所以輸往農村的雜貨既多半要利用當地民族資本，於是乎利用日系資本而實行收買資金的愈益增加；這經由農村而變爲當地民族資本的資金，也就增多起來了。

據說滿洲這種當地民族資本，漸次增多，大有成爲游資的趨勢。這種當地民族資本，固然也有集中於當地銀行的；然而錢莊·典當·醬園等舊式金融機關，還有相當的勢力，所以集中於當地銀行的，祇不過商業資本的一小部份。

現在滿洲的當地民族資本，有人估計爲十五萬萬元，其可靠與否，不無疑問；但已到達相當數額，是可以想像的。

在這種狀態之下，爲開發滿洲產業而投下的日系資本，漸漸的變成滿系商業資本；因此，利用日系資本的在滿企業，其擴大再生產，也漸漸的遇着障礙了。

如果滿洲的當地商業資本，能够轉化爲新興的滿洲產業資本，這種障礙，就可以除去。不過，因爲那是封建的商業資本，或以對人信用爲基礎而要求家族的經營，或貪圖厚利而實行高利貸；所以要利用於新興產業，頗爲困難。於是乎就發生了上述的矛盾。

那末怎樣解決這一個矛盾呢？要求當地資本動員和協力，或者也是一個辦法。然而單就目前論，恐怕很不容易，因爲那要牽連到政治行政，而形成一個民族問題。



僅祇打倒封建的武力政權，不一定就能支配了封建社會；對於封建社會的支配，非把封建的經濟機構完全打破，是不會成功的。

現在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日系資本和滿洲民族資本，各不相關的順應其發展階段而加以利用，也就是將滿洲民族資本之高度的家族主義的特徵，利用得當；不難充分發揮其機能。

例如現在油坊、磨坊、榨蠶絲廠等手工業的經營形式，漸次綜合起來而具有工廠的規模。因此封建的滿洲政治，也走向產業革命的途徑了。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指導政策，當地產業漸次發達，遊資動員也自然可能了。不過，要使產業革命能夠進展，那末強力的日本輕工業資本對於滿洲當地資本產業化，加以保護與扶助而實行一種封鎖政策，是必要了。

以上所說，僅祇限於滿洲國的問題。至於中國的問題，在本質上也沒有什麼兩樣。不過中國的輕工業，雖已開端，但微弱的產業資本，僅比滿洲的當地資本略為發達而已。在這種意義上，才把滿洲的問題提出來，作為將來中日經濟合作產業金融方面的一種參考資料。

## 二、華北與滿洲的連繫性

把這種事實更加顯明表現的，是苦力問題。

現在妨礙滿洲增產計劃的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勞動力的缺乏。滿洲本是殖民地，所以人口稀少，當地的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直到現在，滿洲產業還依靠着季節的勞動力輸入；但是近幾年來，華北苦力的輸入，也成爲問題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滿洲國組織「滿洲國勞働協會」，以招募勞働者；聽說華北方面最近也有組織「華北

勞工協會」的計劃。

雖是這樣，勞動力的缺乏，依然如故。就是質的方面，也不如從前了。目下正是山東苦力到滿洲去的季節，然而也不見有什麼好的成績。

勞動力輸入的所以減少，固然由於滿洲和華北間嚴格的匯兌統制，使所得工資（每人限於一百元）不能帶回，或對於勞工協會不盡信賴的關係；而華北本身的建設事業之需要多數苦力，也不失為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勞動力缺乏，所以現在的工資，據說比四年前增加了三倍。由此看來，比日本國內的工資，也不見得怎樣低下了。

不但滿洲國的勞動力，要依賴華北，而且由於這種關係，單是工資一項，從滿洲流到華北的匯兌資金，就不在少數。

滿洲的游資，隨着滿洲經濟機構的改革和經濟統制的強化，流向華北華中的數量，定有可觀（這雖然是走私）。因此事實上現在滿洲與華北間，就有強化匯兌統制的必要。滿洲國幣和聯準券的對立，雖然一方面日形嚴重起來，而山海關古北口等滿洲華北的交界，地理上十分明顯，而經濟上却不容易劃分；並且就時局的關係說，也相當的不便。現在華北方面聯準券與舊法幣，雖然正在混戰，倘若滿洲國幣聯準券以及華中華南的軍票領域，得以確立；通貨上的統一，能够完成；——換一句話說，就是日圓集團的確立，——滿洲的經濟政策就不至於這樣的困難了。

### 三、地主勢力的對抗

在滿洲國還有一個地主勢力和政治力對抗的問題。滿洲當地的人，大半是地主出身，這種地主的政治

勢力的存在，是滿洲國權力構成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日本在明治初年的時候，惡德穢行，層出不窮。這都是藩閥政爭的結果，利用司法權和行政權以實行政治勢力互相抗爭的反映。這種抗爭，祇有增強近代的資本的勢力去對付封建的地主的勢力，才可以消滅；近代的中央集權，才能够強化。

在滿洲還沒有所謂地冊。不過，國稅有所謂地稅，縣稅有所謂地捐，村稅有所謂地費；這些都已經實行了。但是，因為地主的勢力和短期的佃租的關係，地費一項可以轉嫁給佃農。地租和地捐的徵收，聽說也十分困難。這種事實，在中國也是同樣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去重編戶籍和地冊，別無善策。唯其如此，才能够迅速的完成地租制度；經過地租制度，才能够打倒地主的勢力。只要這地主的勢力和高利的當地資本，繼續存在；不但滿洲國的行政權力，不能够確立；而且從各方面有使現在必要的產業增產計劃，也不能够成功。

所有中國的農民，還沒有脫離了封建的特性，就是勞動者也是半農半工；所以不能夠構成一種大眾的政治勢力（關於這一點也可以作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判。）由此看來，中國的社會勢力，完全建築在地主的武力和商業資本的基礎上。如果不打倒這兩種勢力，近代的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就不能夠完成。打倒的方法，祇有促進產業革命利進行社會革命；但是這裏所謂社會革命，只是用行政的權力去摧毀封建地盤，和完成近代資本制度的經濟秩序，藉以施行重商主義的政策。

#### 四、華北特殊性的問題

從前我以為把華北看做國際政治的一個特殊地帶的見解，大概經過這次事變終要消滅；尤其最近王克敏

氏辭職後，至少華北政務委員會要遵奉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了。

本來華北「特殊化」的內容，是十分複雜的。最保守的一部份，現在依舊要求着地方的特殊化；但事實上不成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從華北對華中之經濟的依賴性看來，是很明白的。無論小麥。米、油，差不多足以自給的東西，華北都沒有；許多必要的物資，不能不仰給於華中、華南、日本以及第三國而把煤、鐵、鹽盡量的送到日本去。不到秦皇島或者青島，簡直看不見一個好的港口；這是華北的實在情形，所以華北的特殊化，就地域說是不可能的。

這樣當地進步的人們，從另一種意義上來構成華北特殊化的理論；就是在這裏造成一個最完善的中日經濟合作與文化合作的模型，使之收攬中國的民心，轉變抗日的意識，藉以築成全面和平的基礎。

這種理想是很好的。當我曉得華北方面抱着這種理想而努力工作時，我覺得非常欣慰而且鼓舞。不過，單把華北劃分出去，這樣的理想能否完成，却不無問題。

一談到時局，無論何人都提出全面和平的必要。但是，如果你問他怎樣才能够全面和平呢？所得到的回答，除去等待國際局勢的轉變——歐美戰敗，歐戰結束——那樣依賴外力的想頭外，再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如果你再進一步問他，要把中日事變的局面轉變到有利的方向，除去擁護國民政府外，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呢？這樣一來，明確回答的人，一個也沒有了。

## 五、國策的浸潤

日本的國策已經決定援助國民政府了，這是以長期抗戰爲前提。而國際局勢，因爲歐戰的長期化，目前也不至於有什麼轉變。

當前的問題是怎樣使國民政府成爲真正的中央政府？我想利用武力和進行經濟的建設，才屬可能；不過這裏還有種種的說法。

前面已經說過，無論滿洲或華北，如果產業上不與日本合爲一體，是沒有發展希望的。總而言之，日圓集團的確立，乃是經濟建設的基礎。然而同時中日滿不能各自順應其經濟的社會的發展階段，以施行建設政策，祇有引出混亂與矛盾。

全面和平是人人希望的，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出可能的方法。我遇到每一個人，總要問他：日本讓步的條件到怎樣的程度，重慶方面才答應呢？不但是日本人，就是華北的要人回答，大體一致的說，恢復蘆溝橋事件以前的狀態和立即撤兵。

不過這樣的條件不是日本所能承認，是不待言的。那末，所得到的結論，全面和平就非常困難了。如果是困難的話，除去以持久戰去援助國民政府外，再沒有比較好的收拾的方法吧。

我在滿洲和華北遊歷所感覺到的事情，就是一般對於國民政府還沒有充分的理解。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所謂有名的政治家都沒有附合，僅祇一部份的少壯智識階級參加在內。那裏沒有軍閥的地盤，沒有財閥的支持，有的不過理論和思想而已。在這種現狀之下，不能不借重日本的武力政治力，而中國固有的勢力的基礎，還沒有建樹起來。

現在國民政府的弱點，不能使一般大眾羣起信賴，這原是萬不得已的事情。然而強化它，扶助它，才能找出一條生路，發現一綫曙光；在這沒有理論的人們看來，無論如何不會理解的。其實祇有從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理論的出發點，才能走向平坦大路呢。

我曾在南京和許多的青年理論家會晤，由於他們那種誠懇態度，使我不禁同情。這不但是形式上而在理

論上也可以看出發展性來。反之，和華北要人會晤，大多數使我失望，這種失望和我對於維新政府時代的情形相同，祇感覺到他們是沒有理論的舊式政治家，並且因為沒有思想而缺乏發展性的人們。

國民政府的武力，雖然還未充實；財政經濟基礎，雖然還未鞏固；但是我以為這裏還有建設中國和東亞的思想和理論的存在。我相信這理論不久就成爲實踐，思想終要發生效果的。

這樣在日本方面必須努力援助與充實其力量，且在事前更有統一輿論推行國策的必要。

關於國民政府的現在情形，已經在三月三十日於國府大禮堂舉行的還都一週年紀念典禮時 汪主席的全國廣播演詞「國民政府還都一年」中，詳爲說明，毋庸再贅了。不過第二年的任務，即以下列舉的兩種政策，尤有特別重視的必要。第一是準備國民政府的新武力組織，第二是確立國民政府的新經濟秩序。關於武力，除去原有的五萬綏靖軍，又收編了二十師約二十餘萬軍隊；以後只要注入純正三民主義的理念並對於戰鬥力加以新的訓練就好了。

至於新經濟的秩序，已經因新法幣的發行，渝方的通貨漸就沒落。將來就要找一個機會，把通貨政策轉變到經濟建設的方面；這正如我所主張，從連繫舊法幣改爲連繫圓系通貨尤其是軍票；這樣，新通貨政策才能够施行；華中的通貨才得穩定，和平區域的民生，才得安甯。滿洲、華北、華中、華南普及的經濟秩序，才可以統一；各種經濟工作，才容易推進。在完成這種工作以前，要獲得民衆意識的轉變，甚爲困難；對於國民政府的批評，也就在所難免了。不過，應當注意的是，祇有歷盡艱辛，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呢！（原文載「改造」五月號，齊東楚譯）

# 國府之強化與基礎之關係

松本鎗吉

## 一

在中日事變之現階段，最所希望的，是國民政府之急速的發育強化，而成爲名實俱備之中國中央政府。我們希望國民政府之早日強化，無非是因認中日事變之處理完成，這是絕對必要的。

國民政府自去年三月三十日還都以來，到了本年三月底，已滿一年。時至今日，還是希望着國府之早日強化，可見得國府之發育狀態，還沒有副一般的期待。國民政府還都以來，汪主席等政府當局，在日方全面的協助之下，關於中央、地方政治機構之整備，日華基本條約之締結，中央儲備銀行之創立并新法幣之發行，以及其他內治外交聯端，雖已廢寢忘食，努力建設，而其發育狀態，尙未能博得一般的滿足，此其故安在，當有冷靜的探究其原因的必要也。

## 二

國民政府之發育，其未能達到滿足程度之原因，因有種種，然以筆者之見解率直言之，則國府還都之際，放棄從前國民黨所視爲生命之一國一黨主義和以黨治國主義，承認新中國區域內國民黨以外各黨各派之存在，國民政府由所謂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人士所組成，同政府即由以國民黨爲中心之各黨各派支持之，其發

育不充分之根本原因，即伏在於是。

如中國情形之國家，一國一黨主義及以黨治國主義，最爲適當，此夙爲多數識者所同認。事變前蔣介石之完成統一，所負於以黨治國主義者爲多，想是任何人皆不能否認的。時至今日，世人尙有以中日事變之勃發，爲蔣介石等國民黨首腦部以黨治國即一黨專制主義所造成之結果者，實則中日事變之勃發，並非國民黨一黨專制之結果，不過蔣派爲統一完成之方便計，採取抗日主義而已。以中日事變勃發之原因，歸之於國民黨一黨專制，此爲皮相之見，非確論也。

一國一黨主義，最適於目下中國之國情，想爲汪先生等國民黨同志所熟知，然汪先生等當樹立國民政府之際，已棄此而採取所謂各黨各派主義。汪先生何以採取各黨各派主義，雖當時汪先生等之心境意圖，不得而知，想亦爲當時之客觀的情勢及四周之空氣所制而有此結果也。即當時北京有臨時政府，南京有維新政府，蒙古有蒙疆政府，均儼然存在，不得不將臨時維新兩政權解消統合，樹立國民政府。有此特殊的事態，使汪先生等國民黨領袖，迫不得已而拋棄一國一黨，以黨治國主義，好像當時是有這種情形。汪先生等當時心境之揣測，且放下不談，今試一回想國民政府樹立前國民黨之言動。

汪先生所領導之國民黨自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之三日間，在上海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其第二日之提案：「授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指定中央執行委員，協同黨外人士，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案」全會一致議決通過。閉會之際，發表大會宣言，其中一節有云：

「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次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全國人才之效。」

如上之決議並大會宣言，雖未明言一黨專制之放棄，然國民黨最高指導機關之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有加



入黨外人士之決議與宣言，國民黨一國一黨主義和以黨治國之放棄，似已向中外宣示，頗足引人注目。至本年三月十九日由國民黨宣傳部長林柏生氏發表之「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要綱」國民黨之放棄一黨專制已明白宣示。其第一有：「依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之決議，由汪主席集合既成政府在野合法政黨及社會上負有重望之人士，組織中央政治會議，拋棄一黨專制，以期收各黨各派合作之效」等語。基此大綱，中央政治會議以主席一名，委員三十名組織之。其委員之分配，計國民黨員十名，臨時政府代表五名，維新政府代表五名，國家社會黨代表二名，中國青年黨代表二名，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代表二名，不屬於各黨派而社會上負有重望之人士四名。國民黨員不過僅佔三分之一。

如是國民政府，放棄國民黨之一黨專制，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人士組織而成，以從事新中國之建設。然其結果究何如？依中國社會黨江亢虎氏之言，則謂：「半年以來，因為力量不甚充實，機構不甚靈敏，總覺得推行不能盡利，成績不能滿足，仔細觀察起來，似乎各黨各派之間，終不免有些成見，有點界限。」（憲政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聯合各黨各派之政府，由各黨各派之支持而擴充整備政府機構，僅僅施行漫然的所謂善政，欲求政府之強化，畢竟為不可能之事。國民政府之強化，即支持國民政府者之強化，此應於重慶國民黨與延安共產黨之間，堂堂的展開民衆獲得而佔有壓倒的勝利。然欲戰勝重慶國民黨和延安共產黨，則國民政府之基礎，須達到最大限度之強力化，此為絕對的必要，自無待言，若是成爲現在國民政府基礎之各黨各派，在最近將來，有強化之望，固不成問題，否則非改造其基礎勢力不可。至應如何改造，則在考慮此問題時，應先檢討半年以來，國民黨內所抬頭之「國民黨中心論」一「國一黨論」同時并不得注意到國民黨首腦部之心境「由各黨各派主義轉向一國一黨主義」正在縝密推行中，並徐徐的實現此中之傾向。

國民黨內作「國民黨中心論」之先聲者爲汪先生，汪先生於去年八月間，發表「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一文，其言曰「我以爲應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爲中心而聯合其他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國家社會的責任，這裏仍然採用民主政治之基本精神，即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又華漢光氏亦云：「造成中國一個強固的組織，應如何使多數同胞絕對擁護一人之領導者，此非注意不可，要先確立一個主義，次則確立一人領導者。若主義不一，則多數同胞，將不知所適從；領導者不一人，則多數同胞，將不知絕對擁護誰才好。」（東亞三月號）這是婉曲主張「一國一黨」的。

離開言論，試觀國民黨首腦部之心境，從各黨各派主義向「一國一黨」主義如何正在推移還原中，並如何正在具體化中。

- 一、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散中華民國共和黨、大民會、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合併於國民黨。
- 二、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舉行之國民黨三中全會，汪主席推薦左記諸人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何佩瑤（共和黨），石星川（共和黨），繆斌（新民會），陳孚木（興建運動），袁殊（興建運動），夏奇峯（大民會），孔憲鏗（大民會）。
- 三、三中全會宣言有下記一節：

「最近共和黨，大民會，興亞建國本部，更相繼自動解散，泯除畛域，同濟艱難。當此存亡危急之時，有羣策羣力之撐柱，不特目前難局可以打破，且於憲政前途，植堅固不拔之基礎。將來施行憲政，必不致蹈民元以來散漫紛歧之覆轍，此誠可引爲欣幸者。」

四、汪先生於三十年一月四日，對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之質問：「最近國民黨內所行之一黨中心主義與憲政實施，感受到矛盾之印象」會答以「憲法成立後，人民雖可組織國民黨以外之政黨，而在目前

階段上，尤其在憲法成立前，鑒於中國內外之局勢，無論如何，各黨各派之存在，反爲和平建國集中促進之障礙，故不得組織新政黨。」

現在 汪先生等的國民黨，雖其客觀情勢，尙不便露骨地主張實行一國一黨主義，但我們讀了上述四項時，則很容易看出國民黨首腦部之心境和意圖，是要從各黨各派主義移轉到一國一黨主義上去。

共和黨、大民會等之解散而併入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方針，並非公然否認并消滅國民黨外各黨各派之存在，而是懇談的方法，勸令各黨各派之解散合併者。共和黨等三派解散之結果，現在之黨派，僅有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之二政黨及新民會之一團體而已。故殘餘之黨派，若能如共和黨等之出以自動的解散而併入國民黨，則國民黨之一國一黨主義，即能實現。彼中國社會黨等之殘餘三派，對此之態度果何如乎？

### 三

對於國民黨之「向一國一黨移動」，北京之新民會，究採取如何態度，筆者全無所聞。新民會奉行新民主義，已成爲秉有新民會旗幟之特殊團體。其人的機構很複雜，管理範圍亦頗龐大，似難遽行決定其動向。

關於中國青年黨之態度，該黨領袖國民政府農礦部之趙毓松氏會說：

「中國舊體制爲一黨專制，汪先生提倡和平運動以來，號召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合作，毅然宣布取消一黨專制，於是各方人才望風而來，造成今日之局面。惟有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實行合作，方是中國之新體制。此新體制實行以來，凡各黨各派，均於和平反共建國國策之下，對內對外，取一致之行動。其間意見糾紛，利害衝突等問題，一無所有。或偶有所見不同之處，亦無非於國家大局的見地上交換意見，結局仍歸一致。故中國現行制度，無改變之必要。」

觀其所言，似乎主張維持現狀。中國社會黨之江亢虎氏亦云：

「中國國民政府當改組還都之際，鄭重發表宣言，廢棄一黨專制。此大方針無論對內對外，均應遵守。博得多數人之贊成，故皆望風而至。

更進而主張各黨各派之勢力集中，而期新體制之確立。

#### 四

國民政府所作爲基礎的國民黨和中國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之間。如上所述，關於新中國政治體制，政府基礎等問題，既有國民黨首腦部與他黨間意見不同之事實，則於同政府之強化問題有重大之關係，不可輕輕看過。汪先生「各黨各派之存在，反爲和平建國集中促進之障礙」之言，若是真實的話，則不得不使國民黨以外之各派併入國民黨，或毅然解散之，使之歸於消滅，而國府之基礎，成爲國民黨一黨。又趙毓松氏「唯有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合作，才是中國之新體制」之主張，若認爲正當，則汪先生等國民黨首腦部，應放棄一黨一黨主義之思念，與他派要求切實之合作而使之實行。國民黨與他黨派之間，斷不容有如上所述相反之兩種主張。主張之不同，足招摩擦和相尅，非但不能；南京國民政府，且將有弱化之虞也。

#### 五

一政府一黨與各黨各派，究以何者爲佳，爲參考起見，試觀重慶方面。

敗殘之重慶抗日政權，尙未土崩瓦解，至今猶能保持殘喘，狂奔於抗戰建國，其故何在。第一理由，在於該政權之所成爲基礎的，爲抗日國民黨之一黨，而其結果頗爲堅韌。重慶「國民黨」內部，有和平派，抗

戰派，歐美依存派，親蘇聯派等種種派別，始終看出他們意見的對立，這是事實。然縱使意見如何對立，抗爭如何深刻化，而總不容易表現分裂，這是因爲派別是黨內的派別，不論其屬於任何一派，同爲國民黨黨員也。且國民黨內，縱有各派的對立摩擦。而與共產黨一有鬥爭，則黨內各派一致起而與共黨相抗，因爲黨員愛自己的黨，黨與黨員具有存在同一命運下之自覺心。倘若重慶抗日政權爲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聯合機構，以各黨派爲其基礎，則於相剋摩擦之下，早已土崩瓦解矣。更就重慶政權與內地民衆之關係上觀之，該政權到了今日，還能引誘民衆抗戰者，不外由於抗日「國民黨」強韌的組織和持有統制力的緣故。重慶政權之下，若存有各黨各派，而行使其各自任意對民衆之工作，則重慶對於民衆，卽失去一黨的強力統制，民衆卽將離反該政權。重慶抗日政權，僅爲「國民黨」員所組織，且爲「國民黨」一黨所支持，這是該政權之強有力處，不可不知。

## 六

對於國民黨之「向一國一黨主義移動」與在新中國東亞聯盟運動之關聯性，今試加以考察。

在新中國之東亞聯盟運動發祥地爲廣東。去年八月廿一日，曾以廣東省主席代理陳耀祖氏，廣州市長彭東原氏爲發起人，組織「中華東亞聯盟協會」，發表宣言，其詞曰：

「本協會以獲得平等之國際地位，與日本作經濟提攜及軍事同盟爲目的。廣東爲中國革命之發祥地，亦爲建設國民政府之策源地，故本日於此創立本協會。」

受此協會成立刺激，新中國各地，旋即展開東亞聯盟運動。南京國民黨之中堅分子，亦卽開始此運動，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周學昌等組織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於南京。其綱領爲：（一）政治

獨立，(二)經濟合作，(三)軍事同盟，(四)文化溝通。揭此四項以號召全民衆及日本同志。此中國同志會之設立，對於國民黨首腦部之「向一國一黨主義移動」無論直接間接，雖都好像沒有什麼關聯性，然國民黨以黨的立場，已決將該運動正式展開。本年二月一日，取消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從新組織「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以爲聯盟運動之中心機關。至此則已發生與政治體制之關聯性。該總會之綱領，仍襲用前同志會所定者，表面上雖仍以東亞聯盟運動爲標榜，而在該會成立之前，已將舊共和黨，舊大民會，舊興建本部，併入於本運動，舉行創立大會時，國民黨外之各黨各派，亦却有人列席，推選汪先生爲會長，并推選陳公博、溫宗堯、陳璧君、陳羣、徐良、諸青來、趙毓松諸氏爲常務理事者。因此之故，一般人均疑該會爲國民黨中心之大同團結，而掛起東亞聯盟的照牌。國民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氏，就該會之特質，有如下之說明。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不是政黨，是以國民黨爲中心，聯合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人士，展開運動之國民組織。現在中國對內對外最爲必要的，是中心勢力之樹立，本總會增大其基礎且把牠強化起來。但此爲國民黨的外延，並非黨的代位」。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林宣傳部長說是國民黨的外延，決非黨的代位。此語富有示唆，值得玩味。江亢虎氏以爲中國新體制可由各黨各派之對等聯合，結成一大勢力，其主張所謂各黨各派，當然包括國民黨而言，但以國民黨的立場，不可誤認或誤解該總會爲江氏所謂新體制之實現，應該極度警戒；同時應確認該總會爲國民黨的外延，國民黨之「向一國一黨主義還原移動」的意圖，好像予以一般的暗示。我想可以作如此解釋的。

在新中國之東亞聯盟運動，實際上果然如何展開，究能得到如何成果，今日雖難預料，然本運動若能正式展開，則國民政府和平建國之主張，可使一般民衆，澈底了解，民衆既能諒解政府之主張，即能積極的信

賴政府，支持政府，政府之立場，必定更加好轉。立場好轉，則政府基礎，自然強化起來。但是，中日事變之現階段，不能從從容容的坐待國民政府基礎之自然強化；且一般民衆之散砂的信賴和支持，是說可以是把國民政府的基礎，急速的而且確實的強化起來，這樣的樂觀，亦所不許。要想把政府的基礎，確實強化，應將支持政府的黨派，堅實的組織化，增大其細胞之組織，擴張至最大限度，這是必要的事。倘若國民政府的基礎，只有一個國民黨，則民衆之獲得，較爲容易，由細胞組織的擴大而成爲黨勢之擴大，亦必不甚困難；但若以各黨各派爲政府的基礎，各自努力於其黨勢之擴張，則將隨處發生相剋和摩擦，非但各黨各派，不能得到所期之效果，且做得不高明，就會暴露同類相殘的醜態，不免有同歸於盡之虞。如此看來，不可專以多大的期望，注重於東亞聯盟運動展開之結果，而將國民政府強化之問題，付之等閒，固已明瞭；同時又很感覺到與東亞聯盟運動之展開相並行，不得不另就國民政府基礎強化問題，分別考慮。從國民政府早日強化之見地觀之，則爲其基礎者，只有國民黨一黨，最爲有望。現就達到這個結論。

## 七

最後，試就檢討國府強化問題之際，最應留意的事項，略加敘述。即重慶抗日政權，於最近期間，縱能消滅，而僅僅消滅，猶與國民政府之強化，無甚裨益之一事。重慶政權之消滅，有三種途徑：（一）爲日軍所擊潰而消滅，（二）由內部事情（如渝共相剋及其他）之土崩瓦解而消滅，（三）與國府合併而消滅是也。然就此三者分別研討之，其爲第一與第二之時，與重慶政權，雖已四散消滅，而抗日「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及軍隊，將依然存在，抗日民衆亦復依舊殘留。第三之時，則抗日「國民黨」與重慶政權，雖與國府併合，而共產黨，軍隊和抗日民衆，仍將存留如故。故重慶政府，縱令於此種情形之下，歸於消滅，而抗日民衆與共產黨

及軍隊，仍復存在，此不得不預爲覺悟也。抗日民衆與共產黨及軍隊，既仍存在，則僅僅重慶政權之消滅，不足以強化國民政府。欲求國府之強化，在重慶政權消滅後，應遂行全面的民衆獲得之工作，以期獲得最大多數之民衆。然直接遂行此項民衆獲得工作者爲誰？即國府所視爲基礎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也。關於民衆獲得工作，由國民黨一黨任之，或以國民黨爲中心而由各黨各派任之，此兩者究以何者爲宜？依照中國目下之國情及民心之向背觀之，筆者敢斷定以前者最爲有效。

國府之強化，爲目前之急務。而欲期政府之強化，要先解決同政府基礎之問題，政府機構之整備，所謂善政之實施，歸順軍隊之收容等等，自政府強化之點觀之，都還是次要的事項。然則國府基礎問題之解決果何在？就是要決定現在之各黨各派主義和國民黨一黨主義，究竟那一種對於政府強化，最爲適當，最爲有效。（原文載『外交時報』四月號·不二譯）



# 強化國民黨

松本鎗吉

著者所以持此論者，良以國民政府與純正國民黨的關係，若不恢復到從前黨政的關係，而擴大強化國民黨的勢力，則國民政府，即無長成發展的希望。

如今日之純正國民黨，與他黨並立，則隸屬於國民政府，則國民政府雖與日本合作，勵行善政，還不能獲得民衆。蓋非獲得民衆，爲政府的基礎，則無論實施如何方策，其基礎必不鞏固。基礎不固，豈能望其成長發展。

中國民衆經事變之後，飽受戰禍，其心情更形複雜。其中有的已洗刷其抗日意識，參加和平建國者；也有依然固執抗日者，更有何去何從，不知所從者。如此龐雜的民心，如何把握，在成立伊始之國府，是艱難的工作。今之國府，對民衆所能爲者；僅宣揚和平建國主義，及安定民衆生活。

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獲取民心的工作，宜使純正國民黨任之。何則，第一須使國民黨不與他黨同列於南京國府之下。第二，宜使此黨有堅強勢力與政治力量，如在今日情狀之下，而欲其擔任把握民心，實有不能之概。

純正國民黨，更生於南京，而揭認和平建國，是國府還都前數月之事。故依事實之次序而言之：此黨的成長發展，當先於國府。然今則反是。國府之機構及陣容，已臻完璧，綸煥之美，炫耀於中外。而此純正國民黨，反形勢力微弱；其故安在，試列舉之：第一，國民黨在南京更生之際；自棄其一黨專政與以黨治國之

金字招牌。其二，國民政府之建立，由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合力之母體所產生。其他原因，姑不具論。然則更生之國民黨，如何自卸其金字招牌，和他黨同列，而隸屬於國府之下呢？這是有潛在的各種理由的；一言以盡之，爲當時環境空氣有以致之。

國府以還都的形式而成立，究其實則是各黨各派的混合政府。雖國民黨爲國民政府的基礎，政府樞要地位，悉爲黨員所占；但汪主席大公無我，並未致全力以擴黨勢，所以國府雖日就發展，而國民黨依然故吾，未見其伸展，試言黨態依然：政府必不能發展之故：

國府之機構與陣容，雖盡力整齊，若基礎不固，如建樓閣於沙上，不能望其成長發展。

中國民衆，如散沙一般，僅以善政，猶如澆水。集散沙爲屋基，不能僅加以水；國府之行善政，猶澆水於散沙，故善政行矣；民衆未必團結而爲政府的基礎。夫欲聚沙爲基，必加水門汀，而練之以水，乃成鋼骨水泥。同樣以民衆爲政府的基礎；亦必擴大強化國民黨，使黨爲其水門汀。明乎此理，則純正國民黨，仍如今日那樣微弱，國民政府，難望其發展的理由，就可明白了。是以國府既施善政，尤須擴大強化國民黨，使政黨一致；同心同德，獲取民衆。

至若國民黨隸屬於政府，則難望政府發展，是什麼緣故呢？是本末顛倒之故耳。不但中國爲然，凡世界上有黨的國家，黨必握其最高決定權，而政府爲其執行機關；若政府擁有最高決定權；而又爲執行機關；則又何必有黨？

次論日方的協助：其寄與國府的發展，界限若何，略述卑卑：良以世間輿論，尙有以爲日方協助國府，須用全力，以強化其基礎者。惟援助的目標，若限於政府，則對於強化其基礎，效果必有限。雖政府的機構備，陣容整，財力厚，兵力雄，如此未必能鞏固政府的基礎，已詳論之矣。在日方的協助國府，固須繼續其

責，但擴大而強化國民黨，亦爲當務之急。故必顧全兩方，始能達其援助的目的。不然其責任猶未全也。

今更生之中國，在國府之上，有中央政治委員會；凡政綱政策之決定權均握之，國民政府執行之。但此中政委會，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組成，委員會自身，無何等權威，在其背後者，也各黨各派互相牽制。故欲使之成爲一體，而握中央委員會的權威，猶緣木而求魚。

若使國民黨立於最高地位，掌一切權力，而政府司行政，黨則自行擴大強化，其勢乃易強大。蓋黨的強大，即政府基礎的鞏固；基礎既固，政府方能進展。回顧事變以前的黨政關係，國府發展何以若是其速，試加考察，則可知隸黨於府，實在毫無意義，而須例置黨政的關係及地位，方能使政府進展。筆者以爲黨政地位，如不變更，則進展無望，其理由如此。

其次當言其方法：政黨的關係，宜恢復事變以前的舊觀，同時，賦予國民黨而使在事變以前的主義方針。須是這麼做，國民黨才能有黨之權力，政治力，組織力；此等力量發揮起來，國民黨的強大擴充，也就容易了。但當實行之時，須有非常的勇氣與雄偉之決斷力。如以前之多端顧慮，終不能實行的。更生之中國，今在超非常時，與日本相同；國府的強化發展，事不宜緩。如認爲宜若是努力者，其勇毅之心，當油然而生。今之國民黨，如恢復事變以前之主義方針，（國民黨原則的主義，決非抗日主義），或將發生其他黨派的如何處理一問題。然今日的中國，無紛立小黨派的必要，（日本早已消除一切政黨），各黨派如能捨其小異，趨於大同，則以大乘的見地，合流於今日國民黨之幟下，問題就解決了。

有人以爲今的國民黨，恢復事變以前之舊觀，會不會重蹈以前的覆轍？這是不必擔憂的。今日的國民黨領袖，既堅持和平建國主義，忠實可信，決無再演過去失策之理。此時必不陷因噎廢食之愚。

如以爲上述方法即時斷行，有種種困難，則次善之策，莫若儘如現狀，而從事擴大強化國民黨。但此時

黨的擴大強化，當然不能像最善之方法那麼容易，是不待言的。茲列舉治標的辦法如下：

- 一、由 汪主席鼓勵黨員之士氣。
- 二、擴大黨勢於各地，多設各級黨部，整其機構，飭其陣容；努力廣收地方黨員。
- 三、使中央及各級黨部與黨員，竭力活躍，壓倒重慶方面國民黨之活躍，奪取他們的地盤。至少限度，應使在黨之同志，不視國民黨為可有可無。

其他或尚有種種方法，可以擴大黨務，但能依上法行之，或稍有效驗。

今欲強化國民黨，不可限於中央黨部，即各省各縣，亦須協助其擴張黨務，得助者助之。如但顧中央，而地方則淡然視之，則黨之全體，不能擴大強化。對此擴大強化工作，日本方面，亦必樂予贊助。

以下一言強化民黨與清鄉工作的關係。

國民政府於本年七月一日起從事清鄉工作，在中日軍警協助之下，以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推行於三角地帶，以全面和平為前提先行完成局部和平。以前的和平區域，有點有線而無面積。今欲使和平區域有面積，可以作模範之和平地區，必從事於清鄉。此種政府之措置，深為欽佩。故作者曾親至其地，從事觀察，但認為是項工作，甚為艱鉅。

清鄉工作之次序，先由中日軍合力驅除共產份子，然後以政府之政治、經濟、文化、移植於該地，使現出理想的和平區域，其次序無可責難。然清鄉工作之實施地區，近於上海，為事變勃發前抗日氣餒最張之地，而在江南饒富之區，共黨盤據其間，軍資仰給於是。政府先從此處着手，不為無見。但即此愈見其困難。且敵分子之掃蕩不難，將來之建設期則不易，今雖由政府力量，特設機關以行之，然苟不從民力着手，恐政府力量有限，難於奏效。故亦應強化國民黨，使協助政府作成偉業。本人對於政府清鄉的成功，日夕祈禱，

不落人後；及今擴大國民黨，以助清鄉，尙屬未晚，希望中日兩國人士，注意及之。（原文載外交時報九月一日號。守瓶節譯）

# 中國民生問題解決之要諦

松本鎗吉

## 一

目前國民政府最緊要之問題，厥爲安定民衆之生活。

國民政府統治下之民衆，生活迄今未見盡善，一部分民衆仍喘息於痛苦生活之下，乃爲周知之事。以和平建國爲標榜之國府，成立以來已歷一年零七月，而仍未能理想地安定統治下民衆之生活，此不但爲世間質問中央政府成立之意義何在，且國民政府亦難期待有健全之發展。職是之故，國民政府當局，速應注全力解決此問題，同時日本方面亦有集中力量加以援助之必要。

國民政府爲發展本國政府而必須推行之事，多如山積，日本政府爲強化國民政府而應加以援助之部門亦頗多，然而，逐一實行，就國民政府現在之實力言，爲不可能，決非日本方面之賢明政策。縱使可能，而如此山積之問題，欲同時染指，此無異同時逐鹿二兔，勞多而效少，徒浪費精神力與時間耳。現在國民政府當局之做法與日本援助之辦法，均犯此弊，所以雖不斷努力，而時迄今日，仍不能獲得滿足之結果，此實因感中途廢棄之故。國民政府，因尙屬草創時期，雖不得不整備新生政府之體裁，但今後，決無同時着手如此急策之政策必要。尤其是，值茲萬事均爲重點主義時代，國民政府當局之發展工作與日本關係當局之援助工作

，均應依照重點主義而實行。依照此重點主義，最先須着手者，則為民衆生活安定。

## 二

所謂應將強化國民政府工作之重要點，置於民衆生活之安定，並非國府與日本兩關係當局，迄今仍未着手此問題之意。中日關係當局，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為解決此問題，確曾盡過最大之努力。尤其是：汪主席等國民政府之首腦，為早日解決此問題，費盡苦心，在可能範圍內，並傾注全力以求其實現。然而因受種種之牽制，終無效果。所以汪主席乃於今年還都一週紀念日紀念典禮中，陳述如次：

「一年以來政治經濟各種情形，不能說沒有一點進步，但是全面和平沒有實現，施政上無論是行政的效率，以及經濟生活之改善，都受着限制與束縛，不能有充分的發展」。

深知國民政府統治下之一般民衆，喘息於痛苦生活之下者，不單為汪主席等國民政府關係當局，本多駐華大使等日本駐華官憲，均十分明瞭，且咸認為此與成立不久之國民政府之生存與威信，有密切關係，乃與國民政府緊密連繫之下，講求對策。時至五月初旬，因現地日本當局已決定方案，為建議中央起見，本多大使，乃於五月中旬返歸東京，與中央關係當局有所協議，繼之汪主席亦於六月下旬親自訪問日本，舉行懇談。汪主席與本多大使與日本當局，對於國民政府統治下之民衆生活安定問題，究竟如何協議，如何決定，因迄今仍未有所發表，故正確情形，不得而知，但大體上，就本多大使入京前五月十三日在大阪旅館對新聞記者所發表之談話中，可以略知一二：

「國民政府統治下民衆之生活水準，較之戰前，約低落三分之一，其原因實在於日本軍隊物資搬入之統制。此物資搬入統制之目的，固在防止援蔣物資之流入，為當然之措置，然而因此而招至民衆生活於極度痛

苦之中，此種事實，吾方亦有深加考慮之必要。又側面增加民衆生活痛苦者，則爲各地所設立之各種國策會社。誠然，國策會社爲振興國民政府統治之地區，協助國策之推進而設立者，自有其必要，但因不少國策會社始終持以利己之態度，雖名目上爲振興地方，實則增加民衆生活之痛苦。國民政府爲協力日本處理事變，建設東亞永久之和平而樹立者，日本全面協助其發展，亦爲當然之事。然而，如根據此精神，今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國民，喘息於痛苦生活之下，陷國民政府於苦境，此種事實，日本自不能默視，且應負某程度之責任。今作爲對策者，首應緩和促成生活水準低落原因之搬出入物資之統制，使物資得以潤澤，以圖物價之低落。此固尙有軍事的必要性，但其程度之緩和，則爲絕對之必要。其次必須努力使國策會社改變經營之態度，以冀達到本來之使命。本人今所考慮者，即國策會社，應限於經營各種國策實行時不可缺少之企業，都市之公共汽車，自來水及電話等事業，應歸還中國人經營。

從此談話中，吾人極易窺知本多大使等現地當局，對於安定和平區域民衆生活方策之骨幹有二：一爲物資搬出入統制之緩和，二爲國策會社之調整。

安定民衆生活之方法，自極多，本多大使毅然指出上述二辦法，爲最適當而有效，已無議論之餘地。作者前於六月中旬，亦曾視察和平區域之江南三角地帶之民情，達一月之久。當時作者即深感一般民衆之生活，極爲困難，蘇州、常州等地之一部份民衆，咸嘆：「吾人之生活，現仍不能安樂，更因物資之缺乏，物價之高漲，生活愈感痛苦」。因此可知一般民衆生活極度陷於痛苦之原因：一爲生活必需品物資之缺乏，二爲物價之騰貴。所以作者歸國時，即深感如欲滅除民衆生活之痛苦，使彼等安居樂業，則唯有先使物資供給潤澤，同時抑制物價之高漲。



日本軍隊所實施之物資搬出入之統制，誠如本多大使所云，其目的在於防止援蔣物資之流出入，此在繼續與抗日政權作大規模戰爭之日軍，自屬當然之措置。但是因實施此種統制之結果，和平區域內物資，形成不足與缺乏，亦為不容否認之事實。所以日本軍隊為早日消滅抗日政權，此種統制最少限度維持現狀，固為絕對之必要，同時為安定和平區域內之民衆生活，此種統制，非儘量設法緩和不可。然而執輕執重，頗難決定，日軍當局曾為此問題，處心積慮，諒亦為局外人所洞察。

本多大使向中央當局進言之結果，關係軍當局對於此問題，將採取如何之處置，即為一般注目，於是日軍乃於九月二十六日，表明其態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及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部，於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公布揚子江下游和平地域物資移動取締暫行規定，自十月一日起實施，同日陸海軍當局，並發表談話，大要如次：

日軍前為阻止華中一帶援蔣之經濟行為，及應付軍票之對策，實施物資搬出入之統制。今鑑於國民政府政治力之發展，及和平地區人民生活安定之緊要，此次擬將物資移動管理辦法，加以適當及合理之改訂，以達其目的，其要點如次：

第一、在中央及地方，由中日軍政機關組成物資統制委員會，審議由上海搬經各地區物資之數量。

第二、在和平地區內部之移動限制，應力予緩和。

第三、尊重中日商人同等待遇之意旨，迅速於前線實行按票給物制度，或類似之制度。

日軍當局忍作戰之不便，毅然採取此種措置，誠堪敬服，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梅思平氏，爰亦於九月二

十六日發表如次之談話，以表對日之謝意。

「日本朝野上下，基於東亞共存共榮之共同觀念，對於吾國之經濟復興，及民生安定，寄與無限之關切與同情。對於和平區域內地各處物資移動之限制，決在最短時期內，逐漸撤除。故今後凡在和平旗幟下之商民，均能自由運銷各項商品（違禁品除外）。吾人對於友邦方面，盡力匡助吾政府當局，改善人民生活之熱忱，表示十二分之敬佩。實業部現已設立特種商品運銷管理局，將茶、繭、生絲、蛋及其製品等四項物資之運赴上海地埠者，實施管理，一俟辦有成效，再行徐圖推廣」。

#### 四

其次，一述側面增加國民政府統治下民衆生活痛苦之國策會社之調整問題。

本多大使所指摘之國策會社，即爲華中振興會社之「子」（直營）會社，現此子會社有十三個。

一、華中鑛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股份有限公司省略）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八日設立 國民政府之普通法人資本金三千萬圓

（營業）有關華中鐵鑛及其他鑛物之鑛業與其他附帶業務

二、華中水電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金四千三百萬圓

（營業）甲、華中之電氣，自來水事業

（一）電燈、電力、電熱之供給

（二）電氣機械、器具之販賣或賃

貸 (三) 對此種事業之投資及融

資 (四) 附帶事業

乙、自來水事業

一 自來水供給 (二) 附帶事業

(電氣) 甲、純營業地域——上海市閘北 南市中心區 浦東 真如 吳淞 南京 杭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蕪湖 安慶 廣州

乙、軍委託地域——蘇州 九江 漢口

(自來水) 甲、純營業地域——上海閘北 南市 浦東 南京 杭州 鎮江

乙、軍委託地域——漢口 武昌

三、上海內河輪船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二百萬圓

(營業) 甲、華中主要內河航路旅客與貨物之輸送 (乙) 船舶之租賃 (丙) 倉庫及碼頭之經營 (丁) 附帶事業

營業路線) 蘇州河方面十三線 黃浦江十一線 長江方面十六線

四、華中電氣通信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金一千五百萬圓

(營業) 甲、華中電氣通信事業之統制經營

乙、電氣通信設備之租賃 丙、附帶事業

(電報局數) 四七

中國民生問題解決之要諦

(市內電話) 上海 南京 蘇州 杭州 武漢 蕪湖 吳江 盛澤 常熟 鎮江 揚州 蚌埠

(無線直通電話) 上海南京——日本本國間 上海——京城間

五、華中蠶絲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一千萬圓

(營業)甲、機械製絲業之經營 乙、蠶絲之製造及配給 丙、關於產繭利用新規之加工業 丁、必要之土絲  
賣買 戊、附帶事業

六、上海恆產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二千萬圓

(營業)甲、都市建設事業 乙、港灣建設事業 丙、土地及建築物之買賣 丁、不動產信託業務 戊、附帶  
事業

七、華中都市公共汽車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三百萬圓

(營業)甲、華中主要都市市內公共汽車事業 乙、乘客及貨物汽車業 丙、附帶事業

(營業地域) 上海 南京 蘇州 杭州 無錫 鎮江

八、華中水產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五百萬圓

(營業)甲、生魚批發市場之經營及水產物之買賣 乙、以華中沿岸為根據地之汽船捕魚漁業及機船曳網漁業  
丙、製米 冷藏 冷凍 漁獲物之搬運

## 九、大上海瓦斯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三百萬圓

(營業)甲、瓦斯之供給 乙、瓦斯副產物之製造及販賣 丙、附帶事業

## 十、華中鐵道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金五千萬圓

(營業)甲、鐵道事業 乙、汽車運輸事業(都市公共汽車業除外) 丙、附帶事業

(經營路線) 海南線 海杭線 吳淞綫 蘇嘉線 南甯線 津浦線 淮南線 淮南北線

## 十一、淮南煤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設立 普通法人 資本金一千五百萬圓

(營業)甲、石炭之採掘販賣 乙、附帶事業

## 十二、華中鹽業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金五百萬圓

(營業)甲、鹽之買賣及輸出 乙、對於製鹽事業之融資及技術之指導 丙、鹽之製造及精製 丁、附帶事業

## 十三、華中輪船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設立 特殊法人 資本金三千萬圓

(營業)甲、航運業 乙、碼頭倉庫業 丙、附帶事業

華中振興會社之十三個子會社，均為國民政府成立以前設立，因經營華中各種事業，故國民政府雖告成立，經濟部門中主要之事業，幾無一殘存。第以此等子會社中，猶如本大使所言，頗多囿於利己觀念，以

會社之利益爲本位而經營，故結果徒增加一般民衆之痛苦。所以欲求國民政府統治下民衆生活之安定，端在此問題之解決。國策會社之事業、業務、經營之態度等問題，姑置別論，國民政府爲培養充分發揮經濟力，各種國策會社之業務中，在不妨礙日本振興大陸之範圍內，希望能移讓一部份，亦爲當然之事。日本方面關係當局，對於此點，自國民政府成立後，亦曾加以慎重之考慮，祇因各種關係，時迄今日，此調整方策，仍未能具體化。

日本方面關係當局，對於國策會社之調整問題，如何解決，雖不知其詳，但九月初旬會傳說「強化國民政府問題，本多大使返任後，以日本大使館，與亞院爲中心，已開始交涉中，關於華中振興會社所屬之中日合辦會社中之一部份，完全移交國民政府一點，交涉已具眉目，最近已達正式決定之階段」。但九月八日抵達上海之華中振興會社總裁兒玉謙次，却發表談話稱：

關於華中振興關係會社之調整問題，本人之意見，認爲將經營之主體，交由中國方面，今尙非其時。然而鑑於中日合辦之精神，純經濟的事業如公共汽車，自來水，電氣，水產業等之會社，今後擬大量吸收華人方面之人材與資本，以舉共同經營之實。俟會社稍具基礎且有事業成績後，再移交華人，似較妥善」。

兒玉總裁之主張，約略言之，意即華中振興會社之子會社移讓與國民政府方面，時期尙早。然而日本方面現地當局，因鑑於兒玉總裁談話之內容，與現地由大使館所發表之意向，多少有違反之處，於是現地負責官廳與亞院華中連絡部次長，爲解釋誤會起見，特於九月十日發表談話如下：

一關於協助國民政府，日政府由大局見地上，於各部門正互相加以考慮之中，目下各方面所議論之調整國策公司之問題，亦爲其一，且將全部國策公司之經營，現在移交國府，時期尙早，雖屬當然，但

於今日，視性質而可移交者，亦屬有之。結果是爲由中日共存共榮之大局見地，依照中央之趣旨所決定者，當地各機關，正考慮是種性質，而熱心加以調查研究之中。」

根據次長之談話，可知現地關係當局，認爲國策會社中，縱今日即移讓與國民政府，亦無妨礙，刻尙在研究中耳。但結果如何，據作者之推測，諒遲早定能將某種國策會社交還與國民政府。何況此亦爲吾人最希望者。蓋關於國策會社問題，作者與本多大使誠有同樣之感覺，國策會社如任其如現在狀態存在，安定民衆生活，強化國民政府，不論誰人，均認爲不可能者。

## 五

今物資搬出入之統制，因日本陸海軍當局採取毅然措置，已稍見緩和；國策會社之調整，亦可謂漸見具體化。然則僅此種物資搬出入統制緩和與國策會社之調整，即能安定和平區人民生活乎？事實昭示吾人，僅此絕對不足以安定民衆之生活。因此舉僅能消極的減輕目前生活之痛苦，如真欲安定民衆生活法，除現在生活之痛苦，則有更進而（一）振興農村，（二）復興各種產業，使商民經濟之活動，自由活潑之必要。換言之，非使統治下民衆之收入增加，生活水準向上，確立自給自活之體制不可。

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梅思平氏，九月二十日曾發表談話，說明今後經濟建設之方針，其重點與方針，堪稱妥當。氏稱：

國民政府今後之經濟建設，有三大工作方針：一爲和平區域內民生問題之解決，二爲各種工業之開發。關於民生問題，先由糧食管理委員會，售賣糧食，統制配給，以外如各種食糧之增產計劃，農業之改良等，亦漸次設法具體化。工業之復興，則先着手手工業之復興，在最短期內，和平區域中，欲確立

某種程度之自給自足經濟。現在最少限度，努力必需品之自給，其次則誘導抗戰區之工業，移入於和平區域內。金融，商業，亦本此原則以轉移。清鄉工作雖尚未及於經濟工作之階段，但已計劃改良農事，救濟農村金融，使物資補給豐富，確立農村之基礎」。

欲求民衆生活之水準向上，同時復興農村與都市，乃事不待言者，然農村之復興較之都市之復興爲困難，且需相當時日，都市之復興，雖非短時間，即可成功、但物資之搬出入，不使之有所困難，使物資得以潤澤，同時復興各種工業（手工業與普通輕工業），則都市民衆之生活，自可逐漸恢復生氣，恢復生氣後，則生活之水準，自然能得向上。都市民衆生活改善後，漸次及於農村，農民生活之水準，自必與農村復興工作，進展同時向上。所以農村復興工作之實施，亦屬必要。國民政府關係當局，今方致力於都市各種工業之復興商業之繁盛，頗有助益於各都市工業之復興者，厥爲日本軍隊當局，還在日軍管理下之各種工廠。

日本軍隊當局發表決定交還工廠，係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那天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曾發表聲明如次：

「事變以來，在占領地域中之鑛山工廠等華方財產，置於軍管理之下，繼續其經營，其故蓋在於此，實僅爲代替新政府或逃避之業主，暫時由軍加以管理保護而已。今日本軍占領地域之治安，逐漸回復，國民政府亦將成立，故軍擬以從來管理之華方財產，儘速移交於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交還於合法之所有者，真屬敵產或業主不在者，則移歸政府管理，以圖其發展，而舉中日提攜合作之實責。」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廣東亦有九工廠之交還，華中、華北等地亦相次交還工廠，及至三十年十月初旬，交還中國之工廠，已達一百零四處之多。日軍交還之各種工廠中，華中計五十五處。

一、依照廠主申請者



染織廠六（上海二、無錫四） 紡織廠九（上海三、無錫四、蘇州一、蕪湖一） 綿織廠一（上海）  
銅廠一（上海） 橡皮廠一（上海） 襪汗衫廠一（上海） 機械製造廠一（上海） 水門汀廠一（江甯） 教育玩具廠一（上海） 製粉廠二（上海一、鎮江一）

二、依照中日雙方經營者之合議

織物廠五（常州四、上海一） 漂染廠五（上海） 製粉廠二（上海一、蕪湖一） 製紙廠二（上海） 印書局一（上海） 油罐廠一（上海） 綢廠五（上海） 造幣廠一（杭州） 碾米廠一（上海） 兵工廠一（上海） 染織廠二（上海） 木廠一（上海） 煉炭廠一（上海）

以上各工廠返還後，中國方面之經營者，如經營得宜，生產自易增加，生產增加後，則物資可以潤澤，民衆亦可以低廉之價格，購買必需品，故此舉不第足以繁榮都市，對和平區域內之自給自足，貢獻尤大。

## 六

解決民生問題之最終目標，在於一般民衆之安居樂業。然而欲達到此目標，成爲目前急務者，則爲先拯救民衆於現在生活之苦境之中，更進而復興都市農村，使生活水準得以向上。同時欲使民衆真正安居樂業，國民政府及其統治下之民衆，則有持有以自力維持治安實力之必要。日本軍隊維持治安，生活水準隨之增高，仍不能稱真正安居樂業，推其原因；（一）民衆深懼日本軍隊如果撤退，則不能安居樂業，（二）端賴日本軍隊維持治安，於是統治下之民衆，則有第一點之恐懼心理。不論日本軍隊如何撤退，如無以自力足以防遏抗日勢力之實力，一般民衆，自不能高枕無憂。職是之故，現進行中之清鄉工作，確具相當之意義。國民政府自七月一日開始之清鄉工作，其真正目的，在於以全面和平爲前提，先求局部和平之實現，此在 汪主席屢

次聲明中，已足明瞭。汪主席所言之局部和平意即某特定地區之治安責任，完全歸由國民政府負擔，成爲撤離日本軍隊之和平區域。清鄉工作完成後，國民政府能以自力維持清鄉後之地區，則該地區內之民衆，始能安居樂業，非但局部和平可以實現，同時民生問題，亦能真正解決。但此處頗值注意，即日本軍隊能獨力維持治安，若此治安責任歸由國民政府負擔，僅國民政府事警之力量，縱裝備如何優良，仍不能維持治安，仍絕對有賴民衆積極協力之必要。其原因，吾人慎察事變前國民政府如何維持治安，即可得知。此並非言國民政府軍隊之力量較之日本軍隊爲劣之意，力量縱相同，但日本軍隊與國民政府之軍警，對於民衆之控制力則不同。換言之，就中國一般民衆言，日本軍隊爲外國軍隊，並非本國軍隊，國民政府之軍警，則爲本國之軍隊。所以縱以同樣之力量抑制民衆，而民衆之感覺，則不相同。

國民政府爲維持治安，則有獲得民衆積極之協助，使國民政府與民衆融爲合一體之必要。所以必須使民衆澈底了解和平建國之真正意義更誘導彼等積極參加和平建國運動，與抗日勢力相搏鬥。如不加以此種誘導，民衆生活之安定工作，亦僅同時的不能謂正真永久之安定工作。故欲解決民生問題，實施都市及農村之振興工作與思想工作，有同樣之重要。認爲實施善政，足以使民衆消滅抗日意識之殘滓，固無錯誤，然而善政之實施，未必即可拂拭抗日之意識，國民政府如僅實施善政，抗日意識之殘滓任其存在，民衆內心對政府決無好意，關於此點，諒國民政府與日本當局，定深知之也。（原文載支那十月二號，孫鈞譯）

# 汪主席來日和事變處理

神尾茂

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 汪精衛先生的來訪日本，無論從何種意味上說，都是值得特別記載的劃時代的事實。尤其行將由此訪問而益見增深的中日兩國的諒解，對於中日軸心的強化一定有偉大的貢獻。

但我們應得切戒的，是此際過大地評價政治效果。過大評價的反動，必發生失望；失望則牽制努力，養成無作爲及怠惰的情緒，對於時局的進展，非但無益，反將產生有害的後果，這是過去不乏先例的。故我們於談論 汪主席的訪日，不可以爲全面和平因此可以立致。應切記着全面和平，前程尙仍遼遠。從日本政府過去一年間所表示的態度來說，就是維持三分天下的形勢，已感到周章費力；所以由 汪主席的來日所推進的中日諒解，若能做到強化國府，從而確立三分天下的形勢，已可算是重大的成功了。

提起三分天下論，誰都會想起中國的三國史。觀現在中國的政治情勢，而評論三分天下的形勢，是極有興味的事。且其政治的分野，又和三國史當時相一致，倍覺有味。詳言之，西北有共產黨的勢力，不啻是古時的魏國；西南有重慶政權，相當古時之蜀國，東南有國民政府，可說是當時的吳國。現在這三種形勢，和古時一樣，彼此虎視眈眈，等待時機，統一天下。所異者，第一、當時和今日的中國的國際環境，大不相同；而此外國勢力的對立，使三分的形勢益爲激化。第二個不同之處，西北的共產勢力，以蘇聯爲後援，西南的重慶政權，依存英美帝國主義；相反地，國民政府，則擬和日本合作，實現全面和平。第三，兩者的民衆，也和各該政府相同地信賴外國的勢力，後者，——國民政府、則尙得努力，使其民衆改變對日情感。這是

國民政府的難題。此困難，視日本方面的行動如何，可化大，可化小。故日本非有這樣的同情及明察不可。否則，前途將未許樂觀。西北西南兩政權，各信賴外國勢力，增深其相互關係；反之，國民政府和日本的關係，則大異其旨趣。這是爲什麼呢？實際上，和平區域比之其他兩政權，天產更爲豐富，文化更爲進步，產業更爲發達，以人口而言，也較其他兩地方爲多。四川雖古稱天府，但滇，黔，桂等省的貧窮，也是自古有名的。至於西北的陝甘，尤爲貧瘠，毫無自立的資格，國民政府的指導精神爲和平建國，和日本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祇須能够使民衆澈底了解此精神，日本方面就不再需求什麼。換言之，欲強化國府，促進其政治的活動，須得凡事有犧牲精神而實行政策，這樣，才是日本之利。依我們的見解，日本朝野中，對此點尙有其缺乏認識者。汪主席的來日而能得糾正認識的機會，則纔能對付三分的形勢，日本的立場得以強化，過去的危境也可脫離。至於全面和平，是今後之事。

因汪主席的訪日，預料中日軸心將有強化，但若以爲就可以致全面的和平，則屬求之過急，已如前述了。周佛海先生於六月十九日致書朝日新聞，論重慶政權的前途，其中有云：……我常對日本友人說，我們不可急急乎以爲重慶就可屈服。日本而具長期戰的決心，才是使重慶在短期日內屈服的方法。……這是現在最適當的態度。

依周佛海氏的話，重慶前途的消長，悉視國際情勢如何。美國一日不停止其援蔣，重慶的抗戰也必一日不停止。在中日事變業已失去獨立性而成爲世界戰爭一環的今日，這種情勢，毋寧是當然的。是故依汪主席的訪日，祇能商談強化國府的方策，決不能期待說服重慶政權，實現全面和平。國府的強化，對於鞏固三分天下形勢下的國府地位，——即先樹立和平的模範一事，是很有裨益的。倘若目標弄錯，恐又將走入所謂「和重慶直接交涉」的迷途，結果反而使重慶益增強其抗戰意識而已。

我們更應銘記的：所謂在三分天下的形勢下，鞏固國府的地位，並不是說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是最終的目的；這是等到機會到來，統一中原的一種準備，本未先後，非有一定的步驟不可。

汪主席訪日的結果，上年在南京簽字的中日基本條約，形將具體實施。實施之際，應致意於國府地位的增強，決不可妄抱較此更大的期待。蓋全面和平，須在重慶消除其抗日意識後，方可蕪致；抗日意識的消滅，祇有斷絕美國援蔣的一法。這是周佛海先生已經指出的。這一點，是日本當局者於實施中日條約，圖強化國府之際所不可不理解的。否則，施策目標既誤，程序顛倒，結果祇有失望，馴至對國府的期待也告薄弱，處理事變的勇氣及熱情也將喪失。我們此際的期待，不可超越一定的限度。中日事變既已改變性格，構成世界戰爭的一環，則處理事變的方針，也應和此適合而變化才行。時在今日，僅是國府的強化，尚不能結束事變。如上所述，祇有國際情勢的變化，才能使重慶拋棄其抗日意識；所以除等待國際情勢的變化而圖結束事變外，別無他法。但與其等待，毋寧積極促進國際情勢的變化，更爲有效。倘若不待國際的變化，而貿貿然和重慶招呼，結果一定失敗，這是在過去不乏其例的。

故處理事變的方策，實不出國府的強化工作及國際情勢的誘導工作兩途。孰輕孰重，當然視情勢的變化而定。但國府的強化工作及國際情勢的誘導工作，兩者的性質是決不相矛盾的。須使互爲應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正如周佛海先生所說的，重慶停止抗戰與否，悉視美國的援助之繼續與停止以定。基此認識，世人或以爲應推動美國，加重慶以壓力，使之和日本和解者。但霞關方面，則一再加以否認，謂日本斷不容第三國的介入，爲美國計，允宜於此際束身自好，和蔣介石分手。

依我的意見，僅責重慶的拉入第三國，而主張 Hand-off，未免有跼踖於中日事變單獨解決論之嫌。

推動美國，或也可說是國際情勢的誘導；但這種見解，其正確之程度，較之中日事變，應視歐洲主要戰場的勝負如何或和解如何，方得解決，究差一籌。美國和重慶的關係，不能和歐洲情勢分別而論。欲誘導國際情勢的變化，使重慶屈服，不僅應使美國和重慶斷絕關係，更應使美國和世界戰爭絕緣。日本而能設法使美國停止援英，使之出來斡旋英德妥協，重慶才有覺悟之日。汪主席此次訪日，已否得到關於中日兩國的對美政策的諒解，我人不得而知。但我國今後努力的方向，應依以上的考察決定，希望外交當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

要而言之：世界戰爭，結果總得解決。或者須經過持久戰可才達到，或者立刻解決，也未可知。但和東洋人的礙於面子，除持久戰外別無解決之策，而陷於長期戰者，是異其旨趣的。任何人也不能斷言，美國式的政策轉換，在最近的將來絕對不會發生。至此，中日事變，不也簡單解決嗎？此時，日本若不站定腳根，就得大感狼狽。故爲今之計，實應鞏固東南半壁，建築中日合作的模範試驗區，不受任何第三國勢力的牽制，確立共存共榮的地盤，迎候和平時代的再來。國民政府的強化，固然不能直接促進事變的結束及全面和平的確立；但爲備持久戰爭暨和平恢復後的建設時代，這是絕對必要的準備工作。汪主席的來日，若能促進此工作，就可說已收獲偉大的成功了。（六月二十一日）（原文載「改造」時局版七月號道之譯。）

# 中日經濟提攜與中國民族性

桑島主計

自從近衛聲明發表以來，大家都希望能夠根據他的聲明，來解決中日事變。固然欲解決中日事變，除了根據近衛聲明之外，再沒有其他更合理的途徑了。近衛聲明之中，包含着三大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提攜。講到經濟提攜，我們不能不考慮到資源開發與產業復興。中國固然是一個資源豐富而產業落後的國家，但是將來在經濟提攜的原則下，對於各種資源，將以何種前提，作合理的支配，對於復興事業，將以何種方式作有效的協助，都應當預先經過縝密研究作成方案，才可應付。否則中日事變縱能解決，對於經濟提攜，還是無法實行的。如以紡織業而言，有人說：在中國雖然產棉極富，可是紡織技術，決不能發達到和本一樣的程度；同時日本的棉紡織業，雖然發達，但是國內產棉極少，過去都須仰給於美國，印度和埃及，所以將來在新秩序之下，我們可以把中國作為原棉供給地，而以棉紡織業，全部讓給日本。可是同時亦有人主張：中國的紡織技術，雖然落後，但是勞力豐富，工資低廉，且在本國，即已擁有四萬萬人的消費者，無論生產與消費都合乎紡織工業的條件，所以棉紡織業的繁榮發達，應當讓給中國，而日本祇須在技術上從旁協助。這兩方面的主張，都有理由，但是我們現在有沒有決定究竟採取那一種主張呢？在決定之前，我們有沒有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之必要呢？在沒有決定的現在，要是中日事變，急轉直下的解決了，那麼至少對於棉紡織業一項，就沒有辦法去實行合理的提攜了。棉紡織業如此，其他一切的產業和經濟機構，都是如此，所以講到中日問題，尤其講到中日經濟提攜，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再就中國的立場而言，雖然希望在

中日提攜之下，日本能够利用他先知先進的地位，來幫助中國開發資源，但是恐怕並不一定願意站在純粹的原料供給國地位。雖然對於日本所需要的原料，可以給予相當的優待與便利，但是亦不允許日本作無限制的徵取，甚至全部取去，因為中國既欲復興，當然也得留一部分供給自國產業上的應用，同時爲了向國外輸入產業上必需的機械之類，也得留下一部分來輸向第三國。這樣在實現經濟提攜之前，對於產業部門的分配，就非得有一個通盤籌算不可。

至於中國的戰後產業，怎樣才能復興，固然在技術與資本方面，需要日本來協助，但是協助的方式，亦是值得考慮的。譬如中日合辦，固然亦是方式之一了，但是此種方式，就過去歷史來看，很不容易得到圓滿的結果。除了北京的一個人壽保險公司和山東的一個煤礦公司，其合辦成績，尙可在相當程度內認爲滿意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算得成功的。所以關於此點，亦需要在實施提攜之前，深切注意，至少應先將過去中國和英美各國所合辦的許多事業，作成詳細調查，然後研究其結果，鑑別其優劣，以爲決定合作方式的根據。此種工作，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幸而最近已有許多專以調查爲目的的機關，相繼成立，預期對於將來實施方案的決定，當有偉大貢獻。

除了上述之外，對於怎樣去把握中國民衆心理一點，亦非常重要，因爲欲求中日兩國的真正合作，非先求中日兩國人民心理的澈底了解與真實親善不可。如以日本的立場來講，就是先要使得中國人民，都能够對於日本人有一種普遍的好感，和充分的信任，中日提攜的真正局面，才能展開，否則同床異夢，決不會有良好結果的。但是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其實亦並不甚難。我們單就協助國民政府的強化來說，現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民衆，我們祇要想方法給予他們一點物資供應上的便利，和事務接觸上的優容，使他們在物質方面，得到了相當的滿足，精神方面得到了相當的安慰，則國民政府，就能得到民衆的擁護，而自然強



化起來。同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就發生了好感。等到中國人民真能够對於日本發生好感，那就什麼事情都容易辦了。

作者曾僑居中國十餘年，所以對於中國人心理，比較的體驗得多。中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傳統的富有自尊心，所以最厭惡別人對他們有一種傲慢的表示。可是日本人遇見了中國人，却偏偏喜歡自命不凡，把優越感十足的表現出來，因此無論在私人往來上，或在事業接觸上，都不免引起中國人的厭惡，甚至在平時閒談之間，一提到日本人，就不懷好感，這種微妙的心理作用，實在對於兩國人民的親善，有着莫大的阻礙。就目前的日本地位而言，因為日本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盟主，所以在某種條件之下，固然應當保持着盟主的身分與地位。例如日本的科學，全世界都已承認比中國進步，所以在科學方面，日本國民，當然不妨有一種優越感，同時對於這一種優越感的流露、當然也不會引起中國人的厭惡。但是在平常的私生活上，或在個人的友誼接觸上，要是處處表現着優越感，而一味輕視中國人，甚至存着日本人無處不優於中國人的心理，那就超過盟主國民應有的程度，而要引起他人的反感了。這一點希望日本國民，今後能格外注意。

亦有人批評中國人是受恩不知，知恩不報的，其實並不盡然。大凡一國人民的性格習慣，以及生活嗜好，有很多地方，須受其天然環境的支配。例如日本國土既狹，得天又薄，所以人民的氣度，亦隨之而趨於狹隘；因為氣度狹隘，所以感恩既易，受恩亦急於圖報。可是中國地面僚闊，物產豐富，使人民的胸襟，自然曠達，因為胸襟曠達，所以施恩於人，既不望報，受恩於人，亦不急欲圖報，並且所謂施恩受恩，在施之者，有時既並不自覺其為恩而施之，在受之者，亦往往並不自覺其為恩而受之，因此報之一字也就在雙方之間，無所存於芥蒂了。此種情形，確非久蟄內地的日本人所能體會而得。在日本人的眼光中，雖覺得中國人是受恩不知，知恩不報，但是中國人，自有其至情動人的地方，而為日本人所不及的。例如作者前在中國僑居

的時候，曾相交了一個中國人，論感情固然不惡，論交情却並不甚深，可是回國了兩年，再到中國去，他竟格外親熱，甚至每天備了豐盛的膳食，送到旅館裏來，這種熱情與厚意，決不是日本人所能辦到的。普通對於一個外國旅行來的熟人，最多不過招待一二次就完了，那裏會有這樣至誠呢？作者以爲中日兩國人民，假使真欲提攜，必須先求兩國人民能互相了解其對方的性情氣質，否則徒託空言，無補實際的，所以特地把上項親歷的事實，介紹於國人，可是講到互相了解的一點，作者以爲日本既自命兄長，理應先認識中國，然後再設法使中國人能認識日本，假若單就各人所接觸的少數中國人，作爲榜樣，即行武斷的以爲所有中國人，都是如此，那是錯誤的。要是中日兩國人民之間，都彼此有了認識，就可由認識而發生諒解，再由諒解而發生同情，彼此有了同情，就自然可以互相親密起來，而得到真正的友好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中國人民，雖然因爲長年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極希望能得到一點物質上的安慰和生活的安定，可是中國因爲數千年來推行「仁政」的緣故，使人民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種精神上的願望，那就是一般人所稱的「面子」問題。中國人的所謂「面子」，據作者研究，是一種介乎物心兩界的形式上的觀念，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都把它看得很重，所以日本人想和中國人交友，或在中國舉辦事業，對於中國人所重視的面子，應當特別注意。

日本人固然應當對於中國人先有澈底的了解，同時希望中國人，亦能對於日本人的性情氣質，有所了解。譬如中國人常批評日本人氣度狹隘，日本人的氣度，固然在許多地方，顯見狹隘，但是此種氣度狹隘的民族性，完全是因爲日本的國土太小，天賦太薄，而自然造成的，在短時期內，決不容易把它改除過來。又中國人常誇示着說：日本文化，來自中國，固然日本在中古時代，曾經吸收過中國文化，但是要知道日本的吸收中國文化，是曾經咀嚼過的，等到中國文化，一經傳入日本，而注入日本民族的血液之中，再也不是原來

的中國文化了，何況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又會新從西方各國，吸收了許多新文化呢？所以這種地方，亦希望中國人能有深切的了解。

其次作者還希望日本人能够注意的，就是日本人既欲伸張勢力到中國去，則第一步應先替中國人的民生福利，打算一下。大家都知道近數十年來，中國地方，差不多二年一次飢饉，三年一次洪水，五年一次兵亂，弄得全國人民，流離顛沛，不安姓席，所以生活安定，已成爲中國人民的唯一願望，祇是有人能够幫助他們平治天災，達到生活安定的目的，則不問種族，未有不心悅誠服地樂與爲友。所以作者以爲日本苟欲在中國開創事業，自爲盟主，則應首先爲中國民生着想，多做一點有利於中國民生的事業，如最近的計劃濬治黃河，建立大發電廠等，都是很好的事業。一旦成功，必能得到中國人民的莫大好感，而於親善前途，亦有着莫大的幫助。

再就經濟工作而言，將來事變平定之後，對於中日兩國經濟關係的促進，當然亦應當經過一番通盤籌算，使中國能够在進步的生產方法之下，從事於資源的開發，並在合理的生產程序之下，分担着東亞的經濟建設。例如拿農業來講，中國實在是一個最適宜於種稻的國家，假使耕種得法，則米的產量，一定可以超過其他任何國家，非但供給本國四萬萬人民的食糧，絕無問題，恐怕還可以剩餘一部分來，輸向外國。但是因爲耕種方法的散漫與不知改良，近年以來，竟產米稀少，甚至供給本國人民的食用，亦感不足了。所以將來日本，假使因爲獎勵生育，人口繁殖，而於國產糧食感覺不足，則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補給國家。但是亦應當預先計劃，怎樣才可以增加中國的稻作面積，怎樣才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術，並且還應當確實估計，稻作面積的增加與生產技術的提高，必須做到如何程度，才可以使中國所產的米量，除了供給其本國人民的食用之外，才可以有所剩餘，補給日本。但是等到中國的米量生產，已可以做到補給日本的時候，還應當注意使

其生產，不至陷於過剩。所以談到經濟開發，誠不是容易的事，我們要能夠有計劃的使其生產增加，但是等到生產增加之後，又要有辦法使其適可而止，這樣就非在事前經過通盤籌算不可了。

要之，中日事變一旦解決，其第二步工作，即應在和平的進展之下，從事於經濟開發，惟為促進便利起見，我人應先就內外經濟情況與資源分布，作成詳細調查並加以切實研究，同時並應對於中國的民族性，作深切理解，對於中國民衆的生活，作有效協助，否則真正的中日提攜，必難做到。（原文載大陸十一月號。雨蒼譯）

# 中日經濟提攜之道

馬淵逸雄

## 前途光輝之大陸經濟

自蔣介石淪爲地方政權以來，我就已開始一種努力，即擬在中日合辦之下，復興華北華中的經濟；此種努力，以日本爲主動。例如華北有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有華中振興公司，此兩大國策公司，更出資設立許多同一系統的公司，經營其開發事業。

其餘中日合辦之特殊公司，尙有相當數目，經濟部門的所謂改編，今正澈底的推行起來了。此種改組運動，響應近衛聲明中所謂：「日本並不是想在中國作經濟的獨占」加速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途前進。此亦可稱爲處理事變的新階段之一新局面，業已展開於我人眼前了。

事變以前，與其說是中日經濟受了停頓，毋寧說是已遇着正面衝突之破局，今與此種狀態相比較，誠不免有隔世之感。其時蔣介石輩一面在英美資本支持之下，與民族資本相勾結，一面則以西安事變爲機緣，成立「國」「共」之妥協，舉一切國力，爲抗日「救國」而戰。

一般的言之，即英美鑒於第一次歐戰後勃興的中國民族意識之覺醒，將因而發生排英運動，乃巧爲嗾使，俾移轉於成爲排日抗日運動。又中國共產黨亦利用「國」「共」對立而使轉爲抗日。在此情形之下，蔣介石輩竟冒冒昧昧的決意與日本一戰。

由此觀之，今番事變發生之最大原因之一，的確可以說是在於經濟方面。然中國大陸全土之經濟，既已表現如此之慘澹狀況，而能有今日之前途洋溢充滿光輝者，則由於多數日軍將兵之努力與尊貴英靈之犧牲，此固無待言也。

## 中日經濟提攜之要件

然此項中日經濟建設，若從東亞之大局觀之，不過漸見端倪，還沒有完成經濟建設。開花結實，尙是今後之事。且其前途，極其遼遠，即在目下，關於中日經濟提攜，所需改善之處，亦決非淺鮮。又事實上足以使中國當事人躊躇觀望者，亦數見不鮮，中日之提攜，動輒缺少圓滑，每使中國人梭巡不前，其原因果何在乎？

關於此點，特可舉出來的，就是中國人對於中日之提攜，每心懷一種危懼。他們說：

「日本雖口稱互惠通商，中日提攜，而事實上則用壓迫強制之政策。日本不願中日雙方之商人開誠布公，互相合作，而視中國人爲被征服者，其用心可想而知。」

原來這種危懼，這種印象，若僅僅是中國人的幻想，倒還不甚要緊，事實却大不然。「日本的做法，很偏於主觀，不把中國的事情，放在心頭上。」所以日本所說的互惠通商是虛偽的，什麼都要照他說，他說怎樣辦就怎樣辦，這恐怕就是日本的真意所在。「中國人似乎都抱了這種懷疑。」

一面日方究是日方，他們沒有注意到自己獨斷獨行，妄斷中國人沒有提攜的誠意。這樣一來，互相不能開誠布公，誠心誠意的合作，固不待言，彼此之間的鴻溝，反而日益加深。

所以使中國人抱懷疑的態度者，也許有種種的原因；然原因之一，實在於日方沒有把中國民心緊緊的把

握住。即就前所述的中日提攜言之，如下的事例，並不足爲奇。

例如開設某合辦公司，日方因華方回答稍遲，就要惡聲叱責，說是：「究竟那方有沒有提攜的意思，若有誠意，快把願意合辦到何月何日誓約書提出來。」但是彼方的事情，很是複雜；不能照你所想的簡捷了當。譬如中國雖特地接受日方的誠意，也須站在自己實際上的立場，徐徐的對於合辦計畫，有所考慮。這樣性急的迫他們作「然」「否」之速答，中國方面當然感覺困難，頗有因此而心灰意冷的。

一言以蔽之，日本人應將中國人心緊緊的把握住。

## 大陸經濟界之裏面

今後大陸之經濟建設，應建築於兩國民心融和之上。固然，經濟建設，資本在所必需，機械亦不可缺少。但是不可忘記的，靠他做出工作來的人，較之物質，還更要緊。縱令資本如何豐富，機械如何精巧，而沒有適當的人爲之利用，使之生產，也不能得到美滿的效果。而且專賴日本人之手，運營一切，到底是不可能的。

大陸上諸事業，唯有中日兩國民同心協力，始得成功，在此意義上，所謂把握民心，就是要使彼等理解中國民衆之心。若更具體的言之，是要知悉其社會的共通觀念。

原來，中國人每有一與日本提攜，說起來怪難聽的，親日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的觀念，這種共通觀念，普遍於社會上；而中國社會力之強，尤出於日本人想像之外。無論中國商人或中國公司，不能離開現在之中國社會而存在。合辦公司本身，若不考慮到中國社會的通念，其存在爲不可能。

自然，上述共通觀念之錯誤，固不待言。然既有事業之存在，則又不得置之不理。某公司內之意見，即

使於合作上業已一致，而亦不可立即公然發表，此何故，蓋「實際社會之白眼看待」之困難，正伺於其旁也。倘若公然發表出來，則受「君等阿諛日方權貴，僅謀自己之利益而不顧及一般社會，已身與社會遊離，豈計之得乎？」之責備，無形中為社會所排斥，對的公司之合辦事業，則蒙所謂非協力之消極的攻擊。

如此社會心理的動向，共產黨，渝方，第三國皆所深悉，乃加以利用。日本之工作若稍稍前進，而將得有合辦之成果，彼等即派恐怖團加以注意，將當事者加以漢奸之惡名而狙擊之。甚至與日方並無何等合作之事實，僅在和平區域從事於經濟的或社會的事業的人士，也被登記入暗殺名單。

對於中國當事人特殊的立場，與因此而生之深刻的苦悶，日方應示以溫和之理解與同情。且唯有真以東亞和平為心，以中日提攜為念之中國人，社會之良心較強而苦悶亦更甚。但是日本人從來往往輕視此點，以為事甚簡單。凡在華工作，若與中國社會之動向遊離，決難成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 中國民心之把握為當務之急

日本之經濟進出，動輒眩惑於目前之小利，而對於把握將來之大局，則有不甚關心之傾向。急急於既存工廠之管理經營，至應如何把握從事生產之中國民心，如何使中國人樂與我協力，這種準備，尙付闕如。

中國民心若與我離反，則任何合辦事業，亦必一律崩壞。使中國民衆，單以我為榨取之對象，則唯加深民怨而已，非真為國家謀利益者所宜出此也。僅僅以一工廠之運用，得了小利，就算利益呢？還是得了四億的民心，相共攜手從事生產，才算得利益呢？這是不言而喻的吧。

關於此點，歐美各國的做法，確是巧妙，同時，也是狡猾。即彼等雖是榨取民衆，而仍不忘使民衆賺得出錢。因之中國人也不以他們為討厭。例如買辦制度，把一般的買賣，委之中國人，細小的事，完全聽憑他



們經管，至於重要的大局，才由歐美人主持。

從以上諸點觀之，從事於中國經濟建設之一切日本人，要在「經濟開發這件事本身，就是民心建設」之堅強信念下，努力於民心之安定把握，以進行其經濟事業，這是較任何事情，還要重要。若是民心離反，則由其消極的抵抗，縱令少數的邦人（日人），如何拚命的努力開發，還是物資不流通，資本不集中，結果就不得不失敗。

若是民心離反，民怨沸騰，這就不免要逆轉到事變以前的狀態。事變的目的在於銷除民怨，苟無識的日本人鹵莽從事，則方纔就緒的經濟建設，亦將前功盡棄，那就完全沒却作戰的意義了。

這次戰爭，是因為要想招致東亞的和平，拯救中國四億的民衆而始發生的。善良的民衆，從沒有把他當做敵人看待。現在留華之日本人中，把中國民衆，看做被征服者，藉戰勝的餘威，把他們當作擄取的對象，這種人恐難免沒有吧？

此際進出於中國經濟建設之日本人們，應把中日之經濟關係緊密化起來，從事變前的歐美擄取，解放東亞民衆，確立東亞共榮互助連環之經濟關係。職是之故，凡專顧日本的利益，擄取中國的，應糾正其錯誤，一面使日本的經濟向上發展，這是必由之道。如是則中日提攜方有實現的可能，且可樹立共同之經濟體制。

日本人全部，應更澈悟聖戰的意義，審察中國人社會及民心之動向，以溫和之手，擁抱民衆，把握民心，實爲緊要之急務。由謬誤的優越感和無理解，招致民怨，迫使中日兩國民，變成仇敵，這就使戰勝的成果等於零了。

經濟人宜爲東洋永遠和平計，景仰化爲護國英靈之日軍偉業，而以英靈之心爲心（原文載「實業之日本，不二譯」）

# 處理事變對策中幾個經濟問題

梨本祐平

## 一、經濟對策的目標

時至今日，既不能期待渝方澈底崩潰；或以社會基礎的動搖與國際局勢的演變，而促成其抗戰的衰滅；那末，中日事變之化為長期的對峙狀態，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了。

不過，要把東亞民族，從分崩離析的世界政治經濟體制中解放出來，更進而確立其共榮圈；無論前途怎樣佈滿荆棘或須要備嘗艱辛；然而作戰到底，終不失為完成事變的基本條件。惟其如此，日本在世界政治上的地位，才能够安定；東亞永久的和平，才能够得到保障呢。

現階段上的中日事變，已竟不是單以渝方的對象的鬭爭；而走進深刻的民族戰爭的範圍以內了。所以，對於渝方指導下的抗戰陣營，既須予以澈底的打擊；同時，還要講求經濟的文化的對策，藉使以日本為對象的中國民族鬥爭，漸次失却其目標。這樣，除去對於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與動向，明確認識外，再沒有什麼好的方策。

中日事變的發生，是為偏頗的民族主義運動所激成，這早無贅述的必要。但是，這其間實在是中國近代紀——從民族統一以構成近代國家之歷史發展——的出路橫被阻塞而感受到深刻苦悶的結果；關於這一點，不能不以正確的理解和寬容的同情，加以認識。不審唯是，如果對於中國民族運動沒有理解和同情，那末將

來中日間的政治安定，永遠沒有希望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近衛聲明，在闡明日本對華理想完全從新的認識出發一點上，實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於今鑑於中國在艱難困苦的戰爭過程中，依然繼續培植其民族主義運動之社會的經濟的基礎，更是不言而喻了。渝方維持抗戰力的必要條件，雖然軍需品及建設材料一概仰給於英、美、蘇、聯等國；而在國內尤必須開發其落後的自然經濟，藉以增加物力，並動員農村青年，藉以增強人力。這樣，如何將中國農村社會中久經沉澱之封建渣滓加以清除，就成了先決問題了。

中國社會，祇有把使它停頓不進的封建渣滓加以清除，才能够開始其近代化的第一步。現在經過這大規模的戰爭，清除工作，將成爲必然結果了。

祇有明白認清這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和中國社會之構造的變化；並因事制宜講求對策；然後與軍事行動並行不悖的經濟對策，才有實施的可能。不過，以前日本對華經濟政策，其擔任之進行戰事不可或缺的種種約件，也不容忽視。

## 二、戰事進行條件的限制

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祇有先行認清中國民族的要求，由此而發生的中國社會變化的動向，即因事制宜講求辦法；然後和平區域的經濟，才能够順利營運；和平區域的民衆，才真的傾向和平；這樣，影響所及，非和平區域的民衆，也就失却抗戰目標，將來中日兩國才有密切提攜的可能。但是日本要講求經濟對策的目標——中國大陸，現在正是戰場；而悲慘艱苦的戰爭尤毫不容情，這也是不可否認事實。

所以，現階段上的日本對華經濟政策，固然內心裏對中國抱着一種新的理想；但是爲了事變，而滿足進

行戰爭不可或缺的條件，更是先決的問題。

在經濟部門所謂進行戰爭不可或缺的條件，當然是因為戰爭一事，其鉅大的消費往往超過了再生產；而彌補此種消費，比任何事件，還要重要。

此外，誰都曉得，目下戰爭的特徵是完全的國家總力戰；渝方既想盡方法來擾亂日軍的後方，同時日本也不能不把破壞敵性經濟機關之一種經濟的對策，包括在武力戰的範圍以內。不但如此，中國經濟中的第三國經濟關係，更是錯綜複雜，互為牽連。對於這些，也必須用和武力戰相同的方法，講求措置。

這樣，日本對華經濟政策，不免要因華北、蒙疆、華中、華南等地政學的區分而改變其形態；不過基本原則，還是要認清中國民族的要求，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向；同時再對於目前行戰爭的種種條件，求其滿足。換一句話說，就是一方面促進戰爭的種種條件，另一方面又怎樣可以答復中國民族的要求和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的中心問題，就在於此。

於今再進一步加以具體的研究，在廣闊的中國大陸上轉戰南北的日本軍隊，某種程度的就是地徵發，原是不不得已的事情。一方面既須要培養和平區域的經濟力，鞏固國府之經濟的基礎，和加緊中日滿經濟的聯繫，藉以增強日本戰時經濟力；同時，另一方面，還要徹底破壞敵性經濟機關，使渝方指導下的抗戰力量及早衰滅，把非和平區的民衆從抗戰陣營拉攏過來——這些都是當前的急務。

據近衛聲明中所闡明的日本對華新理想，日本既無意奪取中國領土，又不欲仇視中國的民衆；反而要安定中國民生。關於這一點，那破壞渝方敵性經濟機關，封鎖通商口岸等行爲，好像和聲明有些矛盾；不過，從日本看來，及早破壞渝方的抗戰力，乃是關係國家前途的生死問題；爲此，對於抗戰力的淵藪——敵性經濟機關，加以攻擊，也可以說是當然的措置。或者民衆因感受深刻痛苦，還有改向和平反戰之路的可能。

日本對華經濟政策，如前所述，其本來的目標並沒有什麼變化，不過因戰爭的現勢而受限制罷了。滿足進行戰爭條件，既是先決問題；所以現在佔據的地方，都靠着軍事行動，予以衛護。

戰事繼續，業已五年；使渝方領導下的抗戰力早日衰滅，以奠定東亞共榮圈的基礎；這是關係日本國運的生死問題。在這時候，反觀日本過去對華經濟政策，坦白說來，還有些不盡令人滿意的地方。爲了維持日軍自活量，爲了調即中日滿的供需關係，再例如安定民生以協助國府之經濟的基礎與對非和平區發揮其經濟攻擊效果；這許多重要事件，都期待着將來的完成！

以下，單就所想到的，以中國民生爲主而與進行戰爭有關的種種問題，略爲陳述。

### 三、和平區域內生產，流通機構的整備

衛護和平區域，是完成事變的最主要的基本條件。和平區之經濟的強化與發展，不但日軍就地徵發，可以順利進行，與日滿兩國的經濟聯繫愈加密切，因而強化日本的戰時經濟力；並且可以由安定民生藉以鞏固國府的經濟基礎。

和平區的經濟發展方針，必須偏重於流通機構的整備和生產力的增大。

目前對於和平區的經濟要求，多少含有就地徵發性，原屬事不得已；同時更要安定民生以鞏固國府的經濟基礎，並調整其對於日滿兩國的供需關係。多餘的生產，在日本或國府貿易統制或匯兌管理之下，輸往第三國，以獲得外匯。

但對於抗戰力的淵藪——敵性經濟機關，既不能不加以破壞；所以和平區的物資，流向非和平區，或由渝方輸出因而增加其外匯；這些當然要嚴重取締。

原來中國的生產機構，還沒有脫離半封建的形式；因是經濟力非常微弱，祇有通過流通機構，才能得到產品的商品化，和講求生產力的增大。如果要直接生產的農民，自動講求生產力的擴大或實行集團販運，唯一辦法，必須把以土地所有關係為根基的那種濃厚的半封建性，徹底毀滅不可。為此，農民本身不能對於所屬的階段，有一種革命的綱領和實踐；不過，這還不是燃眉之急的重要問題。

當前的急務，除去整備流通機構以謀生產品運輸的便利，即進而刺激生產力的增大外，別無他途。

但是事變以來，中國內地的那種微弱的流通機構，以及附屬於流通機構的倉庫、金融、市場等類的組織；不完全破壞，就是在日軍和渝方的對峙之下，徘徊歧路，停止業務，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的希望。

於今日日本和國府引為憂慮的糧食缺乏問題（渝方糧食缺乏的情形，更加嚴重），自然與生產減退和運輸縮少等不無關係，而流通機構的破壞或停止，因而形成運輸的杜絕，也不能不認為重要的原因。

流通機構和附屬於流通機構的倉庫、金融市場等類組織，漸次恢復，以謀運輸的便利；更進而促進生產力的增大，這才是當前的急務呢。不過另一方面，日本對於軍票、聯銀券、新法幣等圓系通貨的價值，須要設法維持；所以爲了恢復流通機構和增大生產力，又不能不極力動員民族資本，並且把這種資本，放在圓系的通貨的領域以內。

在配給方面，凡和平區內的產品，或由日圓集團輸入的物資，既須用以維持圓系通貨的價值，又要防止其資敵行爲；自然要加以嚴格的統制。

最近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都市的日本商人，正醞釀着配給組織重新改編，這也是如上所述須要強化配給統制的結果。應運而生的，就是日本商人間同業公會運動的勃興。

#### 四、圓系通貨的價值維持與法幣對策

##### (一)維持軍票價值與經濟圈的確立

爲了衛護和平區，和調整物資供求關係具有同樣重要性的，還有通貨問題。

現在和平區內，軍票、聯銀券、新法幣等圓系通貨，與舊法幣並行流通。圓系通貨對策的方針，不用說是在維持價值與推廣流通以確正圓系通貨經濟圈，同時極力對舊法幣加以壓迫，把它驅出圈外。

關於聯銀券，前此幾經說明，不再贅述；茲先就軍票的價值維持，略陳於後：

一月三十一日河田藏相及大藏省、興亞院適當對於衆院豫算第三分科會的關於軍票價值維持的質問，曾經說明日本政府方針如左：

一、軍票之發行，限於軍事費範圍以後，由大藏大臣命令印製，即撥給日本銀行，作爲特別存款。當日日本銀行收到軍需官簽發之支票，即如數照付。

一、軍票價值之維持方法：根據對華南之輸出計劃，由日本內田供給物資，以期從物資方面得一保障；再限制日圓資金之放出，以講求通貨方面之對策。

一、軍票與新法幣之流通範圍，目下暫加區別。至於將來如何，因與事變之進展有關，不能明言。

一、軍票與日圓同值，對外固應維持一先令兩便士之匯率；但對於法幣之比價，以現在之六十圓爲標準。……（二月一日大阪朝日新聞）

這樣，日本要把軍票對法幣的價值，按六十圓對百元的標準，予以維持；所以一方面必須圖謀物資的供給，另一方面還要竭力防止通貨的膨脹。

日本既以供給物資爲維持軍票及其他圓系通貨價值之手段；於是乎在圓系通貨圈確立以前，以圓系通貨爲標準的貿易統制和匯兌管理，就有強化的必要。換一句話說，就是日圓集團內的貿易，應當根據中日滿物資動員計劃和貿易計畫，從事推行；以日本與國府的協力加以管理——物資和資金的交流調整而後，圓系通貨的價值，才能够維持。

至於第三國貿易，在匯兌管理實行以後，自然要力圖增進輸出，把獲得的外匯，在一許可制度之下，用以輸入。但是在匯兌管理尙未實行以前，由輸出而得到的外匯，因爲有強化舊法幣的可能，必須竭力阻止；輸入的物資，如有資敵嫌疑，更要加以防遏，除此以外，不妨增加其數量。

爲了維持軍票價值，強化匯兌管理與調整物資與資金的交流而外，限制資金的放出，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這樣，凡與事變處理沒有直接關係而利用圓系通貨的企業，或其他經濟建設都在限制之列，這種萬不得已的情形，自不待言。

但是，華北與華中在事變處理的直接關係上，具有稍不同的內容；這已經決定爲國策：即華北應在與日滿同一經濟圈的意義上，以計劃其經濟建設；而華中則視爲中日經濟的結合點。

現在軍票和法幣的比價，業已到達五十五圓，其價值的維持，可謂相當成功。想以後也要如河田藏相所說——以六十圓爲標準，繼續其價值維持工作。然而軍票經濟圈內的經濟力，充分的可以維持這種標準；如何利用餘力，在穩定軍票價值的範圍，一方面擴充軍票經濟圈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強化新法幣。如是，在軍票和新法幣的流通圈內，希望能够增強生產力以確立當地自給自足經濟，一則減少對日依賴的程度，再則鞏固國府的經濟基礎。

## (二) 新法幣強化之動向



國府早有設立中央銀行以謀統一幣制的意思，這從去年三月還都當時所發的十大政綱中，所謂「重建中央銀行，使之統一幣制，以奠定社會金融之基礎」一項，很明白的看得出來。再是同月三十一日財政部長周佛海氏發表財經基本方針，其中關於設立中央銀行一事，也有具體的說明，據稱國府以急於要設立中央銀行，一則因爲國府必須有一個運用財政金融政策的樞機關，再則法幣通貨膨脹愈演愈烈，不但影響了國府的財政基礎，而且使民生狀態益感不安；所以更有確定幣制，發行新法幣以驅逐舊法幣的必要。

由此看來，新法幣的當面問題，恐怕就是對舊法幣的鬥爭吧。渝方也豫期到國府要設新中央銀行發行新法幣，於是乎對於和渝方依舊維持關係的金融界外，頒佈「禁止收受雜鈔條例」及其他種種法令，以謀防止新法幣流通。

舊法幣發行時，前年六月渝方發表爲四十萬萬元；但據本年一月六日中央儲備銀行開幕當日周佛海總裁的聲明，實不下六十六萬萬元，其準備基金則有一萬萬美元與一千萬英鎊的借款。此外，新法幣與舊法幣等價聯繫，這因爲舊法幣還有支配民生的相當勢力，至於將來，周總裁也曾經聲明說，等到舊法幣激遽跌價，一般民心傾向於新法幣的時候，然後再確定新法幣的適當價值。由此，新法幣要和根深蒂固的舊法幣鬥爭，並把它驅出流通圈外。

聽說現在上海自四十萬萬以至七十萬萬的游資，還是首鼠兩端，不明趨向。蔣介石雖會高唱西南建設，加以利誘；而不爲所動，這早有事實的證明。如果國府能够發揮足以吸收的政治力，則此等游資的望風歸附，一定可以想像得到的。

日本爲援助新法幣使之克服舊法幣起見，第一要以維持軍票價值的餘力，去擴展新法幣的經濟圈；同時還必須防止舊法幣，使不爲向第三國輸出或華僑匯款的計算標準，或充實其安定基金。

其次，在勸誘渝方銀行或錢莊一體通用新法幣外，還有對於通用舊法幣的金融機關停止其活動，行使舊法幣的物資交易阻止其進行，以促成舊法幣早日崩潰的必要。

新法幣和軍票聯銀券，華興券的相互關係，固然還有幾多營運技術上的重要點，尙待研究；但是根本的問題，業已圓滿的成立諒解了。

對於新法幣上海經濟界的空氣，也不見得怎樣險惡。甚至美商銀行的幹部也說「新法幣既是中國民衆的通貨，我們要看中國民衆的態度，以決定本身的態度。」言外之意，既在當地營業，順應環境乃是不得已的事情啊！

新法幣的命運如何？這祇要看今後國府的政治力量和日本的協助程度，再加以斷定了。

## 五、國際局勢的緊張與租界對策

美國租借與法案的通過衆院（此稿將完時，據報載又通過參院），在美資金凍結案的羅斯福大總統署名完了，五千萬元對美借款的細目發表……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上海租界，也就恐怖，混亂，大有鼎沸之觀？由於英美兩國再度勸告僑民離開遠東，和美國停止支票付款；糖和米等仰給於外洋的物資，因豫料到將來輸入困難，就一齊漲價。而棉紗棉布，本來因外國棉花不易入手而漸有起色，這時反以外匯看高，而節節跌落。

近來上海市場，已經不爲單從匯價變動，而變動的原則所支配；而現出如前所述的惡劣情形，在此種情形之下的租界對策，由國府收回等類的原則如何，姑不具論；爲了進行戰爭，怎樣充分利用和發揮租界的特性，恐怕是當務之急吧。

所謂租界的特性，除去租界是敵性經濟機關的淵藪，和通過租界的第三國貿易得以發揮其充實敵性資金的機能外，同時，租界還是個國際貿易的自由市場。

如果能充分利用租界之國際貿易的自由市場性，才可以從第三國輸入物資。這樣，就有使第三國的匯兌銀行以及海關等，對日本及國府的經營對策協力的必要。

渝方銀行，可以協議接收或勸其對國府協力。租界以內的貿易商行，使其理解日本的真意，並加以指導以求以助於匯兌管理。至屬於渝方的經濟機關，除加以徹底破壞外，別無善策。

香港、九龍、廣州、鼓浪嶼等毗連第三國領土的地方，現正施行封鎖，斷絕交通，使與中國內地隔離；鑑於第三國領土的敵性機能，恐怕這種隔離，還要繼續進行吧。

最後是祇等待大總統署名就要實行的美國資金凍結案，對於租界的影響問題。關於這一點，或者美國的本意，是要用特許制度以永實際凍結向軸心國移動的資金；不過，整個的凍結，在目今國際局勢激遽轉變之下，也未始不可能的。

相傳鹽業、大陸、中南、金城等所謂北四行，業已顧念及此，而把存美國的資金幾乎全部提出來了。不過，在上海租界的資金凍結問題，似乎是專為對付新法幣而表示的援渝行爲呢。

前幾天資金凍結的傳說引起了塞用美金扒進法幣的現象，因而舊法幣一時強挺；但是關聯着舊法幣的通貨不安，依然存在；最近更加趨於股票、地產、商品等類的投資——從美元投機而轉向到物品了。

如果在舊法幣缺少安定條件的現在，再加以資金凍結，那末，舊法幣喪失了外匯機能，價值的跌落是不可幸免的。

即使輸入代價的清償，在特許制度下，還屬可能；而龐大的上海游資，既無從轉變為美元，價值跌落，

乃是必然的趨勢。

由此看來，美國資金凍結案，於日本的租界對策並沒有怎樣重大的影響哩。（原文載「中央公論」春季特大號齊東楚譯）

# 事變處理與國民之覺悟

阿部信行

## 一、籌進於重建東亞之路

所謂強化國民政府一事，再沒有直麼可以躊躇的理由了吧。話雖如此說，然而去年我到南京後，甚至於費了相當的日期，才決定了種種的事情。這在身當其衝的我們，真是難辭其責；原因如何，姑不具論；總而言之，經過了八個月的期間，總算有了端倪。諸位都曉得：以中日滿三國為基礎，互相尊重其本質，協力提攜以籌進於重建東亞之路。這已經正式的締結條約；同時將締約的政府，就認為中國唯一的政府。既承認新政府且與之提攜的日本本身，在這時候，也決定了因此增强的方案。

強化國民政府且與之提攜，而日本方面也因此增强的心境，比去年我從南京歸來的時候，現在在日本國內，似乎更見確實了。不過，目下中國局勢的演變，難免有許多我們想像不到的現象，發生出來。有人以為，或者公然說國府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綜攬全國且與重慶頑。結果自然對於強化國民政府，就多少表示不熱心的態度，甚至於有人反而做出使之弱化的行動。其間不顧國民政府的存在而直接要向渝方互通聲氣的，也不在少數吧！這次汪先生來訪，我國上下的態度，顯然的受了很大的激動；以前的思想，大有衝破的趨勢。不過據我想來，那種潛在的思潮，似乎還蠢蠢欲動，而在中國當地實際工作的人們，其擔任事件的種類，姑不具論；但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礙國於民政府的強化，或者反有使弱化的可能呢？再是動方面，也不

能不令人懷疑，日本人真的有意要強化國民政府更進而建設東亞呢還是怎樣呢？因此，我在任何場合，都警告說：祇有明白的改變了這種思想，才是處理事變的正道！

## 二、長期戰的覺悟

試想 汪先生和少數的同志離開了重慶，既沒有充裕的金錢，又沒有強大的武力，祇是從各方面聚集了意志相同的人們，還都南京，組織國民政府，無論怎樣努力，在半年或者一年的期間，而要成爲一個強固的政府，做出怎樣大的活動來，這當然是不能期待的。如果說是沒有力量，我就要問，爲甚麼起初就和那樣的人攜手呢？武力不夠，日本可以補給他；財力不夠日本可以援助他。在現狀之下，要對付蔣介石，且把中國的大勢，轉向於好的方面，非汪先生出來不可；如果不是路先生，決不會理解大局，與我提攜，使四萬萬民衆，傾向和平。如此想來，才有起初的合作。而今妄加誹議，這不啻日本自身非難過去的行動；日本自身暴露出缺乏信義。或者有人提出汪先生及其周圍的人們之熱心如何的問題。這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不過我對於提出這種問題的人，常是反問道：他們爲甚麼要做那種犧牲幾多生命而猶嫌不足的事情呢？回憶去年春季或夏季，（日本）國內報紙，曾經登載着汪先生離開重慶寄居河內的記事，爲時不久，想還沒有忘却吧。再就是最近汪先生來訪的時候，某報也曾簡略的揭出他從河內到上海途中的危險狀態，想諸位之中，一定有看到的吧。當時的情形，決不像報紙上述說的那樣簡單，實在是犧牲了幾多生命和冒犯着非常的危險，才出來的呢。

假使汪先生依舊安居在重慶，很可以和蔣介石比肩，直到現在還受着人們的尊敬。祇因爲日本的主張是有道理的，和日本提攜，是爲了東亞，爲了亞洲的將來，而且是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在這種信念之下，

所以不顧生命的危險，挺身而出。那末，還有人以為時到而今竟放棄了所有的熱誠，只悠閒之南京享口腹之樂，恐怕沒有比這再錯誤的見解了吧。蔣介石及其周圍的人們，正注視着日本對於國民政府將出於若何的態度，即藉以試驗日本的實力和信用。四萬萬民衆，將聽信蔣介石呢？還是追隨汪先生呢？這祇有徵諸事實的表現，才決定他們的取捨。其他列國，都持着同樣的態度。如此說來，譬如把已經按置在軌上的火車，使他脫却路線呢？推動牠前進呢？還是減少牠的速度呢？如果真有這種種曖昧不明的想頭，那將要形成怎樣的結果？近來我們所聽到或見到的，似乎稍有着落，不像以前那樣的浮動不定；但是追本溯源，及早停止戰爭的想頭，總不免從中作祟。兵凶戰危，佳國之不祥！所以及早停止戰爭，沒有甚麼人不贊成的。祇是這種及早停止戰爭的想頭，使事態的演進不能和實際狀況相副而行，恐怕就是在解決中國問題上，浮動不定的一個最大原因吧！

### 三、漸就崩潰的重慶政權

以上兜了一個不小的圈子。總而言之，要解決這次事變，不能不遵循自然的途徑；不然的話，就不能够完全的解決。然而不加思索，只想停止戰爭就好了，這種膚淺的想頭，一有機會，竟出之於口而聞之於耳，這在去年，不！直到今年的春季，還相當的蠢動呢？。所謂停止戰爭的想頭，明白說來，就是和重慶直接交涉，豈不甚好的意思。換一句說，也就是戰勝的一方面對於戰敗的一方面，要提議道，「我們停止戰爭怎樣呢？」結果，對方的回答是：「哈哈！我還不想停止，他竟先示弱了，這到有點為難呢！」於是乎，除去給對方以怯弱的印象外，不會有甚麼效果的。不審惟是，反而使重慶放棄和平，更加增強了抗戰的意識。日本是示弱了，國民政府是無能爲了！如此看來，我想渝方決不會同意停戰的！

最近報紙上又載中共交關的消息，相傳渝方也彰明昭著的發表出來。這樣一來，有些人們得意洋洋的以爲事件擴大，渝方就要場台；即使不至於場台，也要和日本媾和了。這簡直是「依靠別人」，換言之，就等於說渝方屈服，完全是托共產黨的福呢。那末，將來如何，就不能不詳加考慮。老實說，渝方決不至於因此而場台的。那是他們內部的事情；時機到來，說不定又和好起來——西安事變就是很好的例證。他們雙方，都口稱是愛中國的。所以共產軍既不是爲了愛日本攻才擊渝軍，渝方也不是爲了愛日本才攻擊共產軍。他們所以如此，都是爲了中國本身的問題。要趁着中共交關而謀有利於日本的想頭，不啻是「緣木求魚」；在這期間，渝方決不會有甚麼轉向的。或者他們還以爲這是投機取巧，更增強其戒心也未可知。

要使渝方真的屈服，至少是在他們開始覺悟到不可以抗日的時候。因此，運用實力，是必要的；不以實力爲背景之言論，在現在就沒有一顧的價值。如此說來，所謂實力，尤必須繼續的運用了。不過，並不是除此而外，就沒有使它動搖的手段。固然，運用實力是打它弱化的一種手段；但即使它不弱化而我們增強起來，這不也是打破均衡的一種方法嗎？明白的說，就是強化國民政府，同樣的可使渝方弱化；如果日本援助國民政府本身也增強起來，那末渝方也就加倍的弱化了。這能不能辦到呢？祇要日本有心這樣做，決不是怎樣困難的問題。

#### 四、國民政府的進展

日本既承認國民政府，並且對中外聲明使之強化；這就表示援助新中國而日本也自行增強起來的方法，是很多的。既是這樣，爲甚麼還要繼續那種艱苦對渝工作呢？本來這方面的強化，是不能急速進展的；通曉實情的人們，一定可以想像得到。無論財力或兵力都不充分的國民政府；要一旦的強大起來，不啻一種苛求



。這需要相當的時間；但施行是進步的前提，日本對華一切政策，莫不如此。以熱誠，忍耐與努力，而不屈不撓的繼續進行；那末，今日不成，還有明日；本月不成，還有下月；今年不成，還有明年，總不要忘了進步增强的目標。這樣腳踏實地的做法，渝方的人們，將有怎樣的看法呢？在不知不覺間，這方面是強化了，形勢是好轉了，本月既有起色，下月將更有進展了；結果，這方面是日就月將，而對方則窮於應付了。到了這一步，非加以考慮不可的時候，自然不能無動於中吧！這種內心的動搖，也就是傾向於全面和平的動搖。再就是第三國，看到大勢已去；那種不能起死回生的輸血，是否還繼續進行，也當然要考慮一下了。不過在到達這個目的之前，日本須要不拘小節，勿貪小利；從高遠的見地上，使國民政府得以施行自備的政策；並從各方面予以相當援助，政治方面如此，經濟方面亦莫不如此。在這時候，我相信一切如意算盤和功利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此外，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國民政府漸次強化，日本自身愈益增強；渝方抗戰，形勢日非，或就此沒落下去，但這次事變，依然不得解決。祇有在事變之初，日本是想把它簡單結束的；於今既標榜以中日滿為基礎，確立東亞新秩序，更進而重建東亞。那末，這最後的目標，才是事變解決的終點；而三國同盟之關於東亞的一方面，也是由此共同目標才結合起來的。唯其如此，所以蔣介石或其周圍的人們，無論精神上或實力上，僅祇是不再抵抗了，這不能認為已經解決了事變。必須使他們感覺到日本可靠，並且有在日本的指導之下，共同向重建東亞一路邁進的心思，才有結果的。

## 五、事變處理的正道

僅祇渝方蔣介石及其周圍的人們有那樣的心思，還不能算是解決了事變。因為中國四萬萬民衆，數十年

來，受了抗戰的薰染；自以爲在文化方面比日本進步的那四萬萬民衆，如果不徹底理解日本真意之所在，且有相將並進的心思，所謂解決，就不是真正的解決即便如此也不過日本和中國攜起手來說：「就這樣做吧」；攜起手來以後，還免不了有幾多難關。要對於我們自己認爲不能滿意的東西全體的現狀，加以改造，所以已經攜起來的手，是放不下的——中國四萬萬民衆，和我們意志一致，這個時候，也祇能說事變解決的第一階段；以後才走上真的大舞台呢。在走上大舞台之前，我們必須虛心坦懷，涵養實力，使中國也強大起來，隨從着一同前進，不至於倦怠。因此，爲了完成這空前未有的大事業，我們必須謹慎從事；忍耐種種的不滿，排除了感情的糾紛；真有舉國一致之實，對外則不爲鄙小的優越感或利害觀念所播弄，有甚麼令人掣感的行動，趕快的加以反省；同時，把日本固有的光明正大的態度，無論對內或對外，都使之理解；這樣一來，就可以對列國而無遺憾了。何況大家都知道，目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比去年春夏兩季，還有出乎意外的好轉呢。

現在日本的一舉一動，都成了世界列強的注目之的。日本在國際間，可說是站在自由的立場；在正義公道的命令之下，能够做出任何的事情。多數的國家，都希望日本的舉動於自己有利；可見日本的舉動是有效果的，日本的立場是超越的，日本的意向是轉變世界大局的重要關鍵；而日本的前途，也正是隆替所在關係非輕。明天比今天，後天比明天，一天一天的，日本的舉動，似乎密切的支配着世界的動向；那末，國民全體，就不能不有一種異常的覺悟了。他如物資的匱乏咧，組合的配給方法怎樣咧，想在非常時期，當然有這樣不平常的變動。這不單日本如此，其他國家甚至於整個世界還不是有同樣的情形嗎？

前面已經說過，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人事上，心理上，界世之大比日本幸運的國家有幾個呢？試觀

方則仰窺日本的鼻息，東方則惴惴於日本的動向；南方西方，亦莫不皆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袖手旁觀，願指氣使，也足使對方感到不安；何況主持正義，奮然而起，還有甚麼不能夠做的事情呢？這只看我們國內有沒有這種堅實的力量罷了。如果把這種堅實的力量，自己看輕，既自侮而又招人侮；無論在怎樣良好的狀態之下，是不會有甚麼價值的。這次政府爲了按照自己的意思以整備強化國內體制，似乎對於內閣機構大加刷新了。這樣，國內體制，或者因此而整備強化起來，更見進一步的發展；不過，能不能使政府的覺悟，愈加鞏固，隨着各方面的鞭策而勇往直前，這還要國民覺悟的程度如何呢。我會經趁着這個機會，把明治初年以來歷代 天皇陛下所頒賜的各種詔勅，勅語，勅諭，反覆拜讀；設想各位都能徹底的了解那種真意義，體會那種大精神，就沒有所謂迷惑，沒有所謂恐懼，也沒有所謂不滿足了。世間往往懷疑到日本的意識形態；如果有人提出這一問題，我的回答是，把上述的精神，當做意識形態，還有甚麼不能前進的呢！（原文載「支那」秋季特輯號，齊東楚譯）

#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

長田實

著者長田實氏，自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即行來華任先總理之醫務顧問；嗣後卜居上海，垂三十年；今在上海經營醫院，乃真摯的中國研究家，要人中頗多知遇，中國民衆對之，亦甚敬佩云。

我想祇有從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真理解裏，才能發現解決目前中日事變的具體方針的關鍵，和築成實行中日合作的鞏固的基礎。以下便是我在華三十年間親自和中國人交接由歸納而得到的中國與中國人觀：以及關於我個人或周圍的種種瑣事的記錄。

中國人是豪爽的！這因爲我會經當過標金市場的經紀人，夾雜在他們中間，看到那種不顧死活拚命做投機買賣的樣子，才有這種感覺。日本人往往對中國人加以輕蔑；然而走到標金市場去看一看；他們那種意想不到的賭博行爲，祇有大吃一驚，關於這一點，日本人的經紀人等，是自愧不如，除去承認他們的豪爽外，別無話說。在我們看起來，那或者有點亂暴；但實在決定很大的勝負。現在的標金市場，雖然範圍較小；但當時做金業交易所的時候，曾經有過牽動倫敦或美國銀塊行市的勢力。在這樣大的市場裏，當經紀人的，和中國各方面的富豪，都有關係。上海自不待言，此外廣東幫、大連幫、漢口幫、四川幫、天津幫……：幾乎全中國的富豪、資本家，都牽連在內，再加以外國人，共同做這投機的生意。所謂外國人，大半是歐美人，但也有不少的猶太人。猶太人擁有雄厚的資本；據研究的結果，似乎總是他們占最後的勝利；惟獨中國人是純粹的投機，假設有一萬元的資本，他可以做十萬、二十萬的生意；因此「孤注一擲」，遽然兩手空空也

是有的。

原來中國人的國民性如此，他們非常喜歡投機或博弈，而其方法又是生成的巧妙。從小孩子的時候，就能一方面走路一方面用銅板拋擲，賭猜其表面或裏面——在遊戲中現出賭博的行爲。「麻雀」已經成爲中國的國戲，這比日本的「八八」，還要高尚。因爲是國戲，所以無論富豪大官以至於黎民百姓，都藉此一決勝負。賭輸了的時候，一定要好好的付賬；不然就要影響了所謂面子。所以賭輸的時候，一定要付出金錢，而且對於付出的金錢，毫不顧惜；因爲他們想，賭輸了的事情，完全是自己不好啊。反之，賭贏了收進金錢，亦視爲常然的事情。中國是一個面子的國家，如果不能保持面子，一切的經濟工作，都不能夠進行的。但如果信用你的話，就是成萬的金錢借給你，僅祇記上一筆賬，絕對不要收條那一類的東西，而對於不信用的人，是絕對不通融的，假設要和中國人做生意，首先要曉得這基於面子的信用是什麼東西。

我在這次事變之中，曾經三四次受中國人的委託，管理財產或房屋，他們的目的，不過要使房屋或財產，免去了戰火的影響；倘若我是個壞蛋，自然可以利用管理人的權利，把房屋賣掉，但是他們這樣信我，所以才委託管理的。此外，我還被人推薦做某大工廠的顧問，對於這種管理。不用說他們分給我利益，或者保管費；在日本常常喧傳着什麼賄賂事件，然而在中國，對於這些事，是毫不關心的。他們想；請人做事，當然要給人報酬，而自己給別人做事，亦當然要取得報酬的。關於這一點，中國人和外國人完全不同；祇要信用一個人，終是信用到底的。我在標金市場，當經紀人的時候，曾經發了一點小財，這亦是得到中國人財主的幫助。祇要認爲你有品格和才能，他可以拿出很多的資本，和你合作。關於這一點，日本人是很狡猾的，但是，中國人決不如此，一定是嚴守契約的。所謂近衛聲明裏，有不要求賠款的一條，這雖然認爲表示聖戰的意義，但從中國人的眼光看來，却是費解的語句：何以言之？因爲中國人以爲戰爭失敗，當然要對戰勝

國賠款；這種賠款，雖然要歸自己的負擔，但決不認爲不合道理——打敗了賠款，豈不是當然的事情嗎？如果不理解這種國民性，那一定要失敗的。

說是不賠款，但他們在感謝以前，先要打量你一下；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看一看日本的弱點。意想到日本因戰爭延長，而陷於經濟疲弊，他就撐起腰來幹了。這確實是最困難的地方，對於中國的國民性認識不足，或者就是這次事變的起因，和解決遲緩的主要關鍵吧！換一句話說，就是雖然認識了軍閥割據時代的中國；而對於最近所謂民族主義勃興和由新生活運動的實踐而顯出的統一狀態，還沒有正當的評價，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吧。中國民族意識的發揚，至少使這次事變，比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更加複雜困難了。明白說來，現在日軍所佔據的地方，一般的認爲祇是點和線。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時候，至少佔領區域內，可以維持絕對的治安，然而這次佔據的地方，比日本本國，大過幾倍，而安全地帶，祇限於線和點——所謂線就是鐵道和交通機關的沿線；所謂點就是蘇州、南京、漢口等大都市；至於此外的一面，依舊還是混沌不安。在這裏有所謂游擊隊或敗兵，依然隨從渝方，還未歸順國民政府。還有我們須要特別注意的是農民的思想。事變以前的中國農民，對於排日一事，可說是毫不關心。而提倡排日抗日的，不過農民以外的總人口的一〇%，（其中有政治家，也有商人，）佔非常之少數。這和日本完全不同；如果在日本一提起排英，那末全國各地就充滿了排英的空氣；然而中國人決不如此。證據是當我肩着槍桿到鄉下去的時候，一般人民還待我非常的親切。但是，這次事變以來，中國農民對於排日一事，也十分關心起來了。何以言之？因爲戰爭而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自然引起他們的排日思想了。恐怕愈益延長，這種傾向，也要繼續增進吧。

最近中國的思想界，更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對於三民主義的見解漸次發生了變化。我本來是當孫中山先生的醫務顧問而來到中國。因爲主要的工作，不在政治而在衛生，所以和孫中山先生並沒有什麼爭論；大

概以爲中日結合，這天下就可以平定了。因此，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雖然贊成，而對於三民主義，就在當時也抱有不同的意見。本來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要模倣日本的明治維新，而揭出的國民革命的旗幟，所以偏於理想，離開現實的地方，也非沒有。何以言之？因爲孫中山先生久居美國，自然受了美國自由主義的薰陶。中國的青年們也有這種議論；就是蔣介石恐怕也漸漸的傾向這一點；口裏雖然不說，心裏或者以爲融和運動漸就進步；中日兩國實行同盟的時候，無論如何，非利用王道不可吧。總而言之，中國全部還是瀰漫着數千年來的道德觀念——王道思想僅不過籠罩上一層新的歐美思想的面幕罷了。最近中國青年界漸次顯出道德思想的萌芽，這不能不認爲一種很好的傾向。日本和中國實行同盟的時候，恐怕祇有以王道思想爲基礎。

目下中日間的重要問題，是怎樣可以實現全面的和平？中日兩國所以到了現在的地步，自然中國方面，難羣其咎而；日本方面，需要反省的地方，也非常之多。這因爲近年日本對中國的行動，不能說是沒有引起不信任的地方。從遠處講，可以追溯到二十一條問題，也最近的滿洲以及其他問題，都使中國人感覺到日本不可靠，難與共事而形成排日抗日的思想。排日抗日思想的普及，自然與渝方的宣傳很有關係。一般國民從利害着想，雖然對於排日抗日並不十分贊成；但是，當時的黨部或政府却要利用排日，以爲國內統一的手段。總而言之，根本問題還在於日本的態度。日本人常以一種優越感去對待中國人，所以對於這次事變，打錯了算盤。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國抗戰力的意外強大，直到現在才發現了；然而，在曉得蔣介石的一新生活運動，是如何認真，得到怎樣效果的人們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呢！

還有一件日本引起中國不信任的事體，就是幣制改革。如果幣制改革，日本也參加計劃，或者這次事變就不至於發生。英國的李斯羅斯向日本要求協力改革中國幣制的時候，不料日本是什麼研究準備也沒有。不

但這樣，而且還把他的提議，一脚踢開。中國曉得了這件事，所以對於日本更感覺到將來的不可靠了。於是以為「奇貨可居」的英美，尤其英國，才大展其經濟侵略的手腕；一方面北邊共產黨的勢力也漸漸蔓延起來了。在這種狀態之下，蔣介石才決心和日本一戰。但是，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才曉得中國的軍備，意外充實——無論戰壕的構築，和軍隊的裝配，都根據德國軍事專門家的計劃，而實行改良。關於這一點，日本的政治家，對於最近的中國和中國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說句好聽的話，就是缺乏真摯的態度。這雖然不是這次事變發生的全部原因，至少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因吧！我們在當地明白看到，日本的政治家們，缺乏真摯的態度，倒反而鄉下純樸的人們，是具有這種態度的；在當地還常常見到很多不合理的「暴發戶」，這種現象，也足以證明日本人的不大正直。對於近衛聲明，一般都表示好感；但是；這種聲明，能不能兌現呢？關於這一點，因為當地種種工作，常有齟齬，以懷疑的眼光去批評的也不是沒有。譬如口稱聖戰而假借敵產的名義，把財產沒收了。如果問什麼是敵產呢？或者指定和渝方有關的建築物。然而銀行家、資產家或者與此有關係的人們，却竟為被日本人拿去了。這種笨拙的方法，本來不至於招怨的，也招了怨；近衛聲明裏，雖然說是絲毫不取，也要引取能否實行的懷疑了。

最近上海總工會聘我為顧問，我已經答應了。所謂工會，就是日本的「勞動組合」，過去曾經受「市黨部」的指使，做過排日抗日的先鋒。其中人物，有的是「坐地虎」，有的是「地頭蛇」。這工會裏的人們，實在不易對付，而且對於日本方面抱有反感的。於今竟到我這裏來請我為顧問，以便向軍部和日商公司的分行經理有所接洽，我覺得非常有趣。我曾經將要因誤會而被處死刑的兩個中國人拯救出來，或者就因為這件事體，博得好感；像我這樣的人，也被聘為顧問。那是一件因歸順手續上的錯誤而發生的事體。當時我被派做怎樣處置這兩個人的工作；因為不能夠早一點去，所以在歸順以後還由友軍的密告而舉行家宅搜索。這樣



以前抗日排日的連絡文件，就被發現了。於是乎以副司令和副官的身份而拘進「刑務所」。不過他以前會和日本的警備隊往來，爲警備隊出過力；並因發現某種情報的錯誤，而建設了莫大的功勞。

當我來到東京的時候，他正在「刑務所」遭難，把手指刺破書寫遺囑，因思慕的關係要求把我請去。我替他關說的結果，終於放出來了。這樣一件小的事情，竟得到他們的好感；聘我爲總工會的顧問，或者借此報恩的意思亦未可知。講到總工會，這是上海一切工會的聯合團體。現在擁有會員二十一萬餘人，再加以日商紡織工廠、鐵工廠、水電工廠的工人，大概有四十萬人以上。這和由日軍斡旋指導而組成的大民會，工人福益會比較起來，前者的會員不過一萬，後者的會員，亦僅一萬五千。從這些工會裏出來的會員，都漸次被總工會吸收了。總工會的常務委員胡兆麟主席，送給我的履歷書如左；

姓名 胡兆麟

年齡 四十一歲

籍貫 湖北黃陂

出身 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

會任 民國十六年任湖北全省總工會組織部職務長兼糾察總指揮現任上海特別市總工會長

這就是擁有會員二萬名以上洋商業工會的會長，而且有很大的勢力。其他會員都有相當組織，並不是烏合之衆。由小的工會而聯合起來的總工會，它的基礎可以說是非常鞏固的。其中也有青幫，亦有正當的商人，都是有職業和能幹的，並且約定聽從我的指揮。因此，我也努力把這力求上進的結合團體，扶植起來。聽到我當了總工會的顧問，前上海特別市社會局長吳文忠非常歡喜。他現在辭了社會局長，而爲華僑常務委員，曾經寫信給我說：「得悉榮任顧問。不勝欣慰，萬望不辭勞瘁，好自爲之」。我的能力雖小，但想先給

他們以指導原理，目前的計劃是設立醫院，學校和俱樂部。

最後，我要說的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除非日本真能王政復古是辦不到的——就是現在推動指導日本國策的一切政治家，都要恢復那種真摯的獻身的態度，不爲名譽地位等類俗事所束縛，且非有肩起救世的重擔，領導日本青年前進的氣魄和勇氣不可。這樣真摯健全的努力，才能爲中日全面和平，開拓出一條平坦的大路。日本爲什麼不選擇這一條大路呢？——走上這條大路，才能收攬中國、印度、南洋亞洲全民族的人心。但是第一步須要把能够收攬亞洲民心的强有力的國策和政綱，宣示給亞洲的民衆。打倒蔣介石呢？——講求收攬中國民心的方法呢？這兩條道路，必需走一條的。假如從亞洲或中國把老虎趕出去，或者在趕出去以前，而日本竟充當嚮導把羣狼招惹進來；這樣的結果，東亞的將來祇有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了。

結尾還要鄭重的說；我和日本的指導階級或現在掌握政權的政治家諸君，對於東亞，同樣具有真摯態度和感覺到千鈞一髮的重大的政治責任！

（原文載「大陸」二月號。齊東楚譯）

# 真的親日家和假的親日家

(原題「四萬萬人心」)

馬淵逸雄

(一)

中國社會之最大的並核心的本質，是由什麼構成的呢？這是有歷史的連繫的。在過去，中國有過十分專制的政府；但這種政府的力量，却很有限。第一個理由，是中國幅員廣漠，有鞭長莫及之觀。第二個理由，是源出孔孟之教的「尊民思想」的存在。所以政治的中心，是分散於民間的，這是和歐美各國完全不同之處。中國沒有真正的民間政治組織，但政治的中心力，却潛伏於民間。中國的民衆，雖知道「這是對的，那是不對的」，但他們藏之心而不出諸口。爲民父母的政治家，非得親至民間，覓求「民心」不可。數千年來中國正直爲政者的理想，是視民爲天聲。即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國家政治力，是偉大的，但社會之力，却較任何政府所實行的政策的效果更大。國家的對立，可藉改變政策來緩和或改良；社會的對立，却不能僅用政策變更或標語來改善。

在過去，中國沒有良好的政府，但擁有受政府虐待的廣大民衆；故過去中國和具有秩序和組織的國家，如日本所發生的鬥爭，和普通有組織的國與國間的鬥爭不同。中國的廣大社會，常發生不合作的運動，所以

真的親日家和假的親日家

七九

政府的人士儘管發表宣言，訂結條約，社會的民怨，却難以消除，蓋社會問題，有用社會的政策加以解決的必要。社會問題，較政治問題困難得多。共產黨現正靜待由日本和中國民衆的對立，舊有秩序次第破壞無遺後，藉社會爲背景，以新的勢力登場，確立自己的新勢力。中國四億的人民，現在將要陷入這可怕的窟穴了。

日本目前最大急務，但切實地改善和平區及非和平區的社會秩序，以事實的實踐，掃除民衆的對日猜疑和對立心理。政府對政府，軍隊對軍隊的抗爭所給與人民的惡感和影響，係臨時的，局部的，不足爲慮。此種事實，不僅現代的中國如此，就在國際上或歷史上，也頗不乏先例。然由民衆與民衆間的惡感所產生的怨恨和對立，就很不難使其消滅了。對中國民衆談理，往往是沒有效果的；一部有理智中國人，容或諒解，最大多數的中國民衆，却往往充耳不聞。中國的民衆，是看了過去並現在的事實而行動的。

(二)

中國的親日家，是愛自己的國家而才親日的，換言之，應該是爲人民大多數的幸福而親日的。爲了自己的利益暨榮達，而和日本接近的，決不是真正意味上的親日家。爲國家暨人民而親日的人，均具捨己的精神，故其行爲言論，是偉大的；他們的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固不待言，且他們有自己的主義理想，所以常捨身爲民衆犧牲。他們和日本提攜，出於至誠奉公之忱，他們的行動，是主動的。

爲私慾而親日者，僅顧自己一身之私，故祇有成爲人民輕侮嘲罵的標的，他們和日本提攜，爲的是利祿，所以是欺人的不純正的。

那麼中國現在是前一種親日家多呢，還是後一種親日家多呢？日本若認後一種人爲親日家，與之接近，則中國一般民衆，勢必一提起親日家，就視之爲可恥的存在。親日而被視爲是一個壞的名詞和投機，則真正的親日家，將裹足不前。現在中國誤解親日派爲漢奸的別名，日本則一提到愛國，就解釋之爲抗日。茲欲糾正這兩種誤解，當然有待於日本的努力和注意。糾正的方法，有兩種！（一）尊重真正的親日家，消除中國人「抗日即愛國」的誤解。（二）揭破虛偽親日家的假面具。這樣之後，中國大眾不僅將明白親日不是一個壞名詞，真正的愛國人士，也將擡起頭來，實行真正的親日工作，使大局明朗起來。

### (三)

日本人抱如下的處世哲學：「自己認爲正當的主張，則縱令萬人反對，此種主張的貫徹，是正當的事，且希望這樣做去。」但慣於國家紊亂的中國，君子有德的人，都奉「邦無道富且貴恥也，邦有道貧且賤恥也」爲政治處世的箴言。這差異，是很大的差異。今欲以日本之正義和中國談，則除「以事實的實踐示庶民社會」以外，別無他途。祇有這途徑，方可以使中國社會爲東亞聯盟之一員，和日本攜手同行。中國的社會，與其一百個理論，反是無言的實行，能够得到強大的反應。

中日人民的相互接觸，爲日非淺，如何方能使兩國人民相安？是目前的重重大問題，若不能得其途，則一切理論，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都將歸爲畫餅，由從日本到中國去的一切日本人言，知識和理論，都是次要的問題，最緊要的，是具有（一）認識中國社會之明，（二）辨別中國人民之明；這兩種認識，是絕對不可缺的。（原文載「週刊朝日」二月二日號。士驥譯。）

# 真正的中日和平

阿部信行

中日事變，最初的時候，似乎僅係中日兩國間的問題；但其後第三國人士，將因此變，解釋爲從歐美人一向所想像之功利的，而且打算的國際關係所發生。他們沒有理解聖戰的意義。因此，講話總是七亂八糟。換句話說，近代歐美人士，在戰爭一開始，事事使聯想到實質上的領土，或特殊權益等問題，所以是不會充分理解的。因此，各國對日本的行動，一切常以懷疑態度觀察。在日本誠一不勝麻煩的事。其實日本在自然趨勢外，決不提出什麼不當的要求。此事，近衛馨明的三原則，已明白表示過了。然而因爲他們是以從前外國的辦法來設想。所以這三原則，不會接受的，蓋向他們教以我們聖戰的真意義，即向西洋人教以東洋道德，此教導工作，必需相當的努力及忍耐。倘對此急性地憤慨幹去，在他們的頭腦裏，仍是斷然不會來附和的。事變的對於渝方，因爲以此毫無印象而不能理解東洋道德的西洋人做背景，所以事變當然延長的。總之，我們只有振作精神，極力將自己正當信念，以理論與事實，顯示於他們之前。

中日事變，最近已不能引起世人的注意，是誰都感覺到的。日本人的癖性，對於當然需要時日及努力的事情，也什麼都想一氣呵成辦掉，並且每易陷於信仰過分。從這個癖性講起來，現在這樣的不注意，就另有一種看法。却也可說是好的。並且惟其如此，所以說日本人將成大國民風度，亦未可知。話雖如此，倘真犯健忘症，而把事變忘掉，則是大問題。或者像人家所想的，日本國民性，是萬事容易討厭的，也屬爲難。蓋中日事變現非單純的事變。與這一二年間，所醞釀而非常具有複雜的世界事變，有密接關係，所以不能以爲

單純之事變而於短期內解決。如此設想，事態想可明瞭，且非如此，則不成的。日本國民此時非澈底覺悟不可。但不可以爲歐美情勢，解決以前，中日事變不能解決，以致放棄從來爲東亞而苦鬥的事業。關於此點，厭故喜新的人們，務應多多考慮。

大家都說過，現在也不用再提的，就是解決中日事變最重要之點，實爲日本與中國的互相理解，及互相表示共謀解決事變之誠意。本來中國對日本，數千年來，一向自負爲兄。但無論在理論上，實力上，都一步地不如日本。自然感情用事，結果遂對日本發生反感，也是應當的。例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以及其未至戰爭的問題，從中國人之立場看來，真是屢受侮辱。自尊心極重的中國國民，決不會感到愉快。但是此等磨擦的事件，乃接境之兩國間，極難避免者。因重重的累積，中國國民愈成感情用事。從彼等的立場看來。實在可說是無怪其然的。加之中國自身，漸漸覺悟近代化的必要。收回國權，打倒帝國主義等國家意識，漸趨旺盛。結果形成排外思想，對日本也是以同樣的心理，立於反抗的地位。更因在中日事變前，從國外看來，日本的事情，也不能說是順利。也有人說，日本的財政，毫無辦法。也有人說：日本的政治，十分墮落，軍隊亦不足信賴，等等錯誤的觀察，盛行一時。一方面，中國自身，因了經濟更生，軍備擴張，及新生活運動的推行，而自信國民質的改善。在此種自信上，加以抗日意識的訓練。故越是青年，此種意識，越是強烈。對此等人士，行消滅抗日意識之精神教育，頗費時間。但此事雖需極長之時間，如不行此種努力，即中日就是表面看來，好像親睦得很，然終不是真的中日和平。必要形式上的和平，與精神上的和平，同時實現時，才是真正的和平。然而這是很難很難的事業。總之，中日兩國，立國之狀態既異，對於一切問題的看法，思想的方式，都很不同。故想使兩國達到從頭至尾完全的一致，在理論上即屬可能，實際問題上，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因此，二國互相把「此爲至難之事業」一話，常記在心頭，然後設身處地，體諒對方之立場。

以溫暖的心情相接，最爲必要。即在我們私生活之中，也常常遇到即自己有俯仰無愧於天地的良好思想，良好行爲，也還是不容易使對方心悅神服的事，何況國民與國民之間，原極難互相諒解對方的真意與誠意。容易引起種種的誤解與衝突，乃至極當然的。我們只要處處爲大局着想，不要忘記了雙方完全的幸福，必基於兩方相互的協力，才能產生。我們不能不用這種心理，去檢討引起中日事變的原因，去考慮今後處理中日事變的方針。

話或許說得太開門見山了，國民政府與日本間，就算已成立了極公正的協議。條約的精神，如其不能在實行上表現，等於空文，毫無用處。對於此點，中日兩方，必互以親熱與誠意相接。在中日事變以前，中國國民對日本的感想當然是錯誤的。然我們不能不矯正他們這種錯誤的意識與感想，使其對日本，真能理解。換句話說，這件事，才是真的中日事變之目的。即處理中日事變真的成功，必待於中日兩國國民之間，心底的真的明朗化，做到這地步，那麼東亞的天地，才能成爲我們理想的壯嚴的狀態。汪精衛先生在他「罪己的精神」一文中，要求了中國一般人的自己反省。我們也應該虛心坦懷地，對我們對中華民國心理的公正程度，加以十分的檢討。然後，方纔可以得到他們的信賴，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了確信，那麼才能大刀闊斧地在東亞的天地之中，活躍起來。（原文載讀賣新聞二月二十三日。友諒譯）



# 從東洋史上看到的中日關係

和田清

東洋史的時代是極長，前後有數千年，不過大體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代。一個時代是東亞和別的世界隔絕，處於孤立狀態的時代；另外一個時代，是人類交通發達，東亞也走進全世界的交通經濟之中，而和別的世界渾然成爲一體的時代。前一個時代，從太古起，一直繼續數千年之久；後一個時代，僅是最近一二百年間的事。所以年代的長短，相差極多，似乎過於失去比例，但是倘若看一看它的內容，那麼其間的變化，實在是非常大。這變化，不僅是政治經濟的外面，便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內面，也是極大。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當然要把它和前一個時代區分開。尤其是，我們現在雖然覺得新的時代是很短，而舊的時代是很長，但是把若目光放得久遠些看，那麼這新的時代（東亞的天地也不過是世界交通經濟的一環的時代）今後是會永遠繼續下去的。

至於這兩個時代的各自的特色，在前一個時代，中國人大體是東亞文化圈內的主人公，而到後一個時代，日本才開始做它的主人公。

Eurasia 大陸（歐亞大陸）是很大，中央有大沙漠。尤其是靠南邊，有帕米爾高原，有西藏高原，有喜馬拉雅山脈，有印度支那山脈。因爲如此，所是同屬亞細亞，東邊和西邊的交通是非常困難。北邊雖然不像南邊那樣多山，却又是朔北不毛之地，其深部是爲沙漠所占據，所以要繞過這沙漠而交通，是同樣困難。固然在海上交通發達以前，也曾不得已而穿過這困難的中央亞細亞而交通，不過這是微微不足道。因爲如此，

從東洋史上看到的中日關係

所以東亞就孤立起來，發展了獨自的文化。固然西方也有古舊的不同的文化，東亞也會受過它的影響，不過總之這影響是很小，未足改變東亞文明的特色。其中影響相當大的是佛教的傳來，不過中國文明還是沒有印度化，反之那佛教却中國化了。至於其他小的影響，更是不消說得。

最近常常聽見一般人說起「東亞共榮圈」這句話。所謂東亞共榮圈，簡單地說起來，也就是指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脈以東的區域而言；這個區域，是別成一天地的。起初在這東亞共榮圈裏，曾經有過各種不同的文明。比方說，日本有獨特的日本文明，朝鮮有朝鮮文明，滿洲有滿洲文明，中國有華北文明和華南文明，西藏有西藏文明，蒙古有蒙古文明。可是這裏面，發生於華北黃河流域的文明，却是最富於活力的偉大文明。所以這文明向四方擴展之後，其他文明就被攝取同化，而使東亞的天地大體變成了清一色的中國文明的世界。不僅如此，便是這些國家的古代歷史，也非查考文化先進國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歷史書，無從得知。

如此，中國人就十分得意起來，覺得只有中國是文明國家，其餘的國家都是野蠻國家。便是事實上，中國的文化，也是最為燦然。而同屬中國，也以中央為土地最肥，物產最豐。而離中國的中央（所謂中原之地）愈遠，愈近邊疆，土地也就愈壞，氣候也就愈糟，人也就愈野蠻。便是從地理上粗粗看來，中國本部的東邊和南邊是海，西邊是西藏高原，北邊是蒙古沙漠，所以也是離中央愈遠愈壞，惟有中央最好。因為如此，中國人就以中國為中華，為中國，為華夏。在中國人想來，周邊諸國，都不是好地方，所以中國人棄而不顧，由蠻人居住，把他們喚做戎狄蠻夷。這一棄而不顧，並非「無力顧及」，却是「不屑顧及」。所以中國人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東亞（亦即東亞文化圈內）視為一天下，並且以為普天之下，僅有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國家，其餘都是中國的從屬物。這種思想，便是有名的華夷思想，或是天下思想。

同時作如是想者，不僅是中國人自己，便是中國以外的東亞其他各國，也莫不如此（僅有日本，稍屬例

外)。不論是蒙古人還是滿洲人西藏人安南人，也都以為自己的國家雖然獨立，但是文化的宗國却是中華中國。自己的國家較之中國遠為不如。不過文化雖見遜色，武力方面却不一定弱；特別是北方民族，是意外地強。這些民族，曾經幾度乘勢把中華之國，取為己有。不過有趣的是，當他們壓服中國人之後，他們自己也變成了天下思想，以為自己是中華的主人公，其餘都是我狄蠻夷，甚至把他們自己出生的地方，也置於我狄蠻夷之列。有人也許以為這是十分幼稚，不過這種想法，在當時其實是當然的想法。

然而到了近世，火車輪船發明，西洋人大舉來到東洋之後，情形却稍有不同了。起初西洋人來到中國，中國也把他們視為我狄蠻夷，而且因為他們離得更遠，所以以為他們更野蠻。後來英國人來到中國，中國人也以為他們專門因為敬慕中國文化，所以不遠萬里，前來朝貢。事實上以前周圍各國，也是把中國當做文化的宗國，都向中國朝貢的。固然名義上雖說是朝貢，外國拿到中國來的東西是很少，而從中國帶回去的東西却更多，不過禮儀歸禮儀，所以外來中國朝貢，為表示至誠起見，除貢表之外，仍舊非帶點東西來不可。

西洋人初到中國，中國也把他們當作朝貢使一般待遇。不過西洋人自尊心很強，所以不聽中國人的話，因此就發生了衝突。俄國人之類，跋涉數千里，費時一二年，來到中國，中國人還是叫他們執行朝貢的儀式，若是行不如式，就把他們趕回去。英國人特地派遣軍艦，費時二年，渡海來到中國，中國人還是叫他們向天子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可是西洋人即使對自己的國王，也不如此行禮，何況對他國國王。所以因為禮貌不端，而被逐回的，也不知有多少。不過當時中國和西洋的交通，不怎樣便利，所以並沒有鬧成戰爭，不過因此而幾乎危及國交的事，却是屢見不鮮。現在英文字典裏有 KNOW HOW 一語，就是從『叩頭』而來，由此可見當時英國人當時的痛苦，是如何深刻了。

可是日本的情形却不同。日本雖然位於東亞，可是和東亞大陸中間，隔有一重大海。所以中國人和蒙古

人想來日本，也不能隨便來。因此大陸的影響，不易及於日本，而日本也就得以完成了獨自固有的發達。所以日本之得有冠絕萬國的金甌無缺的國體，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上有皇室，下有忠勇的臣民，一方面却也是這種地形的影響，爲的是日本離大陸較遠。

說起中日關係，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中國和日本，沒有怎樣戰爭。有人聽到我這一句話，也許會覺得奇怪，以爲我在要幽默，因爲現在中國和日本就正在戰爭。可是在數千年之中，中國和日本發生戰爭，前後不過二三十年。這和大陸各國的關係，是不能比的。那麼爲什麼中國和日本不戰爭呢？這倒並非因爲兩國意氣相投，所以不爭吵，却是因爲兩國距離太遠，不大容易戰爭。到近來交通便利之後，戰爭就多起來了，這就是證明。

因爲日本的國家，處於這種特殊的地位，所以輕易不肯向中國文明低頭。固然在日本的國家尙未十分發達，大和朝廷的威光尙未普照全國的時代，西方邊土的酋長，似乎曾經交替向中國朝貢；同時據中國書上說，便在大和朝廷統治日本全國之後，直到某一時期爲止，這種事情仍有發生。

有人也許覺得日本向中國朝貢，這在日本，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固然，這件事並不十分體面，不過中國乃是東亞文化最古最優的國家。和中國比較起來，從前的日本，尙未開化。未開化的日本，看到十足開化的中國，想學中國，乃是當然的事。倘若不想學，反而是怪事。比方說最近歐洲文明大盛，日本就學歐洲文明，其中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讀歷史，知道有兩種民族，一種是逐漸興盛的民族，一種是逐漸衰頹的民族。爲何一個民族衰而一個民族盛呢？其主要的原由，是在一個民族不能順應新時勢，而一個民族能順應新時勢。換句話說，就是：遇到新文明時，能够把它攝取同化，以爲已有者盛，反之則衰。例如台灣的生蕃。台灣雖然離中國很近，可

是台灣的生蕃從未向中國朝貢，輸入中國文化。因此從前雖然十分慄慄，爲勢甚盛，可是終不免逐漸衰頹，而至今日局處山中。還有中國西南地帶的苗族，起初也很盛，在距今三千年前，華北的漢民族和華南的苗族的勢力，會相拮抗，互爭雌雄。可是苗族既不輸入中國文明，也不向中國派遣留學生，所以終於逐漸衰頹，而至今日偏居西南一隅。反之，非列賓人和爪哇人，雖距中國較遠，却承認中國文明的長處，向中國朝貢，輸入中國文明，所以直到如今，還是很盛。

所以我們日本人的祖先，當中國文化盛時，看見中國文化而生羨慕之心，遣使把它輸入，雖不十分體面，却也並不是可恥的事。倘若當時沒有遣使，這才可恥；我們日本國民，一定不見得會有今日的發展。

不僅日本北九州和中國（日本的中國地方）西端的小酋長曾向中國朝貢，便是大和朝廷，想來初期也會遣使中國。中國的書上是這樣記載，這大概是事實。不過便是那時，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也和其他國人不同。時代過早的事，因爲問題複雜，暫且不談。總之當時日本北九州的一個村長地位的酋長，到中國去。就會受到內閣總理以上的待遇，比方說後漢初葉，日本博多地方的大地主（最多是一個村長）到中國去朝貢，就會由中國頒賜『漢倭奴國王』（『漢委奴國王』）的金印。按中國規矩，金印乃諸王丞相（即宰相以上）之物，至於平常的大臣則用銀印，普通百姓則用銅印。所以日本博多大地主到中國去，簡直是受了內閣總理或王子的待遇。後來倭女王卑彌呼向魏的朝廷通交，也曾受到『親魏倭王』的稱號。中國如此賜以厚遇，大概因爲看見日本人來得大模大樣，所以把日本當作了極大的國，把來者當做了王子以上的人物。

剛才已經說過，日本的大和朝廷，也曾屢次遣使中國。當時使節持往南朝梁的國書上面，是用着『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稱號。這稱號是很長，在當時中國式的稱號之中，是無可再尊貴的了（再要尊貴，除非做天下的皇帝）。本來當時其他各國，都是我狄

蠻夷，到中國去朝貢，拿了中國的賜品，受到中國的封號，是不勝欣喜的。可是日本却不然，稱號是由自己定；雖然得相當客氣，沒有中國的大子同等。這種辦法，使中國非常爲難。尤其是百濟，在日本之前，早就以獨立國的資格，向中國朝貢。現在日本把百濟當做日本的一部分，當然不妥。所以中國就把百濟，從六國中除去，而易以加羅（任那的一部分）。可是日本『多多益善』，非但不把百濟除去，反而索性把自己的稱號改做了『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當時這國書上說：『昔由祖禰，躬環甲冑，跋涉山川，不遑釋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海平北九十九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云云。』把征服蝦夷，熊襲，和朝鮮半島的事，加以誇示，大有威壓中國之概。所以大概發出這國書。乃是日本的雄略天皇，亦即所謂倭王武。

可是有些人說，發出這國書的不是日本的朝廷，而是九州一帶的酋長，或是任那日本府的官員。但是倘若任那日本府的官員擅自冒名「倭國王」向外國投遞國書，這是背叛朝廷；日本倘若有了這等事，早就不會有今日的發達。所以頒發這國書的，大概一定仍舊是大和朝廷。

到後來隋朝統一中國，征服蒙古高原一帶的突厥，討平西藏，在現在的青海省設置若干郡，同時還把安南方面討平，在那邊設郡若干，此外又把東邊的高句麗和南邊的爪哇一帶征伐招撫，所以其勢甚盛。而且隋煬帝又是好大喜功，動輒用兵的君主。可是這時日本向他投遞的國書，却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否？』或是：『東皇帝敬白西皇帝。』當時隋煬帝頗爲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在今日想來，日本向中國派遣對等的使者，倒是可恥；不過今日和當時的時代不同。當時的日本，只有西部日本，東部日本乃是蝦夷人的居地。而中國却是上述，一直討伐到蒙古，西藏，安南，朝鮮，南滿洲一帶。若是把兩國的國力比較一下，也許是不及今日的芬蘭與蘇聯之比。而且當時其他各國，都只把

中國當做宗國，而獨有日本，採取了這種毅然的态度，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是因爲當時日本人把日本當做非常好的國。這一點，從日本的古史『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裏，也可以看出。因爲日本人是把日本稱爲『豐葦原之千五百秋之瑞穗國』，從肇國之初就把日本視爲最好的國，所以輕易不肯對中國讓步。這種情形，到下一個時代，也沒有變動。就是，隋亡唐興，日本向中國派遣了遣唐使，奇怪的沒有帶去國書，照道理，要實行公式的國交，沒有國書是不行的。比方說，外國向中國朝貢，一定要上貢表，而中國則返書說是『爾國王』什麼什麼。可是當時日本和中國通交，却完全沒有國書。據我猜想起來，也許是日本的外交官，到那邊去了之後，再私造一張貢表，上給中國的天子，至於回來的時候，就把中國天子的『爾國王』云云的回書，中途拋棄，以免回國受到譴責。所以結果才致中日兩國，不交換國書。（固然我這解說是詮索得太厲害，似乎有辱國體。）

不過日本的外交官，也並非以軟弱爲其永遠的能事。在朝唐天子的時候，爭座位爭得最厲害的，常是日本的外交官。當時新羅因爲是中國的同盟國，所以座位原應在日本之上，可是日本說新羅乃是日本的屬國，所以非坐在新羅的上位不可。這種爭座位的事情，常常發生，所以使中國非常爲難。中國的史書『舊唐書』的『日本傳』上就說：『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而『新唐書』的『日本傳』裏也說：『又妄誇其國。』

後來唐亡宋興，遣唐使也就廢止。不過遣唐使雖然廢止，中國和日本的往來，實際上却並沒有停止。這時候日本也漸漸發達起來，中國也漸漸發達起來。倘若有人以爲中國是在漸漸衰頹，這是讀歷史還沒有讀到家；其實中國也是日益發達的。因爲大家都發達，所以交通也漸漸頻繁起來。遣唐使在很久期間，前後只去過十幾次，可是到了宋時代，日本人（商人和僧人）既去得很多，中國人（商人）也來得很多，舟舶的往來

極盛。後來到明末清初，日本正當德川時代。這時日本雖然採取鎖國政策，可是唯有荷蘭人和中國人，則許通交，所以中國人往來仍盛。到最後這些中國人住在平戶和長崎，終於在那裏造成了中國的街道。

那麼爲何有些人會以爲唐以後中國和日本沒有交通呢？這是因爲在唐以前，中國和日本的交通，是公的交通，而唐以後則爲私的交通。這一點，乃是中日關係的顯著的特色。起初當日本正在嬰兒學步的時代，是像其他各國一樣，由日本向中國通貢。不過這孩子，是很橫蠻的孩子。到後來，日本就要求對等的交際，於是這使中國吃了一驚，而種種問題，也就因此發生。不過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當時中國乃是所謂文明國家，而日本則還沒有怎樣開化，非攝取中國的文明不可，因此就開始了不交換國書的國交。

可是到後來，還不交換國書的國交，也沒法繼續了。這是爲什麼呢？簡單的說來，這是因爲中國和日本，脾氣都不好，所以若行公的交通，就要發生爭執。比方說，元朝叫日本去朝貢，可是日本不答應，元朝屢次遣使到日本來，後來日本竟把使者斬首。把國使斬首，這是太鹵莽了，於是就來了文永弘安年間的所謂元寇。再到後來，日本的豐臣秀吉向明朝請求對等的通商貿易，可是中國也不答應，於是終於有了日本的朝鮮征伐。這種關係，後來繼續很久。

上面說過，德川時代以前，中國和日本，只有私的交通，而到明治五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到中國去，才和中國開始了公的國交。這時候的中國，外國人已經來得很多，可是中國的天子，因爲外國人來朝貢，不肯叩頭，所以不願賜見。到後來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戰敗，南京北京兩條約成立，同治帝成婚（亦即成人），這才決定賜見各國使臣。日本一聽到這消息，也就連忙趕了來，所派的使臣便是副島大使。當覲見的時候，副島大使曾說：『我是大使，其餘的都是公使，所以應當給我特別待遇。』本來像我們這樣的容易羞縮的人，也許會這樣想，『其餘的國家，都已駐在中國一二十年，我們來得過晚，也許不蒙賜見，亦未可



知。」可是副島大使很強橫，他反而要求特別待遇。當時中國沒法，也只得賜以特別待遇。後來中國方面，預備先賜見了其他公使之後，再特別賜見日本的大使，可是副島大使又說：「我要回去了，我是大使，所以要求特別待遇，現在要先賜見了其餘的人之後，再賜見我，我不如回去了吧！」當時中國方面，因為已經奏明天子，辦妥覲見手續，沒法變更，只得先單獨賜見日本的大使，然後叫其餘的公使一併覲見。所以日本的舉動，自昔如此，而今亦然：從前的日本人和目前的日本人，脾氣似乎沒有什麼改變。可是日本雖然要求對等，中國却看輕日本為東亞的小國，不立刻允許和西洋同等待遇。所以中日戰爭，歸根結蒂也可說是因中國看輕日本而起。

日本不僅在政治上外交上有着這種獨特的立場，便是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在整個東亞，只有一個地方，未為中國文明所風靡，這便是日本。日本雖也傳入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可是日本文明自是日本文明，沒有變成中國文明。誰都知道，日本文明裏面，含有中國文明的要素極多。不僅精神文化的各方面，便是日常衣食住，也莫不如此。舉一個簡單的例，比方說，日本人吃飯用碗用筷，吃素麵，吃餛飩，在靈前燒香，用紙用筆，這些都是中國的習慣。同時日本人說的言語，有許多也是從中國傳來。例如我們說「日本語」三字，這已經是從中國語傳化而來。雖說如此，日本文明却自是日本文明，有其獨特之處。

說起目前的日本和從前的日本，其間的變動真是太大了。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正當封建時代，一些男子，頭上梳着「丁髻」，腰間插着大刀，看見外國人到日本來，就說他們骯髒了神國。可是後來僅僅六十年功夫，日本就達到了今日一般的文明之域，即使比諸西洋任何文明國，似乎也未見遜色。西洋人看見日本進步如此之速，就稱讚日本，說這是可驚的進步，是歷史上空前的事，而一些日本人，聽了這話，也揚揚自得。其實呢，這在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看來，是並不稀奇。因為只要是相當有能的民族，看到別國的優秀文明，

大都會學樣。比方說，滿洲人在入主中國以前，是赤足奔跑，狩獵野獸的野蠻民族，可是等他入主中國以後，却就在數十年之中，達到了中國文明的最高水準。例如康熙，雍正，乾隆諸帝，就不僅是一代名君，且是一代學者。還有蒙古人也一樣。蒙古人在征服中國之後，曾經產生第一流漢詩詩人。

所以日本歷史上，是另有其獨特可誇之處。這獨特可誇之處，便是日本人輸入中國文明，把它同化爲己有，一共費去一千五百多年之久。（固然有人聽了這話，會以爲我又在耍俏皮。）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日本人雖然學習中國文明，却没有把它和齧吞，而是識別中國文明的好的地方，採其精華，一點點拿來同化。因爲這樣，也就費時較多，可是不輸入便罷，一旦把中國文明輸入之後，却就完全變成了日本的東西，絲毫不帶中國色彩。比方說，日本人的衣服，雖然無疑也是由中國轉化而來，可是現在却變成了日本獨特的東西。還有日本人所穿の木屐（下駄），大概也是從中國轉來（中國南方，長沙一帶，現在還有人穿），可是日本的木屐却與中國の木屐不同。此外，日本的草鞋也與中國的草鞋不同，日本的米也與中國的米不同。總而言之，日本文明是與中國文明不同，而自有其獨特之處。

這一方面固然也是因爲我們日本人的祖先是優秀有能，可是一方面也是土地的關係。因爲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是和日本離得很遠，沒有發生爭吵，便是文明，也是一點點的輸入。倘若日本離中國更近，那麼無論日本人的祖先怎樣有能，或者也被中國文明所壓倒了。例如朝鮮，就一時爲中國所感化。所以我以爲日本費去一千五百年之久，徐徐輸入中國文明，把它同化爲己有，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的事，非但不可恥，而且還大足誇耀。這一點，乃是中日關係的文化上的特色。

到德川時代中葉，日本已經把中國文明，攝取得無可攝取。這時剛巧西洋文明傳了來。因爲這時日本攝取同化旁人的文明，已經非常巧練，所以就將西洋文明比較快的攝取了。這時候已經是開快車時代，不可以

「慢條斯理」了。所以日本只費幾十年功夫，就把西洋文明同化了。這在我們日本國民，真是一種天佑，一種天的配劑。

起初我們說過，在東亞文化圈孤立時代，中國曾經是它的主人公。可是現在東亞的孤立已經破壞，並且已經混入世界交通中，於是日本就完全變成了它的主人公。這是不消證明的，自從中日戰爭以來，再經過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滿洲事變，中國事變，東亞的領導權，已經完全歸於日本，日本常是主動的，而中國常是被動的。這不僅在武力上和政治上，便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亦即前此是日本模仿中國文明，而現在，因為日本攝取西洋文明，漸成了強盛的國家，顛倒中國要派留學生到日本來，拚命學日本。便在西洋，有許多公平的人，也都漸漸承認日本是東亞的中心了。

那麼這是什麼緣故呢？固然日本人有優秀的民族性，能够及早採用西洋文明，成爲先進國，這也是一個原因，其實却也是歷史的必然運命，便從地理上亦得加以說明。我們知道，文明的中心，是隨時代而轉移的，這便從西洋歷史上，也可以明白看出。若就東洋以觀，那麼在海上交通未開，東亞孤立時代，唯有中國北部，是文明世界。因為中國北部，可以由陝西甘肅，出土耳其斯坦，經沙漠而與西域諸國以及希臘羅馬交通，以爲文明上的連絡。這時因為中國的中心，正在西北，所以中國建都於陝西長安很久。可是到後來，中國南部的交通漸開（因為中國北部無良港，而南部有之），於是中國的中心，也就逐漸南移，而國都也由陝西長安，而河南洛陽，而開封，而江蘇南京，而浙江杭州，而河北北京，逐漸移近海岸。

但至近世，北京南京杭州，雖然也許是中國的國都，但是更興盛的都市，却是北方的天津，中央的上海，和南方的廣州。這些都市，都是興盛的港口，而人口也反較首都爲多。這都是海上交通發達的影響。不過這些港口，都還不是真正的海港，而是河港。例如天津是在白河的上流，上海是在黃浦江的上流，廣州在珠

江的上流。這是因爲中國交通尙未十分發達，所以到海岸去，很不自由。不過既然都是河港，河口就有淺灘，致大船不能開入。而且天津雖是中國北部的要港，廣州雖是中國南部的要港，但是其與中國其他各部的連絡，均感困難。其中上海，位居中央，不失爲東亞第一有希望的港口，便單在揚子江流域，已擁有二萬萬人口和七十五萬平方哩的腹地，所以今後也許會更興盛，不過它要集散華北內地和滿蒙方面的物產，仍有不便，反不如離開一些路的日本，凡事方便。所以從大勢上看來，正像西洋的中心曾經移動一樣，東洋的中心大概也要逐漸轉移，而至日本。

不過這時倘若朝鮮和滿洲仍舊是像從前一樣的一片荒野，遍地森林，那歷日本仍舊不免孤立於遠東。可是到最近，日本開化，滿洲朝鮮也逐漸開化了，這也是天的配劑。滿洲國初成立的時候，人口是三千萬，而今日則爲四千萬。以前滿洲最大都市，是哈爾濱，後來大連發展；駕而上之，至於奉天更大，今日人口超過一百萬，所以滿洲是東亞最有希望的一個地方。同樣，朝鮮自從日韓併合以來，開發也很快。這樣，朝鮮被開發，滿洲最開發，東亞愈被開發，亞細亞的中心，就要漸漸東移。像這樣，它的中心，就不得不移來日本。（原文載日本文部省教學局出版「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研究報告」第十一篇。高明節譯。）

# 國父和頭山翁

藤本尙則

## (一)神戶之會見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孫先生抵神戶，首先通知東京的頭山滿氏，招其來晤。國父當在東方旅館三樓六十五號很精緻的應接室裏接見，他們闊別了約有十年，過去四十年間，國父獻身革命，屢頻於危，曾於亡命日本之時，得頭山氏庇護，今日相見一堂，其感懷為何如！當時臉上帶着緊張而還沒有鬚鬚，身上穿着樸素中裝的。國父，很謹慎的走向前去，採取軍隊立正的姿勢，鞠躬似地，一面緊握了頭山氏的手，面露很愉快的樣子，頭山氏也感慨無窮的注視着。國父的面龐，很誠懇的說：

『鬚鬚在某一時期，曾經聽到你的作古的謠傳，很爲掛念！現在你依然健在，真可恭禧！同時貴國情形，漸漸好轉，也比什麼都歡喜！』

當時由戴天仇氏通譯，國父就回答說：

『你也很健康，真比什麼都歡喜，此次不能親到東京拜訪，有勞尊駕，真不勝歉疚，請原諒』。於是，國父帶了屏居在自己六十九號房間的宋慶齡夫人出來，特地與頭山氏介紹。寒暄了一番之後，主人方面是國父和戴天仇氏；客人方面除頭山氏之外，還有筆者和辻鐵舟君，大家就圍了桌子坐着。

在另一個房間裏，似乎住着李烈鈞氏和他的顧問井上謙吉少佐，山田純三郎氏等。又另一個房間裏，則

齊集了許多大阪神戶的新聞記者。國父與頭山氏對面坐着，談講好像抽絲似的，有躊躇的樣子，筆者以爲也許警戒着担任新聞記者的我，便想自己迴避，正在那時，頭山氏指着筆者向國父說：

「這是我的親戚，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兩位大人物的親密會談，未便打擾，所以就到同樓另一個房間去訪問李烈鈞氏的顧問井上少佐，大約過了三十分鐘，國父就派人找到剛才談話的房間裏去。

在地上鋪着緋紅的絨氈的大房間裏，國父坐在木製的靠手椅子上，讓頭山氏坐在另一張套有白布的大型靠手椅子上，這時中日兩偉人的重要談話似乎已經告終，到房間裏去的，筆者之外，再加上辻鐵舟君，和大久保高明老，總共五人，圍着直徑三尺多的一張圓桌，吃着茶菓，閒談片刻後，就把房門鎖了，國父懇摯地先說明國際關係的將來，作了二三個重大的預言，後來接下去就問頭山氏的見解。頭山氏回答：在日本國情所許可的範圍內，爲東亞的大局計，中日兩國應當互相提攜，國父便再進一步說，中國希望以前與各國所締結的舊條約，一概廢止。在國父所說的廢止舊條約的希望中，一般疑爲含有希望日本撤廢在滿蒙所有特殊權利的意思，認爲不外是當時中國民間收回旅順大連呼聲的代辯。於是頭山氏對於這點確切表明說：

「當滿洲受俄國侵略的時候，幸日本具有實力，費了相當的犧牲，貴國始得保全此唇齒相輔的領土，因此日本所享受的旅順大連的特殊權利，若貴國將來國情，能大大改善，至不受外國任何一種侵害時，當作別論，目下即令要求交還，恐怕我國多數國民所不答應的吧！」

戴天仇氏把這些話譯給國父聽了，國父的顏色，看來異常緊張，與戴氏相視說了一些什麼之後，約四小時的會見便告終了。國父對頭山氏說：

『請先生就住在這旅館吧，即一夜也好』。

於是兩大巨頭用過日本晚膳之後，國父即出席在旅館內舉行的中國僑胞歡迎會，頭山氏便作有生以來初次在洋床上的睡覺。半夜，國父注意着頭山氏，時時爲其理着臥具，又叩山田純三郎的臥室，對山田氏說：

『頭山先生初次睡着洋床，倘若臥具落掉，是要傷風的，我雖注意照顧，請你也在先生的房裏照顧一下吧』。國父如此照應着知友頭山氏的身體，心理是非常愉快的。

第二天，二十六日午餐後，頭山氏與國父會談之際，關於前日頭山氏所說過的旅順大連問題，國父並無答辯，其意響無從而知，筆者得頭山氏許可，請戴氏翻譯與國父作如左的問答：

筆者：『在孫先生所說的廢止舊條約之中，有人以爲包含着收回旅順大連的意思，先生以爲如何？』

國父：『那並不是因爲希望廢止一般的舊條約，而使收回旅順大連的意思。對於香港澳門也是同樣的，尤其是像澳門，在中國絕對沒有割讓條約的存在；但葡萄牙已隨意割據五百年了。中國若要收回它，只要以一旅的兵力就立刻可以收回的。但葡萄牙的勢力，只在中國外部，尙未及於內部。旅順大連的問題，固已經發生，其勢力若再擴大，自當別論，若維持目前的勢力，是不成問題的。對於香港亦是這樣。』

於是頭山氏說：

『要之，兩國要各理解其立場，盡可能地保持親善關係，這是中日真正提攜之道。請彼此注意這一點』！

國父：『關於這一點，我有兩種要求：第一是撤廢治外法權，第二是恢復關稅自主權。關於治外法權的問題

，現在自無須再說，相信貴國民俱表同情的。但關於關稅自主權的問題，貴國似有種種的疑慮，可是日本在中國商業上的地位近來是突飛猛進的，幾乎與英國相等，或且駕而上之，故關稅自主的結果，有人以為日本也許會相當損失，實在是杞憂而已。但日本商業的地位，固如上述，另一方面，如金融、航空、運輸等，日本尚不及英國。第一從金融方面來看，雖說有正金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到底尚非英國之敵。航海也是如此。我相信，一旦我民國關稅獨立起來，在這些方面，定大有利於日本，而使日本的地位益形提高，希望日本能首先對於這些問題，幫助中國，使做國民從極度的苦痛的束縛中解脫，如此則敵國民定深深感謝貴國的友誼，這是兩國提攜的第一步。今我以請求貴國協助解決以上兩問題，為中日親善的具體手段，請先生特別考慮』。

頭山氏諒解其意，答說：

『這個問題，日本在過去也是身受過的，我們自當儘量努力』。

因為有這樣的口約，筆者與辻鐵舟君，每每感到的有趁着時機，體頭山氏之意，而奔走喚起國論的必要；翌年——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我們二人同訪頭山氏，互相討論，我二人率先向頭山氏發誓願為此奔走盡力。

## (二) 游說田中、床次兩黨首

七月十八日，我與辻君去訪在政黨首領，最關心中國問題的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竹一郎氏於麻布本村町私邸，先試述我們的意見，然後叩詢床次氏的意向，該氏答稱極為贊成。到底該氏大陸問題的大先覺者西鄉南洲翁的鄉里薩摩出身的人，此位生平最傾倒南洲翁，而思想亦偉大的人，便約定改日從容地到荻窪別邸去再



討論，及在那別邸集合政友本黨幹部一同協議。

七月二十一日，筆者單獨訪問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男爵於青山北町的自邸，聽了我述過大體旨趣之後，田中男爵照常以豪壯口調問我說：

「那是頭山氏的意思嗎？」我說：「自然是頭山氏的意思，我去年曾參加頭山氏與孫先生的會談，對於收回旅順大連等希望，頭山氏會對孫先生當面謂其無謀；同時對孫先生所懇望的廢止中國治外法權，及恢復關稅自主權二事，却說是保持中國獨立國的體面上當然的希望，日本往時亦曾經同樣的受過此種痛苦，所以對於中國自然必以同情助其成功」。

說到這裏，田中男爵點頭說：

「真的，那是很重大的問題，看這情形，非喚起國論不可。但草率從事是不行的。我也有我自己的意見，但請你先和佐藤安之助與西原龜三等談談，先要好好對佐藤說說才好。他是前幾天才在中國會過段祺瑞氏來的」。

同日午後，我又訪問床次本黨總裁，作第二回會談商量之後，重詣田中政友會總裁私邸，與佐藤少將會談。佐藤少將問我：

「你訪問田中總裁的目的，是希望總裁得政權時有什麼幫忙嗎？」  
我對他說：

「田中總裁，不問在朝在野，我們都希望他贊成這個運動以指導國論」。  
彼此交換了意見，少將答應當和總裁細商。

### (三) 外務省方面的意見

七月二十二日，訪問了當時外務省歐美局長（等於我國司長）廣田弘毅氏。

廣田說：

『中國的治外法權一撤廢，當然的結果，是非開放中國內地不可的。但在那情形之下，以現在日本人的實力，似有不能壓倒英美人之慮。從這一點看來，撤廢治外法權，時期尙早吧』。

反過來看，現在的日本，國力充實，不以英美置於眼中，而正斷然實行其所信，回想到十六年前，所聽到的廣田歐美局長的話，實有隔世之感：同時，昔日的廣田局長，已升任外務大臣，及內閣總理大臣，處於歐美列強之間，堂堂地堅持過日本自主的立場。這樣對照之下，今昔之感更深。當時廣田局長又附加說着：

『但你們的民間運動，要唱無條件的承認，在外務省是不便的。』

同日又與外務省當時的外務參與官永井柳太郎氏會見，永井氏對我的主張說：

『上海的騷擾事件以後，他們中國人便以爲只要騷擾一下，自己的主張即可以實現的，最後也許連旅順大連以及台灣，都要說收回也未可知』。

這是危害我們對華好意運動的意見。我對他說：

『他們是容許可以容許的事，同時英，不能容許的，斷乎要拒絕的，但可以容許的當然是要容許的。』

### (四) 訪問八代海軍大將

七月二十六日，筆者與辻鐵舟君同去訪問八代六郎男爵海軍大將於小石川區原町私邸。

大將對此問題大為贊成，又說日本應以徹底的好意對待中國，並述及日本應無條件容許撤廢治外法權，及恢復關稅自主權二事的積極意見。日意氣昂然地斷定二三年後東西兩人種間必起爭鬥說；

『日本從今是非覺悟不可，日本爲着中國問題，在某種情形之下，要有與英美作戰的決心。至於日本與英美作戰的勝敗如何，則無用憂慮的。戰爭的勝敗，是在機微之間，英美是決不足怕的』。

到了十六七年以後的今日，日本果以自主的氣魄，爲完成大東亞共榮圈，而毅然以英美爲對手，實在要請地下的將起來看看。又當時大將對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說：

『這個問題，是頭山氏應該起來負責的。即令倒閣也是非幹不可的問題』。

因爲大將與當時首相加藤高明伯爵有同鄉的關係，並且是特別知交，有了此言，我們實大爲激動。後由大將給辻君以介紹船越光之丞男爵的名刺，我則得到介紹阪谷芳郎男爵的名刺，才告辭而別。

### (五) 寺尾博士在病床的關懷

七月二十八日，筆者訪問古島一雄先輩，叩其對於該問題的意見，他說：

『讓頭山氏單獨地負責是不行的；但這個問題，却是非頭山氏出來不可。實在，像床次政友本黨之輩，對此問題，也是應該大大地努力的』。

七月二十九日，關於那時的稅制問題，政友會方面閣僚岡崎邦輔，小川平吉兩相，與憲政會方面閣僚之間，起了議論，釀成了內閣決裂的危機。這一天筆者恰巧在田中政友會總裁私邸，與佐藤安之助少將面談，我說：

爲着這樣國內小小的稅制問題，而以閣運相爭，不如解決對華問題，打開日本根本的命運，爲有意義，且其意義還來得大吧！」

並且要求將此事進言於田中總裁，少將說：

「我於意見也是與足下同樣，以前也是屢將此意見，向總裁獻言過的，總裁說是不好以外交問題爲政爭之具，而不肯採納」。

於是我對他說：

「外交和內政，兩者是密切不可分的，即在政黨，不也是在外交內政兩方面各標示其政策的嗎？尤其是外交問題，其影響於國運民命之大，實在內政問題之上。假如有以伸張國運民命爲念的政治家，爲外交問題作正大光明的論爭，是不能算什麼壞的吧。以它爲政爭之具，自然是壞的；但在正大光明的信念下的論爭，是沒有什麼不可的」。

九月十四日，與三鹽熊太氏，同訪貴族院議員樺山資英氏會談，但樺山氏說：「關於那個問題，假我時日，讓我研究之後，再行奉告」。

九月十五日，寺尾享博士去世，但博士對我們的對華運動，是熱心希望其成功的，他在病中的御殿場別邸，指示我應作種種注意，關於該運動的治外法權問題，教我們要細心注意說：

「雖有外務省的關係，可是應該去拜會立作太郎，與新進某法學博士（寺尾博士，亦忘其名），吉野作造，及今井嘉幸四博士，聽聽他們的意見才好，政黨方面應該請教的，是憲政會的大竹貫一，山道襄一，政友會的田中總裁，犬養、小川、本黨是末次」。

## (六) 與澁澤・大倉・後藤等巨頭會談

九月二十日，赴外務省與廣田歐美局長及亞洲局長木村銳市氏會談。

九月二十二日，在頭山氏私邸，與氏及中國時報社長水野梅曉氏，辻鐵舟氏以外三四人會合，報告吾等奔走經過，并有所協議。

九月二十三日，在飛島山私邸，訪實業界代表人物澁澤榮一子爵，交換意見後，確定其對於吾等意向，表示贊同。

九月二十四日，訪大倉喜八郎男爵，於赤坂靈南坂私邸，而與他會談，予首從頭山氏的意見說起，略謂：「日本將來的外交問題，對華關係，最爲緊要。關於此點，日本與中國，應互相友善，即日本應進而爲中國盡力，中國亦應進而爲日本盡力」。然後申述援助中國法權稅權獨立的必要。大倉爵，對此完全表示贊同，並說：「爲中國廢止治外法權後，不免有人擔憂着中國對在華日人或外人發生了不法事件，感覺爲難。假如真有此事發生，將如何辦理是好」。豪商大倉喜八郎此語，確令人有豪壯明快之感。

九月二十五日，訪後藤新平伯爵於麻布櫻田町私邸。得其贊同。

## (七) 進行大會的準備

九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歷訪東京各有力的新聞社，要求對該問題予以贊同和援助。

九月二十七日，在頭山私邸，與同志會合，報告運動經過，這一天便以神田區美士代町新築成的神田會館爲該運動的事務所，先在此處招待都下各新聞社的記者，并求其援助。

十月四日，舉行有志者討論會。

十月五日，因為將近舉行中國問題有志大會，便擬定發起人後，發通知書，徵求同志。發出的通知書，計有犬養毅氏以下百九十八名。

在這幾天，我們又百方斡旋，冀求三政黨——即政友會，政友本黨，憲政會，一致贊同該問題。

十月十三日，訪問憲政會的箕浦勝人氏，與政友會的元田肇，及小川平吉三長老，都得其贊同。而本黨床次總裁，原是最早的贊成者，前已說過，在此超越政黨政派的各方面一致贊成之下，爲着給善鄰中國以光明的日本義俠大運動，便轟轟烈烈展開了。

### (八)善鄰同志會的成立

這時在中國方面，爲了期待日本對中國的善意態度，以恢復關稅自主權的關稅會議，也着着準備開會，並決定招待各國使節，以十月二十六日爲開會之期，而日本也以日置益氏爲全權，且定於十月十六日自東京出發渡華。

然而十月十四日，東京時事新報上的記事，揣摩臆測日置全權於北京會議的態度，說日本外務省的方針，如此如此，其內容是與我們的意見方針相齟齬的，於是我即日赴外務省，訪問木村亞細亞局長，質問其對於此事的見解。木村局長說：

「不，那是報紙的謠言啦！實在是接近的；政府是採取與你們意見同樣的方針的。」

於是我竊喜國論統一了。

這樣一來，中國問題有志大會，便在十月十五日各政黨一致之下盛大舉行，且爲完成其目的，組織善鄰

同志會，決議：「爲鄰邦，援助其法權稅權之自主獨立，並將一致的國論，公開宣示於國外」。東京朝日新聞所揭載的該大會狀況大體如左：

「中國問題有志大會，自十五日午後二時，於神田美士代町神田會館，自該會主要提倡者頭山氏以下多數發起人，及其他政界各派、學界、宗教界等有志者二百五十餘名出席，由副島義一博士起述開會旨趣，推舉大竹貫一氏爲主席，會議時全場對於「吾人志在促成隣邦民國，撤廢治外法權及恢復關稅自主權」，一個決議案，一致議決通過之後，設置實行機關「善隣同志會」，舉全部發起人爲實行委員。繼發表演說，由押川方義（一般有志），高見之通（政友本黨黨務委員長），小久保喜七（政友會總務）箕浦勝人（憲政會顧問）大川周明（學者方面），米田實博士（新聞界關係）諸氏登壇，最後由田中舍身居士演說，盛會遂於午後六時散會。上面決議文，附以左列函件，送達於駐日中國公使及左列民國諸要人。又對政府當局，筆者是與政友會方面委員中島鵬六，民政黨方面平代木隆吉，政友本黨方面梅田寬一三人，相攜歷訪各當局，並作懇切說明。

拜啓：時屆高秋，想益清健爲頌，敬陳者，此次貴國所提倡之撤廢治外法權，及恢復關稅自主權問題，我日本國民鑑於東亞大局，及回顧過去五十年間敝國痛感的體驗，深望其實現之餘，本日特舉行超越政黨派之各界各要人等中國問題有志大會，滿場一致議定如另紙所書之決議文。更進而組織善隣同志會，努力喚起日本國民之輿論。茲切望貴國益自奮勵，以期獲得光榮之解決，并表示敬意。

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善隣同志會代表，頭山滿頓首印決議（另紙）

吾人志在促成鄰邦民國撤廢治外法權及恢復關稅自主權。

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中國問題有志大會

(九) 送達決議文之民國要人

- 一、北京外交部總長沈瑞麟
- 二、張家口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
- 三、奉天東三省邊防督辦張竹霖
- 四、廣東省廣州市城外外交部長伍朝樞
- 五、江蘇省南京城內督辦處楊宇霆
- 六、浙江省杭州城督辦處孫傳芳
- 七、直隸省督辦處李景林
- 八、山東省濟南督辦處張宗昌
- 九、湖北省武昌督辦處蕭耀南
- 十、河南省開封督辦處孫岳
- 十一、其他各地督辦有力者及上海總商會



# 東亞聯盟運動的意義和目的

石井文雄

## ——日本興亞同盟成立的經過——

日本的興亞運動，自去年汪精衛先生脫出重慶後，即有活潑的展開；本年一月六日，衆議院的「促進東亞聯盟議員聯盟」的代表二十人，前往中國，開始進行以中日滿三國爲軸心的具體的運動。同時，中國方面，由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中堅分子所組成的「東亞聯盟中國促進會」，也於上年十一月誕生，在和平建國的興亞建國的標語之下，開展實際運動。當此之時，日本政府深恐在蓬勃的運動中，發生足以紊亂日本主權的「聯盟」議論，特於本年一月十四日的閣議，通過了「興亞團體指導理念要綱」。至此，日本的各種和「興亞」有關的團體，乃一律解散，改組爲「大日本興亞同盟」；六月十日的閣議，也承認了該同盟的成立，由政府積極推進，並決定於七月七日中日事變紀念日成立。該同盟的綱要是：

(一) 在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的大理想之下，建設新秩序，以貢獻於永久和平的確立及人類文化的興隆。

(二) 根基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的旨趣，以尊重主權，合作國防，經濟提攜及文化合作爲東亞維新的指標，團結全民族的力量，邁進於大東亞共榮的鉅艱。

(三) 本同盟爲有志於興亞國民運動的同志結合；爲協助興亞國策，求其實現，乃挺身躬行，集合國民的

總力，以絕東亞積年的禍根，貫徹事變的目的。

在事變爆發後五年的今日，在思想戰爭部門有此統合各與亞團體的偉大國民運動的出發，其意義是甚重大；若能更早的發足，豈非更佳。

查東亞聯盟運動的基礎，是近衛三原則，即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此運動的發端，則淵源於中日基本條約的成立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

近衛聲明的根本及理想，是東亞協同體的確立，及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換言之，東亞聯盟的設立，乃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具體的根本方式，即：此種運動的迅速開展為中日滿三國的結合形體，在於中日基本條約及在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之後，已足推察此運動的意義及目的在那裏了。

「中日基本條約」的前文稱：「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為善鄰，緊密提攜，及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希望以此為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三國共同宣言的前文說：「希望三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為善鄰，緊密提攜，俾形成東亞永久和平之軸心，並希望以此為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

觀此，可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鉅業，非中日兩國所能完成，而應以中日滿三國為核心。因此之故，我們主張以東亞聯盟運動的推進及確立，為三國的結合形式；承認東亞聯盟，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最妥當的具體方法；三國內，乃有稱曰東亞聯盟的團體的產生，着手於結合三國為一體的組織之準備。日本的大政翼贊會，尤其該會的東亞局，滿洲國的協和會及中國的國民黨，就是上述的準備機關。

自中日新約成立，三國共同宣言發出後，中日滿三國的關係，已有顯著的接近；以此為契機，東亞聯盟

運動具體化的空氣，也突趨濃厚；中國方面，也於十二月十七日把各種性質相同的團體改組爲一元的團體，——即以國民黨爲中心，解散大民會，興建會及共和黨，歸併之於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

東亞新秩序的本體，是近衛聲明的三原則；而三原則的基礎，是東亞協同體；故東亞聯盟本身，也就是橫斷中日滿三國的結合體。三國共存共榮的核心，於茲成立。故東亞聯盟，與其說是法理的，公式的，自外部的結合體，毋寧是自發地，基於道義而結合的協同體。這是東亞聯盟的堅強的出發點及特性，也就是東亞聯盟的道義的特性。

東亞聯盟的目的，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這就是三國合作結合的要素。然東亞新秩序的內涵，是廣大的東亞之復興，且其性格，是道義，復興的手段，我們採取東亞聯盟一形式。所以三國共同前進的目標，不是利益功利，而出發於東亞本然的道義。

東亞聯盟，是中日滿三國結合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團體名稱；構成其內涵的，是三國的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流四個基本原則；在此四個基本原則之下結成聯盟，以貢獻於東亞乃至全世界的永久和平。

東亞協同體或大東亞共榮圈，此廣漠地域的結合體，決非漠視各國家的主權，而是允許各國政治獨立的一切結合協同體制之強化。各國民族，都許有獨自性及特殊性。這也就是此次中日事變，及以此爲核心，而開展的三國防共軸心同盟所產生的在東亞自肅變動，歸返到東亞本然的面目，故可知它的性質決不是蠶食的，而是在道義的休戚相關之下，互立共存之形體。即對內求互立共存，對外合各國的力量，強化東亞的防衛。所謂共同對外，保衛東亞，就是共同防共。又，它是對付和東亞思想不相容的歐美自由民主主義，也是不待言的。

欲遂行此共同目的，則非開發地上及地下的富源，作互助共用不可；否則就難達到真正的合作。但這須萬物萬邦，各得其所不可。經濟合作之外，又以政治獨立爲基本原則，其故在此。

文化交流問題，當然也應依中日基本條約確立其提攜融和了。但所謂文化，雖是指中日文化的交流提攜，我們還不可忘却負有創造文化的重任。但構成文化中心的，當然是以基於東亞道義思想的東亞文化的復興發揚，創造爲中心。於此，我們可以發見東亞文化的自覺及指導。且恆久的和平，若非文化的性格，就不能成立。和平的背後，一定潛存着「維持」和「向上」兩種性格。東亞聯盟運動的最終目的而是在於貢獻於東亞乃至世界的永久和平，則文化的交流及思想的溝通，從道義休切相共兩點上說，是必得特別提倡的。

東亞聯盟運動的目標，是以中日滿爲核心，彼此永久結合。現在中國所最關心的，是和平建國的具體的方策，也就是近衛聲明中所稱的東亞新秩序建設之實踐方略。所以東亞聯盟本身的思想的內容及性格，是應該加以充分的檢討的。

東亞聯盟運動之思想的內容，是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流四原則，這和近衛聲明中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的三原則相一致的，和最近的中日基本條約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更是表裏相一致。但中日間的永久結合，僅靠最近的中日新約，還是不能保持的，因之在東亞聯盟的一組織之道義的及運命的結合中，求中日滿三國的結合新方式，藉以促進三國國民之思想團結。這便是中日新約的根本精神了。

東亞聯盟運動的性格，當然非有思想的團結不可。但其基礎，則是文化道義的內容。日本自開國以來，即以萬物萬邦各得其所謂理想。所以東亞聯盟，和日本的「八紘一宇」的理想，很有淵源的。

日本現以「大政翼贊會」爲推動力，組織「大日本與亞同盟」，期望首先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再及於建

設世界新秩序，以貢獻永久和平及人類文化的興盛。

汪精衛先生前闡明條約的真義，兼言及東亞聯盟運動道：『大亞洲主義是國父孫先生所提倡的，我們同志根據這種理想，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斷其實現。最近更發展而為東亞聯盟的運動，主張東亞各民族國家，在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基本原則之下，結成聯盟，以貢獻於東亞之永久和平，同時即以貢獻於世界之永久和平。有了這種的共同前進，東亞各民族國家的關係，祇有越加親睦，越加互相信賴』。

又汪先生於本年六月一日在東京接見記者時，有人叩以東亞聯盟運動主義和三民主義及近衛聲明相關性如何，又該運動所及於重慶抗日派的影如何，汪先生分爲三點答稱：

「其一、東亞聯盟運動之理論基礎，與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及大亞洲主義完全一致。民族主義之目的，在求國家民族之生存獨立，從帝國主義之侵略下解放出來。大亞洲主義之目的，在謀東亞民族之聯合，協力排除帝國主義在東亞之侵略，實現東亞民族解放。東亞聯盟之目的亦在於此。

其二、東亞聯盟運動之理論基礎與近衛聲明亦完全一致。近衛聲明所揭櫫之原則有三：一爲善鄰友好，一爲共同防共，一爲經濟提攜，而其先決條件，則爲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之獨立。東亞聯盟之綱領有四，一爲政治獨立，一爲軍事同盟，一爲經濟合作，一爲文化溝通。彼此精神根本相同。所以繼近衛聲明之後，而有此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起者，能更進一步求近衛聲明諸原則之實現。扼要言之，近衛聲明爲東亞聯盟運動之原則，東亞聯盟運動爲近衛聲明之實踐，其最大精神，在使東亞各國各依其本然之特質，而爲互相協助之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確立一致之方針，以期收友好合作之實效。由此覺之，東亞聯盟決非一種超國家之組織，其義甚明。

其三、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份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爲中

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

由此，可知大亞洲主義和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是持有一貫的理論的。推進民族主義，就可達到大亞洲主義。東亞聯盟運動，其基礎就置於民族主義及大亞洲主義基礎之上；東亞聯盟的理論，是由此兩主義出發的。

東亞聯盟在中國的意義，在於打破舊民族主義，確立新民族主義。須是如此意味的大亞洲民族主義，東亞聯盟才有其本義，才可期待其未來性及發展性。假若東亞聯盟運動這一思想運動，是求實現東亞新秩序，確保東亞文化，堅持東亞思想，并且是道義的運命的運動，則非以東亞的特殊性及傳統性爲核心不可。中日滿三國一心一德的連貫性，應該是東亞聯盟運動的根柢。如此，方能產在東亞人的東亞，東亞聯盟的東亞。

所以，東亞聯盟，可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前進一步，從而也是三民主義的前進一步。

日本的東亞聯盟，是由大政翼贊會（尤其是該會的東亞局）負推進之責。東亞聯盟，是近衛聲明的實行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的，所以日本居於盟主的地位。或可說，沒有日本，就沒有東亞聯盟，沒有日本，就沒有東亞。可是在日本，現在竟未有東亞聯盟的成立，祇在本年七月七日事變紀念日，成立了一個「大日本興亞同盟」；但這是一種所謂「興亞國民運動」。這是許多和「興亞」有關的文化思想團體的聯合，尚未達到「統合」的地步。大政翼贊會最初的方針，是先由該會組織一個統合體，再來吸收現存團體及新分子。但各有歷史及傳統的各興亞團體之統合，未能順利進行。經過許多周折，考慮各般情勢的結果，遂成立了一個「大日本興亞同盟」：加入此同盟的團體，祇須不拘泥過去，不受各個立場的束縛，服從同盟的綱

領，關於興亞運動，服從同盟的統制，就得自由加入。

所以今後的問題，是在如此形體下所結合的各團體，應覺悟在最近的將來，更將進一步，自行解散統一。切不可再墨守舊規彼此排斥。因為日本東亞聯盟運動的進展如何，中國不必說，即大東亞共榮圈內其他各民族，都萬目睽睽矚望着的。日本的東亞運動如何，實足以左右大東亞的命運，可以我們應當深加反省，組織并統一理想的中核體，用國家及國民的全副精神和力量，廣向東亞呼籲。換言之，現在的聯合體，應使之進展則為一個統一體。

又，東亞聯盟，不僅是中日滿三國的聯盟，而應廣大地包含其他大東亞圈內各民族國家。不管東亞聯盟的理想如何，現在一部分人士以為它是中日滿三國的聯盟這一種見解，是應該加以糾正的。在中日事變不能僅依中日乃至中日滿相互間的關係上解決的今日，大東亞聯盟運動的世進及實現，可說真的東亞復興和共榮。又從東亞運動的思想及目的，則加以擴充而使發展為大東亞聯盟運動當然是目前的重大使命。（原文載外交時報第九十九卷第五號。白石譯）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

一一六



# 東亞聯盟釋疑

田中直吉

## 一 緒言

和興亞有關係的各團體的歸併方針，已由一月十四日的閣議決定。據報紙所傳，政府的方針，是一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爲目標的各種團體，其行動，須依據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所闡明的旨趣；足以違反肇國精神，及模糊國家主權的國家聯合理論等，一概不准存在。日本國內關於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之思想運動，概由大政翼贊會擔任。」

從事變發生以來，產生了很多的興亞理論，有所謂「東亞協同體」，「東亞聯邦論」，以及最近高唱入雲的「東亞聯盟論」等，雖尙未得到國家完全承認，但政府在過去對此都會默認，乃至間接承認過的。所以內閣這個議決，引起世人非常的注意。尤其如十五日朝日新聞，斷定東亞聯盟論，是想設置超過現實的聯盟統制機關，與中日滿三國的共同宣言相矛盾，并違反近衛聲明的意旨云云。這種記載，無疑已給各方面一個很大的衝動和誤解。不允許一違反肇國精神及模糊國家主權的國家聯合理論」的存在，是當然的，任何人所沒有異議的。然而一部份人士所反對的東亞聯盟論，是否可算上述的一種國家聯合理論？實有澈底說明的必要。

## 二 問題的癥結

現在的世界，因為通信、交通、產業、文化等，日新月異的結果，空間愈形狹窄，鄰接的若干國家，漸漸相集一起，而形成「國家聯邦」。尤其爲了此次歐洲大戰的關係，整個世界將分爲東亞，歐洲、蘇聯、英美等的幾個集團，是無可否定的。所以今後日本想在世界上占有優勢，無論如何，應當糾合東亞各國，聯合成一集團，伸言之，今日世界大勢，已經從國家對立時代，移入「國家聯合」對峙時代。所以否認國家聯合理論，實是不明世界大勢，與世界史的必然傾向，倒行逆施。而一月十四日閣議的決定，其旨趣並不是禁止「國家聯合」的理論，而是仰制「違反肇國精神或模糊國家主權的理論」，也可明瞭了。

其次，上述的世界必然趨勢，姑撇開不講，在地域上人種上和文化上都接近的東亞各民族，大同團結，實在是當然的，並且是大家所希望的。假如東亞各民族，只在裏面互相抗爭，把所謂「東亞的內亂」，永久繼續下去，實在是越加給歐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好機會，使東亞各民族，永遠做白種人的奴隸。所以要想復興東亞，永遠安定東亞的方法，只有東亞各民族的大同團結。東亞聯盟的根本理想，也就是排除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結成東亞諸民族的大同團結，並且想把東亞的實力，由於革新的建設，使之突飛猛進。如果真的愛日本，愛東亞的人，則對此原則，決不能反對。然而現在對於東亞聯盟論，有這種的反對論調。茲將其主要的，列舉如左：

- 一、東亞聯盟的名稱，使人連想到國際聯盟，實在不妥當。
- 二、東亞聯盟的平等結合，忘却了日本國的指導性。
- 三、東亞聯盟論，企圖設立超過國家的聯盟統制機關。

四、以王道爲東亞聯盟結成的指導原理，不合國體。

五、民族協和是民主主義的觀念，足以刺戟日鮮的分離。

六、東亞聯盟論，違反近衛聲明，與中日滿共同宣言也相矛盾。

這些反對論，很多是不理解東亞聯盟論，而故意非難的，但其中也有涉及東亞聯盟論的中心問題，所以下文就把這幾點加以探討。

### 三 釋東亞聯盟的名稱

「東亞聯盟」這一名詞，在中國具有極大的魔力。但在日本，仍有一部份人士，連想到國際聯盟，而表示反對。國際聯盟，在昔也與一種世界必然的趨向相符合，這種趨向，是從國家對立時代，走進國家聯盟時代，其具有啓蒙的功績，是不能否定的。當然，國際聯盟，忽視地域的特殊性，想一躍而達到世界萬邦普遍的聯合，是它的錯誤。並且事實上，變成英法等富有國家的現狀維持機關，所以滿洲事變發生，日本就揭破這個假面具，到這次歐洲大戰，便至於崩潰了。國際聯盟，所做的事實，誠然可惡，而其理想，未必可以厚非。至於東亞聯盟，不是國際聯盟的縮影，固不待言，而兩者間的理想內容，也都大不相同。第一、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的現狀爲目的，而東亞聯盟的目的，則在東亞各民族的大同團結與其國防體制的確立，并將歐美帝國主義，逐出東亞，打破東亞的現狀。第二、前者是世界各國，依據國際協調主義的普遍聯合；而後者是東亞諸民族依據共同政治理想的道義結合。又第三、東亞聯盟是以共同國防，經濟一體，政治獨立，文化溝通爲結合條件，比諸國際聯盟的平面結合，乃是一種立體的結合，最後各種名稱，所以顯示體質，的確重要，然而東亞聯盟的名稱，盟邦滿洲國，已經在十年前，公然命名，新中國的元首 汪主席，也已經正式贊

成，所以東亞聯盟，不單是日本一國的事情了。假如日本將此名稱更改，滿洲及中國，恐不能接受，硬要改革的話，豈不是政治上最愚笨的政策？況且因東亞聯盟的名稱，足以使人聯想到國際聯盟之故而加以否定，這決不能收攬東亞各民族的心理，也決不是做東亞指導者，所應取的態度。

#### 四 釋日本指導性與政治獨立的關係

有人批評東亞聯盟，是中日滿三國平等的結合，忘却了日本在東亞的指導性。換句話說，即中國所力主的政治獨立，與日本在東亞的指導性，果能融和麼？關於這問題，汪主席會很明確地說過：

「就本人所信，日本是東亞的前進國，東亞如沒有日本，東亞就不能存在，因此別的国家，應該視同阿兄，受其指導。不過，問題是指導的方法，如果採用強制高壓的方法，這就成爲統制了。用統制的方法來指導，東亞聯盟，不會發生效果的。同時受到了統制，聯盟的一部份，必成爲不自由，不自由的部份，必定脫退聯盟。這種指導方法，收到這種效果，總覺得不好聽。此外另有一種指導方法，是不加壓力的指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中山先生，在大亞洲主義裏說：『中日兩國，爲兄弟之國』。中國方面，是應兄事日本，虛心坦懷，受日本指導。惟這種指導方法，在養成被指導者的能力，自由以及自發的動作，而決不牴觸及妨礙政治的獨立」（見本年一月二日六日報知新聞。）

像上文所說，東亞聯盟裏的中日關係，不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而是好像兄弟的關係。日本以弟待中國，中國以兄事日本，相互間的人格上，極平等的，不過長幼自然有序。這裏有微妙的地方，即東亞聯盟，是不藉強權指導，而以道義精神結合的，如此正可把程度較高的民族協和理想，去打消近代民族主義裏所含的民族對立的惡素。在這意義上，日本的指導性與中日的自主獨立性，並沒有什麼矛盾。

## 五 釋聯盟統制機關並非超國家的組織

據一月十五日朝日新聞的記載，日本政府認爲東亞聯盟協會，是提倡設置「超國家的東亞聯盟統制機關」，並把它當作「違反肇國精神，模糊國家主權」而加以排擊。然東亞聯盟協會，是否主張這種聯盟統制機關呢？試略加檢討。據東亞聯盟建設要綱（第二次修正版）所載：「關於國防事項，既認爲現在國防主力爲日本軍，則應以日皇統率下之日本最高軍事機關爲中心而負掌管責任。關於國防各件，聯盟各國發表意見，由日皇加以裁可統制，並派遣聯絡機關」。（二十八—二十九頁）所以關於國防，聯盟方面，並非提倡設置超國家的組織，不過主張設置聯絡機關。其次，該要綱關於聯盟內的共同經濟事項，載明「在日本並不設置類似聯邦中央政府機關，而添設聯合各國代表的聯盟經濟協議機關，在日本最高戰爭計劃機關指導之下，而給與聯盟經濟統制的機能。」（二十九頁）於此亦明白地反對設置二國政府以上的聯邦中央政府機關，而不過主張添設經濟協議機關。如果把牠認作「模糊國家主權」，則現在於日滿經濟協議會，日德義三國同盟成立後的連絡機關等，都該說是「模糊國主權」。發表這種荒謬論調，真可驚異。

## 六 釋王道主義

有人批評，以王道主義爲聯盟結成的指導原理，不合國體。王道與皇道的異同，在學者之間，雖爭論未定，然而漢字上王道與皇道的區別，委實還是最近的傾向。在天壤無窮的神勅中，有「可王之地」一句，明治天皇的軍人勅諭中亦用了「王事」字樣。但這是王道與皇道的字義，不是論政治理想的異同。講到日本皇道的政治理想及實踐體系，則與中國的王道，不能說完全相同；然而王道與皇道，都是完成東洋道德社會的

「道」，在這一點上，二者決無不同的地方。在東亞聯盟論，日本的指導原理，當然爲皇道，決非提倡王道，而中滿二國，則爲狹義的玉道與三民主義。東亞聯盟非日本一國所能結成，乃由於中國滿洲及東亞諸國所形成，所以根據東亞諸民族古來所共同的政治理想——道——即廣義的王道，而創設確立東亞聯盟的指導原理，決不能說是不合國體的。並且在東亞聯盟中的「王道主義」決不是國家政治的指導原理，而且是團結東亞諸國家，建設東亞聯盟的國際政治指導原理。國際聯盟，以歐美的國際協調主義，爲其結成的指導原理。而東亞聯盟，則從東方國家道義結合的一點，進而以東洋的王道主義，作爲結成的指導原理。當此東亞聯盟的成否，決定東亞興亡的重大時機，不可單單致力於觀念的爭論，而阻害東亞的大同團體的發展。

## 七 釋民族協和與民族問題

有人批評民族協和是民主主義性質，這是把民族協和民族自決二者混同了。何以言之？在民主主義時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做它的理想，然而在今日全體主義時代，包含着多數民族的國家，則以民族協和的精神來融和，並且這種國家，由於多數民族團結後，才得到優越的地位。在今日的時代中，弱小民族雖自行獨立，成爲一個國家，到底不能保持它的獨立和安全。這是在這次歐戰中，已經可以看見的事實。在這意義上，民族自決，是民主主義時代的舊觀念；民族協和，才是全體主義時代新的指導原理。說起民族，就想像到鬥爭分離，是舊體制下的人們，他們決不了解新理想，因民族協和是否定民族鬥爭的。

從這見地推想，東亞聯盟論，是以民族協和和精神爲基礎，將聯盟國家內的民族問題，合理解決，同時抑制聯盟國內民族主義裏的對立性質。然而信任民族鬥爭的舊觀念的人們，對於東亞聯盟論，所提出的民族問

題，却認爲容易刺激朝鮮民族的自決，而從事反對哩！

但東亞聯盟論的立場，是否定舊時代民族鬥爭的舊觀念，反對民族的分離獨立，而主張各民族各得其所，協力融合，活潑發展。日本國內，朝鮮民族不是民族自決主義，而提倡民族協和。所以東亞聯盟，不採取該種不合歷史性的態度，而希望各民族趕速融合。但在存亡期間，其民族感情，是應十分尊重的。如果以政治的威力來壓制，結果恐怕反而阻害自然的融合。當九一八事變時，朝鮮民族的先覺者，認識了民族自決的謬誤，而對民族協和的精神，和東亞聯盟的理想，完全表示贊同。所以東亞聯盟，不但不刺激朝鮮民族的感情，却是給他們以光明的前程，融和民族間的感情，使彼等由民族鬥爭，轉向民族協和。所以統治朝鮮，惟有依據民族協和的精神，才能够收攬朝鮮的民心，舉日鮮融合的實效。能收攬一千數百萬朝鮮同胞的心，就能收攬滿洲國三千萬民衆的心；進而不但中國四億民心，即是亞洲十億的民心，也能够融合爲一。

#### 八 釋東亞聯盟運動不與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矛盾

一月十五日朝日新聞的記載，將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與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分開了，說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違反近衛聲明與中日滿共同宣言，實在是謬誤萬分。以汪主席等爲中心的東亞聯盟運動，是明明明白響應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而起的，汪主席在三中全會中的宣言，也說東亞聯盟運動，係從近衛聲明出發，而使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的精神，更行發展。並且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以東亞聯盟的根本觀念爲基礎，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的板垣中將，也會談過的。這東亞聯盟運動是響應近衛聲明，最適當的具體方法，是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的具體實現方策，在今日中日滿三國，已成爲常識了。那麼，東亞聯盟論在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裏，究竟怎樣表現呢？請再稍加檢討。

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其第一條規定，互相尊重三國的主權及領土，這是明明承認「政治的獨立」；又第二條，所謂近衛三原則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實已包含着「經濟的合作」和「共同的國防」。如是，謂東亞聯盟運動，與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相矛盾，誠百思而不得其故。又日本的運動違反該宣言的宗旨的地方，也找不出來。

## 九 結論

中國東亞聯盟運動的中心人物周學昌氏，曾表示過：東亞聯盟決非中國一國的問題，如中日滿三國，有齊着步伐進行運動的必要，則三國應急切地藉東亞聯盟，而在國防上協力，以抵當西歐帝國主義侵略，但日本如不支持東亞聯盟，則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的意義亦形減少，而其發展，亦不可期待云云。因此日本政府或大政翼贊會，對於東亞聯盟的名稱和理想，公然採納，誠為目下的急務。並且日本最近因閣議的決定，預備歸併民間的各興亞團體，而使其成為大政翼贊會東亞部指導下的外廓團體，但是欲使這新興亞團體，成為中日滿三國的興亞運動的指導力，無論如何，只有善意地吸收東亞聯盟運動，并將其理論，充分採用。當此日美危機迫切，東亞局勢萬分緊張的時候，深望政府當局，英明果斷，善加處理。（原文載「支那」三月號。鶴立譯）



# 中日新條約與大東亞聯盟

鹿島守之助

## 一

阿部大使於十一月三日在南京與國府行政院汪院長簽訂了關於中日兩國間基本關係條約，於此，日政府已正式承認國民政府；同日，中國全權汪院長，日本全權阿部大使與滿洲國全權斌式毅氏間又共同發表中日滿共同宣言，并分別簽名蓋印，國民政府與滿洲國政府亦互相正式承認。由此中日滿三國善隣友好關係的樹立，確立了東亞恆久和平的基礎。此次簽訂之中日條約，其內容係成自（一）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二）附屬議定書；（三）關於附屬議定書之中日兩國全權委員間了解事項等三部份。

基本條約包含規定中日間永久關係諸條項，相互尊重其主權及領土，同時以善隣友好為根本的精神，在政治，外交，教育，宣傳等諸領域，撤除足以破壞相互間友好之原因及措置，並永絕於將來（第一條）。其次約束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等之協力事項（第二條）。更次為約束共同防共以及為達成此項目的在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駐屯所要軍隊（第三條）。再則為約束關於維持治安緊要之協力事項（第四條）。承認日本艦船駐留於特定地域（第五條）。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詳細規定關於兩國間之經濟提攜事項（第六條）。最後為撤廢租界及治外法權等事項。

此基本條約為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及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

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之第一次及第二次聲明中所闡明之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即所謂近衛三原則之忠實條約化。

中日滿共同宣言，爲中日滿三國相互尊重其主權及領土，同時以互惠爲基調之中日滿三國爲實現一般提攜，就中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實績起見，共同宣言應予講求各種必要之一切手段。

二

余於滿洲事變勃發數年前，中日國交關係尙未緊張之時，即已極力提唱建設東亞聯盟，會舉出四點爲該聯盟之目的。

- 一、東亞之恆久和平。
- 二、共同防衛蘇聯之政治的軍事的壓迫。
- 三、改造中日經濟與歐美經濟競爭。
- 四、東洋之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的獨立。

此等根本旨趣能在近衛聲明及中日基本條約中發見者，誠爲不勝欣慰。余當時即有下列記述：「今日之東亞，當徐圖實現以秩序代替無秩序；以善隣代替紛爭。其第一步工作，爲中日兩國政府及兩國國內各種團體之會議及會商。中日兩國政府會議應組織仲裁裁判及保障，軍備、交通、關稅、匯兌、貨幣、移民、文化等諸問題之委員會。最初之會議，照汎美及大英帝國會議之例，約定召集定期的會議，而兩國合作運動之中心，亦仿汎美事務局之例，在南京及東京設立東亞聯盟事務局。」

中日兩國締結關稅同盟，以東亞作爲一個統一的經濟區域，於將來東亞產業之發展上，極爲重要。在今

日急遽變更東亞經濟雖屬實行困難；然將來之撤除關稅，非由今日即加熱心考慮以爲準備不可。關於中日兩國之貨幣同盟亦屬必要。

更有重要且在目下最有實行之可能性者，當爲文化問題。關於經濟問題，因中日兩國已有與歐美各國締結條約的關係，有不能單憑兩國獨自處理之實情者居多，然而文化問題則不受此等之限制與拘束。

學校與新聞爲今日世界上不用暴力與革命而得以圓滿地發展進步之唯一機關。學校對於少年人，及青年人的內心有培養及毒化作用；而新聞則對於成年人的心理有培養及毒化作用。今日多數之學校與新聞，均操於思想偏激者之手，用爲引起中日兩國之不和，反感，憎惡，侮辱及嫉妬，誠爲不幸。且中國之學校及新聞，係靠外國資本而創立，此等資本祇爲引起排日感情之目的而投者。且中日兩國尚有藉中日兩國之反感以維持其生存與名譽之許多人士，此爲考慮中日兩國真正前途者所應共同奮鬥者也。中日經濟委員會之設立爲必要；同時設立消除國民憎惡之委員會，亦爲急務，此項委員會認定利用學校，輿論，演講，文學以及新聞引起國家的憎惡者爲東亞人種之叛徒，應由中日兩國法官組織之法庭嚴加處罰。以此對付國家的憎惡的共同奮鬥，方能防止中日兩國將來的紛爭於未然；以此方能達到中日兩國的結合！

東亞聯盟之最高目標，爲建設東亞聯邦，如汎美聯邦然。東亞一方面應一致對外，他方面，在聯盟之內，中日兩國，應有最大的自由。其政體之採取帝制或共和制應一任兩國之自由。東亞聯盟，不限制構成份子中日兩國的國民文化的發展，其目的亦非消除兩國國民的個性，而係綜合國民的個性，組織一個政治的文化團體以適應時代之要求。

余在今日，對於十七年前之主張，仍覺無加以何等修正之必要。中日兩國果能對余公正光明提倡之一的消除國民的憎惡，加以共同的努力，則東亞之歷史，當已大異於今日。東亞聯盟，今日已不在建設途中，而

其勇姿已與汎美，蘇聯以及德義指導下的歐洲相併立，誇示其鞏固之存在矣。

余於當時，即認爲東亞聯盟對於交通，通訊技術有影響政治之故，有漸由國家進爲超國家或國家聯合之傾向，故由基此路綫之重建東亞之見地，加以提倡。同時並主張東亞對於英美的經濟壓迫以及蘇聯思想的，軍事的壓力，非表示毅然共同防衛的態度不可。

當時余之提唱殆未被人重視，世界在國際聯盟思想之下爲和平主義所支配，日本亦會因此而貪眠疏忽。在蘇聯史丹林與托羅斯基猛烈爭鬥；在歐洲因爲賠款問題德國和法國相持不下；英國和美國則履行軍縮；英、美、蘇、歐、任何方面，對於日本均難直接的威脅。在此平和時期中，預想國家百年的前途而爲此樹立必要的計劃，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途孜孜邁進，有獨呼寡應，固屬勢所必然；然而今日之世界則已根本不同，蘇聯在史丹林統治之下以其強大國之雄姿出現於歐亞之北方，歐洲則在德義指導之下正在統一二十六個國家以爲歐洲的聯合，此舉一旦實現，則其軍備，文化將爲世界無比類而站在卓絕的地位。英美亦漸有合體的傾向，縱使英國本國之前途已無希望，而其自治領坎拿大，澳洲與美國合而爲一，則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之存在，其財富與海上霸權，將依然誇耀於世界。處此緊迫之國際情勢中，東亞已不能再貪於安眠怠惰，自作紛爭矣。急速結成東亞聯盟，殆已成爲當前之急。此事今日尙屬可能，遲至明日，即已不及矣。若不察時勢之傾向，祇圖得過且過者，則中日兩國，將皆在蘇聯及英美合作的重壓之下，喪失其國際權威。唯有建設東亞聯盟，始能對蘇聯及美國談亞細亞人優秀之文化，政治，經濟，軍事之獨立。正如前任陸相，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中將所云：『現世界已臨未曾有的混亂期及大轉換時期。當此轉換時期，能得到優勝者，並非所謂民族主義；乃由多數之民族，多數之國民真能共同一致者，方獲得勝利之榮冠』。此爲關心政治者不可片刻或忘之真理。無論中國人，或日本國民，均應澈底理解。

東亞聯盟之超出思想的範圍，由現實的政治家，軍人，經濟人加以提倡，乃滿洲建國以來之事。石原中將於滿洲建國紀念日在京都演講「滿洲建國與中日事變」題中言及東亞聯盟有云：「所謂東亞聯盟，乃當前的日本與中國以及中日兩民族共同經營的滿洲國之獨立，加以確認，以中日滿三國提攜為原則以定如下條件。即東亞聯盟之方針，在國防方面，應共同對付白種人、確守東亞的天地；經濟方面以真正的共存共榮為目的積極行其共通之道；以謀經濟的一體化。然中日滿三國，其政治應視國情之特長，互相獨立，各不干涉。根據王道的精神，盡為精神的提攜前進。」并云；「在滿洲國建國的過程中，迫於需要，故於滿洲國國內以民族協和為問題而於國際則結成基於王道之東亞聯盟。」

板垣中將在其「寄東亞聯盟論」一文中，對於東亞聯盟之必然性有下列說明：

「決定為獨立國家後，則前述在滿洲二十萬日本人的心境，是以民族協和為建國的根本方針。標榜民族協和之王道主義立國，已成勢所必然。就在滿日本人及一部份滿洲人以王道滿洲立國看來，吾人就不能不更進一步，設法解除三千萬漢民族之困難。」

所謂困難，即由二千萬的漢民族言，在滿洲縱有安居樂業的王道樂土之建設，然任意將自己中國分離出來，祇須自己有樂土，中國的一切儘可不管，難免遭漢奸之譏。余曾集合青年，對此加以討論，所得結果，認所謂王道，是以國防的共同，經濟的共通，政治的獨立為主義；以發展至於結成東亞聯盟為條件。而且所謂東亞聯盟，應包括當今的日本，中華民國及滿洲國等三國」。

板垣中將之結語謂：「此種理想，過去尙不能在東亞實現。如果於事變之後，日本或中國卓絕的政治家

，站在東亞聯盟線上，開誠公布，根本調整中日兩國的國交，則我數萬萬東亞民族的幸福，必已不可計量」。石原中將，亦擁護板垣中將上述之見解，其言曰：「如在滿洲事變之後，日本能有偉大的政治家，邁進於爲昭和維新根本方針之東亞聯盟之路線，則當可擊敗蔣介石矣」。

處理中日事變根本的目標，現已因基本條件之成立而明瞭。換言之，即滿洲門羅主義，以東亞聯盟爲基礎者。日本對於中國，並無中心思想。中國共產黨員，十年如一日，替蘇聯人之主張作代辯；然中國的親日，知日派要人，係用何種思想替日本人主張辯護乎？我人以爲，日本之中心思想，非爲東亞聯盟的思想不可。滿洲帝國協和會，於昭和八年三月，聲明擬將民族協和運動，擴大至全東亞，俾可組織東亞聯盟。并舉出思想的一元，國防的共同，經濟的一體化，政治的獨立等爲結成東亞聯盟的條件，滿洲建國之爲結成東亞聯盟之一個階段，至此方有闡明，使在滿的漢人，得以除去良心上對於祖國之苦痛，而表示滿腔的贊意。

中日事變勃發之際，日本國民曾高呼「膺懲」之口號，嗣後因爲事變的進展，漸漸變爲建設的局面。國民受此次因事變所得的重大犧牲，其目的也就在於大東亞的建設而已。

據提倡東亞聯盟論者之意見，近衛聲明之精神，實爲建設東亞聯盟；近衛聲明，以組織東亞聯盟爲目標，同時在東亞聯盟結成之前，暫時提出條件。所以用此種思想做基礎所成立的此次中日基本條件和中日滿共同宣言，可爲吾人大陸政策史上劃期之創舉。因此自滿洲事變以來，已有實現端緒之東亞聯盟，至是將見其有急速的實現。東亞聯盟，更應加入在東亞共榮圈範圍內之南方各地，結成亞洲聯盟。

四

三國同盟締約國之德義，及加入三國同盟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將起而承認中日基本條件暨中國國

民政府，自無疑問餘地，問續則在於英美以及蘇聯之態度如何耳。英美既已經視中日基本條件之意義，而且出以不承認國民政府之態度。美國政府於本條件發表之日，爲強化援蔣起見，決定繼續貸與五千萬美元借款；並聲明將儘速另以五千萬美元，作爲安定舊法幣之資金。美國於三國同盟締結以來，對於我國吹毛求疵，無論條理，不條理，自始反對吾人之對華政策。日本則因三國同盟之目的爲防禦，且若不違反對於德義應負之義務，則希望與美國之間，和平解決太平洋以及遠東問題。此次成立之中日基本條約，及中日滿共同宣言，將違反美國之利益乎？余確信其不然，而切望美國對於此點，亦勿發生誤解。

當羅斯福總統暗示在歐洲，亞洲，阿非利亞各地域，實行門羅主義，是一種良好計劃時，如果渠曾考慮到具體之事，而渠當贊成在各地域組織若干友好的集團。如果歐洲及亞洲實行門羅主義，則歐洲德國，亞洲之日本，將宣言爲歐亞兩洲最強之國家。此與美國之在新大陸，初無二致。曾任駐日大使，美前國務副卿開斯爾氏所謂：「如果以英國及中國代替德國及日本，美國人的顧慮，即能減低。不過，如果各地域集團中之最強國家不加入，則此種聲明，必無效果」。

產業已有高度發達之地域，對於技術落後之鄰近地域，常能操着經濟的支配。美國之在美洲各國宣言門羅主義，創立汎美洲主義，即因此故。換言之，此亦爲美國在美洲操經濟指導權之緣故。即使墨西哥不承認美國此種政策，在墨西哥未發達至與美同等程度之時，決無成功之可能。古巴與加勒比沿岸諸國，亦復如此。歐洲方面，在英國爲最大產業國之時代，對於歐洲諸國，固且有卓絕之勢力；但德國常能維持其經濟的支配權，且不斷擬擴大伸展，局勢乃完全改觀。今日英國之勢力，殆已被逐出歐洲大陸，而德國在歐洲，則握有壓倒的經濟力。於是，由德主持歐洲門羅主義，事乃可能。日本爲東亞最大之工業國，故握有大東亞經濟的支配力。所以日本所提唱之亞洲門羅主義，不致減少與該地域以外各國之通商關係，蓋集團內各國之活動

，將因此增加其調整之程度，故此東亞新原則，不但不減少貿易，且能因而增大。因此開斯爾氏曾斷言：「日本之門羅主義，使東亞密切聯繫，其結果不但全地域的生活基準，有以提高，即對於各地乃至全世界均甚有價值」。

開斯爾氏更謂：「若日本之門羅主義，與美國的門羅主義相同，旨在防止外國對於東亞圈內諸國之侵略，祇爲確保和平而行使武力，則必有利於世界；反之，假若行使於東亞侵略，則其有大害，可以斷言。」中日基本條約約定中日兩國相互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中日滿共同宣言，亦聲明相互尊重其主權及獨立。日本在亞洲，並無侵略意圖，至爲明顯。美國之門羅主義，無自制的規定，并未宣誓無擴張領土之野心，然日本之門羅主義，如以上所述，因爲尊重中日滿主權及領土，而含有自制的規定。由此點言，可謂日本之門羅主義，美國之門羅主義不必說，即較之德國之門羅主義，亦優良多多。故亞洲而產生門羅主義，使其發生效力之唯一國家，無疑爲日本。因只有日本，具有足以支配東亞之經濟優越能力及軍事力量。其他國家，即欲宣言東亞門羅主義，亦是空言無益。

大英帝國之基礎，係由流血所築成。美國對墨西哥之戰爭，不外爲征服之戰爭。日本之進入滿洲，較美國之進入加利福尼亞，更可得人同情。開斯爾氏謂：「美國應歡迎日本門羅主義，方爲賢明，如果美國率先承認，則吾人即可立刻回復至爲日本最友好的友邦；誠然吾人之行動，係以自國爲本位，然日本對此，諒必理解歡迎。」又謂：「美國之門羅主義，是向世界的其他部份，宣言排除對於美國兩大陸政治生活干涉，此即美國無意干涉歐亞兩大陸政治之意。所以對抗外部的侵略，實行同一原則之亞細亞門羅主義，對於美國，實有益而無害」。

若以上各種考察無誤，則係據近衛聲明及中日基本條約之亞洲門羅主義及大東亞聯盟，不但爲日本聯邦



之德義二國，如果調整國交成功，即英美蘇聯，即可得其承認，故我人可斷言此爲普遍而妥當之政策也。  
(原文載「外交時報」新春號。陳祥霖譯)



# 日本興亞運動團體統合問題

木下半治

一

由於美國羅斯福大總統和赫爾國務卿的熱中，太平洋上遽然波濤汹涌，戰爭的危機，也愈益逼近了。松岡外相還以「一線希望」，說要竭盡其所能。外相的勞瘁，有足多者；而日本國民却不能不覺悟到最惡劣事態的來臨呢！

國民最重要的義務是，使勢力團結，沒有絲毫折扣的而得以實現。所謂「一億一心」，並不是一句口頭禪，乃應當身體力行的。作戰之事，一任軍部；國民安心好了；僅祇這一點，著者也充分信賴，可以這樣說的。不過堅如磐石的軍事基礎，還在於一億一心的國民團結，也不容忽視。

摩羅亞的「法蘭西敗矣」一書之所以暢銷，大半因為它關於法國國民在物質與心理上對戰爭缺乏準信，團結的不充分——尤其指導者意見紛歧的如何危及祖國，俱有詳細的闡述；使人閱讀之後，有「實獲我心」之感吧。

二

隨着日美危機的逼近，日本國內勢力統一，遂成了準備戰爭的絕對條件；而且一步步的實行起來；這不

如說是理之當然。其實國民向這一方面的努力，到處顯示出來，興亞團體統一問題，也就是其中的一方面了。據說現在日本國內的興亞團體，不下三百餘個。那末，怎樣才算是一興亞團體呢？關於這一點，頗費解釋；但無妨假定說，凡不限於國內問題；而以亞洲大陸及南洋一帶——一言以蔽之，即由所謂大東亞圈觀念所包括區域爲對象，而從事於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文化的活動的團體，就叫做「興亞團體」。

這許多的興亞團體，於前年十一月在興亞院指導之下，組織「興亞團體聯合會」，敦請近衛公主持，發行機關雜誌「興亞」（該誌與華北交通的機關雜誌「興亞」，係另一刊物），以謀各參加團體的互相連絡。

然而因爲這樣鬆弛的聯合團體，不能展開強有力的興亞運動；所以參加聯合會的各團體須要合併爲一個單一團體的呼聲，就時有所聞了。關於這一點，尤其熱心主張的是中國通松井石根大將所主持的大亞細亞協會。不過因爲其他團體，尤其像東亞同文會那樣強大的事業團體，不予首肯；直到現在還是停頓着。至於停頓的原因，聽說是由於團體事業和財產問題。

這樣一來，興亞團體統一案，就束之高閣了。不過由於遠東危機的逼近，團體統一的必要，也更覺切迫。於是舊臘以來，以大政翼贊會東亞部長龜井貫一郎爲中心，在翼贊會指導之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建設國民運動聯盟那樣的運動，就開始了；相傳這一種運動，不但狹義的興亞團體，就是都市裏的產業報國會和農村裏的產業青年聯合會那樣的職能團體也加以動員，而展開了一大國民運動，藉以集中日本國民之政治的精力不意因此而發表的，有一月十四日的「閣議決定」；其內容如左：

「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爲目標之各團體的行動，應依據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日滿共同宣言中所闡明之本旨，凡違反建國精神與使日本主權有曖昧不明之處的國家聯合理論，俱不予許可。在帝國內關於大東亞新秩序之思想，由大政翼贊會擔任之。」

看到這一「閣議決定」的發表，就認為對「東亞協同體論」的彈壓而感覺惶恐的知識階級，也不是沒有；不過稍微曉得些與亞團體運動消息的人們，都會想像到所謂「國家聯合理論，恐怕是指的「東亞聯盟論」吧。果然一月十五日東京朝日新聞就載着一段題為「興亞諸團體之統制」的記事說，以上「閣議決定」，係指「最近我國一部份人提倡之所謂「東亞聯盟思想」」，「為順應政府之方針，東亞聯盟協會業已認識其誤謬，自動的撤銷主張，並向當局陳述已採取解散協會之方針云。」

由於這一消息，第三者的我們都以為東亞聯盟協會業已自動的解散了。然而一月十六日該協會分送給各方面「報告號外」，提到該協會與興亞院的折衝經過說是：

(一)「閣議決定中所謂「違反肇國精神與使日本主權有曖昧不明之處的國家聯合理論」，並非特指某一團體之理論，乃就一般而言（興亞院當局談話）。

(二)「國家聯合理論」非即認為「違反肇國精神使日本主權有曖昧不明之處」；國家聯合理論原無妨礙；不過表明其中之一違反肇國精神與使日本主權有曖昧不明之處」者為不可而已。

「報告號外」裏，特別標出「興亞院當局談話」，又說「例如本協會業已決定解散之情報，盡屬子虛」，更表示有向東亞聯盟運動繼續邁進的意思。

以後的情況，據報章所發表的，似乎再沒有關於東亞聯盟協會的消息。無論是十六日在興亞院召集的興亞團體聯合重要職員會的經過，二十三日的大政翼贊會常任總務會，二十五日發表之同會東亞部的「東亞共榮圈建設之基本觀念」，二十五日的興亞團體聯合會常任幹是會的意見，二十七日衆院豫算總會上對議員三宅正一的質問之鈴木興亞院署理總務長官的辯解，從這種種的情況看來，現在東亞聯盟協會所倡道之東亞聯盟論和該協會的本身，並不是一違反肇國精神與使日本主權有曖昧不明之處的國家聯合理論」，因此，也不

是十四日「閣議決定」的對象，就更爲顯明了。

三

結果，興亞團體統一問題，在一月二十五日興亞團體聯合會常任幹事會上，決議採取下列方針：（一）爲統一各團體起見，在大政翼贊會之下，設立「大東亞建設協會」（暫定名稱）；（二）事業團體須要強化其內容，並力謀統一合併；（三）「大東亞建設協會」的組織，與翼贊會的關係，以及各團體的統合，應逐一協議決定；（四）興亞團體聯合會暫維現狀，目下僅「大亞細亞協會」統合於翼贊會外廓團體以內。再據二月二十三日翼贊會常任總務會的決定，又說是事業團體統合於興亞院，思想團體統合於大政翼贊會，後者暫定名稱「大東亞共榮圈建設國民運動聯盟」，即使爲大政翼贊會的外廓團體。

這樣，興亞團體統一問題，大概決定遵循着和平路徑分別統合爲事業團體與思想團體；而一般揣測——以統一爲目標的本問題，或將因糾葛而分裂，終於證明爲「杞人憂天」了。

這將受統一合併的幾多興亞團體中，就事業團體論，最大而且最有名的，首推近衛篤磨公創辦，現在由近衛文磨公主持的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在上海設立東亞同文書院，人才輩出，爲世所稱，更勿庸贅述了。其他事業團體，有德川家正公主持的斯文會，以醫療事業著名的同仁會，活動於華南與南洋一帶的醫療事業團體——博愛會，在內蒙古一帶獨闢境地，在國內也設有專門學校（高等商業）由林銑十郎大將主持的善鄰協會，大日本回教協會，兒玉謙次的日華實業協會，以及細川護立侯的日華協會等等。至於思想團體，有水野練太郎的東洋協會，坂西利八郎中將的東亞振興會，松平賴壽伯的大東亞文化協會，木村增太郎的中國協會，芳澤謙吉的華北協會等，爲數甚多，不勝枚舉。

從興亞團體聯合分會離出來，且一般想像將要參加翼贊會外廓團體的唯一思想團體——大亞細亞協會，無人不知是陸軍中首屈一指的中國通會長松井石根大將所主持的（總裁未定）。會裏的重要份子有顧問末次正信大將、副會長矢野仁一、村川堅固，評議員近衛文麿公、廣田弘毅、菊地武夫男、大谷光瑞、德富猪一郎、高木陸郎、芳澤謙吉、本多熊太郎、建川美次、小林省三郎、白鳥敏夫、大藏公望、松岡洋右等，理事長下中源三郎、理事鹿子木員信、本間雅成、根岸信、今井嘉幸、駒井德三、平泉澄、根本博、鈴木貞一、中山優、秦彥三郎、內藤智秀、今岡十一郎、橋本增吉、牧次郎、太田耕造、西原矩房、中谷武世等，俱爲知名之士，實際活動的爲下中源三郎、中谷武世等，故島中雄三，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機關雜誌有「大亞細亞主義」（月刊）復從事於出版研究活動，發行多數小冊子。內中尤以松井將軍的「亞細亞聯盟之必然性及其意義」、「亞細亞聯盟論」、矢野仁一的「滿洲國與王道政治」、中谷武世的「復興中國與東亞聯邦之構想」、「大亞細亞聯合之途徑」[Astatic Asia-What does It Mean? 1935] 康子木員信的「皇國與亞細亞」等，爲最著名。由此可知大亞細亞協會的中心思想，在於「亞細亞聯盟」，「東亞聯邦」，乃至「大亞細亞聯合」；然而這與十四日的「閣議決定」，並沒有什麼牴觸。

#### 四

這次因興亞團體統一問題而惹起世人注意的東亞聯盟協會，是自滿洲建國以來，由信奉東亞聯盟論的宮崎正義、中山優、木村武雄、杉浦晴雄、神田孝一等，於昭和十四年十月創辦的團體。既規定爲「文化團體」，所以綱領中列舉「一、本協會以由萬邦協和，確立世界絕對和平爲最高之理想；一、本協會提倡以基於王道的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爲條件之東亞聯盟的結合；一、本協會爲完成國防國家，期望內外

「一致的革新政策之實現」。協會的代表者爲宮崎正義、中山優、木村武雄三人。其中宮崎正義曾受參謀本部的委託而主持過「日滿財政研究所」。中山優是建國大學的教授，聽說和近衛公非常接近。木村武雄是屬於東方會議員。其他如橋樸、中川小十郎、白柳秀湖、里見岸雄、杉浦晴雄等名士，熊谷直太、石坂繁、森田重次郎等議員，手島辰熊、淵上辰雄等豪傑，以及田村眞策、野口傳兵衛，談谷悠藏、朝倉七郎等，都是該協會的幹部。各大學教授也很多贊助的，可以說是現在與亞團體中知識階級結合最多的一個團體。相傳坂垣中將、石原中將等，和該協會也有相當的關係。中國方面 汪主席主持的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就是響應東亞同盟運動而成立的。

「東建聯」（東亞建設國民聯盟），在廣義上也可以說是強有力的興亞團體。爲建設新東亞，而以轉受內外政策爲目的，於昭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以內閣參議末次信正大將、大亞細亞協會會長松井石根大將、國民同盟總裁安達謙藏、大日本青年黨統領橋本欣五郎大佐、東方會會長中野正剛等爲中心而組織成立的。新體制運動發軔以後，末次、橋本、中野三人的活躍是很積極的。從主張和綱領各方面看來，可知「東建聯」也是一種興亞團體。參加的團體與代表者，有東方會（中野正剛）、大日本青年黨（橋本欣五郎）、國民同盟（安達謙藏）、大亞細亞協會（松井石根）、大日本防共同志會（松本德明）、日本新農村協議會（永山忠則）、信州鄉軍同志會（中原謹司）、申府革新黨（今井新造）、九州青年維新隊（池松武志）、祭政會、大阪國策動向會等。

「東建聯」，隨着新體制運動的進展，前途很有希望；但是爲了順應新體制的團體解散方針，遂於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實行「發展的改組」，在東亞建設同志會的名下，改組爲文化團體。「東建聯」本來是末次、中野、橋本三人合作；而新生的東亞建設同志會，則完全以末次大將爲中心。同樣，東方會以振東社



，大日本青年黨以赤誠會的名義，各本獨自的文化運動，向前邁進。

東亞建設同志會，特別着眼於青年的組織，綱領的第一條就標出「內則確立翼贊政治體制，外則推廣肇國精神；由皇亞細亞之實現，以期進爲世界新秩序之建設；」第二條也說：「……進爲亞細亞各民族開發其資源，以期皇亞細亞經濟自給圈之確立」。再規約第二條有謂：「通過思想的啓蒙運動，以期皇亞細亞建設與世界新秩序之實現」。規約第七條規定該會事業爲「（一）以訓練皇亞戰士爲目的之皇亞塾的開設、（二）協助國內革命運動、（三）組織志在向亞細亞各地發展之青年隊。」

## 五

其次，著名的興亞團體，有以右翼陣營的名士岩田愛之助爲主，五來欣造，太田耕造，半澤玉城，寺田稻次郎，松木良勝，川原信一郎等名士參加的對華同志會；笠木良明系的兒玉譽志夫，片岡駿，奧戶足百，小黑將永等指導的興亞青年運動本部（出有機關報——「大義」），笠木良明，兒玉譽志夫，村井修，齋藤源內，伊藤三郎，小黑將永等的大亞細亞建設社（機關報——「大亞細亞」），影山正治、德田整二郎等之可稱爲大日本生產黨青年學塾的大東塾，松本德明，宮崎龍公，宇都宮良久，石井實雄等的東亞經學社，野口藤七等的亞細亞青年同盟（與皇戰完遂全國青年聯盟同系），以及大亞細亞協會系的青年亞細亞聯盟（幹部爲近松久等）。再最近飛躍於亞洲大陸引起世人注意的，有笠川良一的國粹大眾黨。該黨幹部爲柴田直三郎，藤吉男，板倉源三郎，吉松正勝，新田贊平，小林豐樹，兒玉譽志夫，岡田太三郎，藤原長吉，安宅務，西納楠太郎等；最近展開南進運動，並向國民努力鼓吹。

復次，研究團體有近衛公的東亞研究所，大川周明的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滿鐵東京支社的調查部，網

羅大養健，尾崎秀實，細川嘉六，西園寺公一等名士的中國研究室（赤阪溜池），三宮維信獨力經營的日滿經濟調查局，以及由木原通雄，後藤勇等舊國民新聞社系諸公與自中央公論社出來的八重樫昊諸人所組織的東亞解放社。（原文載「大陸」三月號，齊東楚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到中日全面和平之路)

實價國幣壹元

編譯者 譯叢編譯委員會

南京香舖營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

南京中山路一七五號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上海中華日報館

三 通 書 局

各 大 書 局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電話二一八八六號

譯叢叢書之一

27

37

1000

